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国际金融论坛 2018 中国报告

深度解读中国金融改革
战略与思路



-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模式与经验
-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
- 中国金融改革：扩大开放与创新
- “一带一路”：中国倡议促进世界发展
- 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

联合出版方

**CENTRAL
BANKING**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第15届国际金融论（IFF）全球年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18 ANNUAL CONFERENCE

中国·广州
2018.11.23-25



陆克文
IFF主席
第26任澳大利亚总理



韩升洙
IFF联合主席
韩国前总理
第56届联大主席



特里谢
IFF联合主席
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
30集团主席



肖卡特·阿齐兹
IFF联合主席
巴基斯坦前总理



辜胜阻
IFF副主席
中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
中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



鸠山友纪夫
IFF顾问委员会主席
日本前首相
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行长
IFF第二届常务副理事长



詹妮·希普莉
IFF全面可持续发展
理事会主席
第36任新西兰总理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IFF创始成员
欧洲50集团主席
法国前财长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IFF创始成员
意大利前财长
摩根斯坦利全球副主席



林毅夫
IFF顾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荣誉院长

www.ifforum.org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由中国主导，总部设在北京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G20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

中国“走出去”战略 将迎来考验

(2017-2018 合辑)

欢迎阅读第三期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中国报告, 报告发布正值中国重返国际舞台四十周年, 也是习近平主席发表具有远见卓识的“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纪念。“一带一路”倡议 (BRI) 将是本报告的重中之重。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多事之秋。曾高举全球化旗帜的美国, 在推崇民粹主义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开始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与此同时, 欧洲也面临各种挑战, 而英国脱欧的决定让欧洲国家变得更加向内和保守, 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

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及制造业转向高科技和服务业, 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同时, 中国大力刺激国内消费, 减少经济对贸易的依赖, 并承诺在支持国际贸易和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会, 这些国家不仅能学习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经验, 还能获得中国的投资和专业技能。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也将从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中获益。

在此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应对技术层面的问题, 还要克服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带来的挑战。但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将会带来惠及数十亿人的经济繁荣, 这说明潜在收益将远远超过潜在成本。事实上, 我们率先开展的“一带一路”调查报告也表明, 92% 的国家都相信未来五年内, “一带一路”将助力沿线国家 GDP 的增长。

此外, 当下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导的多边机构 (如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反应积极, 这表明中国可以在解决与其他国家相关的敏感问题中发挥领导作用。

林毅夫教授此次亲自为国际金融论坛 2018 中国报告撰写开篇。他在文章中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还预测了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带来的影响。本报告由五大章节组成, 分别为: 第一,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模式与经验; 第二,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 回顾与反思; 第三, 中国金融改革: 扩大开放与创新; 第四, “一带一路”: 中国倡议促进世界发展; 第五, 世界大湾区建设: 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每部分都由国内外重要决策者和专家就相关主题发表的分析文章和观点组成。我们十分荣幸得到全球领导者、决策者、金融专家、商界领袖、政治家和学者们对本报告发表的支持, 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国际金融论坛 2018 中国报告旨在让读者深入了解中国进入经济转型的新阶段后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感谢您对本报告的关注, 相信它能给您带来重要的简介和崭新的视角。



张继中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首席执行官兼秘书长



Christopher Jeffery
《中央银行》杂志总编

2018 撰稿作者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
法国前财长、欧洲 50 集团主席



阿齐兹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
巴基斯坦前总理



陈炳才
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副主任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



方 莉
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



高尚全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辜胜阻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何亚非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中国 G20 前协调人



金立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梁锦松
香港前财政司长
南丰集团 CEO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李人庆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
秘书长



林毅夫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理事长
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马建堂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钮小鹏
美国史带金融财团全球合伙人



邱晓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邱亿通
广州市金融局局长



黄云卿
中非发展基金研究员



申曙光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夏乐
西班牙对外银行
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韩升洙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
韩国前总理
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賁圣林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执行所长



詹妮·希普莉
国际金融论坛（IFF）成员
新西兰前总理



宋 敏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
香港大学中国金融中心主任



孙轶铎
世界自然基金会
中国可持续金融项目总裁



屠光绍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



王晓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副部长



王燕
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
副院长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王 沅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
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张燕生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



郑之杰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周汉民
全国政协常委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延礼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
中国保监会前副主席



祝 宪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



庞中英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院长



韩立民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李大海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
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
国家实验室战略规划部副部长



郭丰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
首席经济学家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联合出版方

CENTRAL
BANKING



开篇：中国 2050 愿景

随着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国宪法，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呼吁在所有行业和金融领域实现深度创新，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后中国新发展理念解读
林毅夫

8-10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模式与经验

文章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和启示
高尚全

12-15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值得世界期待
金立群

16-18

国家开发银行：支持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
郑之杰

19-21

进一步深化中欧贸易合作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22-23

长远目标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
陈炳才

24-25

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特点
邱晓华

26-27

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
王晓红

28-29

中国作为“非霸权的国际领导”，推动“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
庞中英

30-31

挑战与希望：转型升级中的中国海洋经济
韩立民、李大海

32-33

中非经贸合作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黄云卿

34-36

主编
Christopher Jeffery
chris.jeffery@centralbanking.com

责任编辑
Stuart Willes

副编辑
James Hundleby
Alex Hurrell

《中央银行》主席
Robert Pringle

《中央银行》出版人
Nick Carver

商务经理
John Cook

研究员
Emma Glass

总经理
Lee Hartt

英孚数码公司总经理
Celine Infeld

市场经理
Mary-Anne Edmonds
Nicola Goulsbra
Ettyenne Guimaraes

发行及印刷
Oliver Auckland
Ross Brooks

《中央银行》杂志
28-29 Haymarket House
Haymarket
伦敦，SW1Y 4RX
英国

IFF 主席
陆克文 (Kevin Rudd)

IFF 联合主席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IFF 副主席
辜胜阻
周延礼

IFF 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张继中

IFF 研究院院长
陈炳才

IFF 研究院副院长
王燕

IFF 副秘书长
杜志滨
庄珏

IFF 投稿编辑
张继中
庄珏
王燕

其他亦有贡献：
唐嫒，冯乾，黄云卿，余岚，申永冬，黄露，
周明唯，符亚因，毛惠，郑静杏，孙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北京总部紫云台书院
海淀区
北京 100095
中国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与英孚数码公司 (Infopro Digital) 联合出版，《IFF2018 中国报告》
中文版权归国际金融论坛 (IFF) 持有。

除重要文章或评论的简短引用外，此刊物任何内容未经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或《央行杂志》出版有限公司书面允许，不得转载发表，转换成其他格式，或通过任何方式印刷或收入检索数据库系统。违反者须被追究并承担法律责任。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 回顾与反思

文章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
孙时联、张嘉明

38-41

自主承担危机，打破改革瓶颈
阿齐兹

42-43

亚洲新崛起——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韩升洙

44-45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复兴
祝宪

46-47

向全球化 4.0 迈进
邵宇

48-49

十年回望，我们见证一个颠倒了的世界
翟东升

50-52



中国金融改革： 扩大开放与创新

文章



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解析
楼继伟

54-59

金融科技发展为金融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贵圣林

60-61

F20 倡议：重塑金融本质

62-63

着力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
孙轶翥

64-65

构建多层次银行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王沅

66-67

促进新时代金融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李东荣

68-70

构建新型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申曙光

71

提升中国产业政策改革的正面外溢效应
夏乐

72



“一带一路”： 中国倡议促进世界发展

文章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打造全球化升级版 辜胜阻	76-77
	健全法治环境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关键 周汉民	78-79
	促进保险业发展符合“一带一路”利益 周延礼	80-81
	“一带一路”——创新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模式 何亚非	82-83
	“一带一路”倡议发表五周年调查报告： 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	84-95
	“丝路国际联盟”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韩升洙	97
	“一带一路”助力边缘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化 詹妮·希普莉	98-99
	丝绸之路国际联盟倡议书	100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宋敏	101
	凝聚环保共识 共建绿色丝路 方莉	102-103
	“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机遇 屠光绍	104-105
	“一带一路”与民间资本参与 郭丰	106-107

世界大湾区建设： 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

文章

	南海跃起一条龙：粤港澳大湾区 孙时联、张嘉明	110-115
	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祝宪	116-117
	驾驭科技的浪潮，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发展 马建堂	118-119
	大湾区的发展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钮小鹏	120-121
	建设大湾区现代化经济体系 张燕生	122-123
	香港将成为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前沿 梁锦松	124-125
	让绿色增长中心在大湾区生根发芽 李人庆	126-127
	广州南沙： 努力打造“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创新服务新枢纽 南沙管委会	128-129
	千年商都与国际金融创新中心建设 邱亿通	130-131



关于IFF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由中国主导，总部设在北京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G20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

宗旨

自2003年创立以来，国际金融论坛（IFF）秉承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IFF）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下目标：

- 1、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 2、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 3、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 4、全球金融战略智库平台；
- 5、全球金融高级人才平台。

十九大后 中国新发展理念解读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呼吁在所有行业和金融领域实现深度创新，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林毅夫

在去年 10 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大会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并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新时代的内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我的理解，新时代有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第二，中国从过去的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到现在强起来的时代，并且中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把中国从现在到 2050 年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第一，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 2020 到 2035 年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从 2035 到 2050 年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主要体现在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五大发展理念”。

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新的“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在十九大以后中国的发展。首先，发展要以人为本，最主要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总体来讲，是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则必须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五个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主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能不平衡表现在各产业的供给能力跟需求水平之间的不平衡，必须根据需求的水平来调整供给侧的生产能力，这是去产能方面。去库存方面，主要表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跟市场的需求之间不平衡，产品生产过多，市场需求不足，就产生了库存，会造成浪费，所以，要去库存。去杠杆主要表现在金融跟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杠杆率太高，积累了金融风险，所以，要去杠杆。降成本主要是企业经营跟行政管理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企业的经营费用太高，所以要降由行政管理所造成的高成本。补短板，所要解决的则是发展不充分，把短板补齐，以满足需求并提高生产力水平。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解决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深化改革，补短板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过程应该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讲的五大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来推进。这五个方面，又可分成手段跟目标：从手段来讲是创新，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从目标来讲，创新之后要生产，供给和需求之间要协调以避免过高的产能和库存。同时，必须符合绿色才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必须充分利用国内、

习近平思想

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五个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在开放经济下来实现，最后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所有的国民共享。

五大类型产业和创新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创新包括在未来的生产中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或者是进入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在的高，即产业升级。前者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如果现有的技术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等于技术发明。如果现有技术跟世界技术前沿有差距，创新除了自己发明之外，还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就后者而言，如果现有的产业已经处在世界最前沿，产业升级必须通过发明新产品、新产业来实现。但如果现有的产业附加价值跟世界前沿的产业附加价值还有差距，在产业升级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来实现。

我最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的中国产业分成五种类型的产业：

第一种追赶型产业，不仅中国自己有，比中国发达的国家也有，比如装备制造业，中国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德国也是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同样的装备中国制造的价值 100 万美元；但同样功能的装备由德国来生产的话，可能达 500 万美元。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

第二种领先型产业，是指中国在该产业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包括家电产业（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及高铁等。中国已经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第三种转进型产业，是指过去中国领先的，但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而领先地位不复存在，这类产业称为转进型产业。

第四种类型产业是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和技术的周期短。中国作为中等收入的国家，人力资本目前跟发达国家比差距并不大，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金融、物质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两三百年的积累，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三四十年才快速积累，存在差距。如果一个产业新产



十九大开幕式



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从要素禀赋的结构来看的话，中国跟发达国家并没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对这类短周期、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投入相对少的产业来说，中国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进行弯道超车，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优势。中国人多，人才多，并且，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新发明、新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技术在国内可以马上获得很大的市场。如果这个产品有硬件的需要，中国又是各种部件配套最齐全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弯道超车型产业上面的创新也具备比较优势。

最后一个类型是国防安全和战略型新兴产业，这类产业的创新方式跟弯道超车型产业的方式正好相反，它虽然也需要高的人力资本，但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也需要大量的金融跟物质资本的投入。对中国而言，如果单纯地从当前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这方面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有些国防安全的产品无法从国外购入，没有它就没有国防安全。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也要支持它的发展。

对于有些战略型新兴产业，虽然不见得跟国防安全有关，研发的时间也相当长，金融物质资本的投入也相当多，照理说中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个新的产业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中国因不具备比较优势而放弃在这方面的研发，导致战略制高点被发达国家占领，中国未来想进入这个产业，很多技术都无法引进，或是需要很高的成本来引进，所以，即使现在不具有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现在不投入，未来再进入的成本跟风险会太大。

把中国现有的产业分成这五类，创新的方式各有特色。追赶型的创新主要是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领先型、弯

道超车型跟国防安全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主要靠自主研发。转进型的创新方式，可以是进入到附加值高的微笑曲线两端包括经营品牌、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管理等，需要产品研发或管理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把失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分转移到国内或者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生产，这则需要根据产地的情况进行管理的创新。不同的产业应该用不同的创新方式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效率。

在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一些新的平台技术，例如，智能的生产方式以及互联网提供的机会，绿色的技术必须贯穿整个过程，这样才能实现五大发展理念所要求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目标。

创新和金融

创新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创新需与金融结合。追赶型的创新方式是以引进为主，它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以银行的贷款或者发债的方式为主，银行还分大小银行，取决于产业里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规模的大小。如果是大企业，追赶的时候首先由银行来支持，包括并购等手段。如果是小企业，一些中小银行即可满足。对于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方式的领先型、弯道超车型创新来说，资金的来源也不一样。领先型产业里的企业通常相当成熟了，资金需求主要靠股票市场的融资方式。对于转进型企业来说，开发新产品或者是渠道管理、质量管理，资金需求主要是银行支持为主。弯道超车型，需要自主创新，此类金融支持方式会更多地依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能够分散风险的金融方式。对于国防安全跟战略型新兴产业，由于此类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研发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资金支持的方式主要是靠财政直接补贴，国家可以设立基金补贴研发或者国家通过财政进行采购，提供金融支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总体来讲，进入到十九大提出的中国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并且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进行各种方式的创新。在创新过程当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产业的特性来进行不同方式的创新。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也必须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跟创新的方式，以合适的金融安排来支持。并且在创新的过程中，关注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若能如此，相信十九大所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中国强起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中国模式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模式与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 经验和启示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不屈不挠、迎难而上的四十年。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 40 年的光辉岁月。40 年来，中国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当然，中国的改革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的航程历经千难万险，改革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事业迈入了新的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的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的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虽然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充满挑战，但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正是中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 40 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新的探索”四个阶段。

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1978-1992）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2）

从党的十四大到 2002 年，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确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2002-2012）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 2020 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改革了投资体制；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探索阶段（2012- 至今）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内容囊括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过去的改革当中一直难以解决甚至回避的诸多议题，并出台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方案，彰显了新的领导集体直面改革难点的勇气。

中国 40 年改革的主要成就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40 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1. 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2. 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3.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
4. 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
5. 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

中国 40 年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中国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 40 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突出的有：

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典型的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十六大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中国回顾中国 40 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市场化带来的劳动积极性、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的创新创业的活力无限焕发。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为国家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一半以上。在创新方面，

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

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定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定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与市场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的制定更加科学，但是，它无法解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问题。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才能产生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

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进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

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中国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民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高尚全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改革方法论上的经验，也在价值观方面给中国以启示。

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同时注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努力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达到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

坚守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政府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八大报告中的一句名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参与竞争，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就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就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交易主体之间难免发生各种纠纷，而依据法律可预见的、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能够消除矛盾，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企业之间的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当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力还

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压榨，并难以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

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

1. 国有企业改革仍有待突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承包制，最终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历经长时间的摸索。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同整个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因此，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积极作用，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目前国资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144 万亿，上缴税款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增加值约占全国总量的七分之一。

2. 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企业改革方向不能动摇，彻底实行“三大”转变：要从企业法调节向公司法调节转变，从管企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为股权关系。

3. 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突破。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当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地方债高企就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地方债尚未构成直接现实的危险，但是我国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归属于地方的直接税少而间接税多的这种情况，使得地方财政对这种危险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财税体制突破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税体制改革关系着纳税人尤其是纳税企业的负担。据统计，2015 年中国 GDP 是 67.6 万亿元，财政收入为 26.67 万亿，宏观税负为 39.4%，超过发达国家 10 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我国是宏观税负较重的国家之一。政府行政性收费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又紧密连接着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的优越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国家。做同样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缴纳的税费）应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如人意，这固然是因为我国政府还承担了大量投资的职能。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其效能是让人怀疑的，也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行政体制还有很大改革空间。如何在《宪法》基础上，真

正通过人大来约束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科学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

最后，财税体制改革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断提高。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 30% 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支出，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人民有改革的获得感。如此，改革就能像 80 年代那样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4. 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10 亿，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 6.56 亿。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但是，仅仅是服务业的互联网化，就已经给当下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包括阿里、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装、小商品市场门店的式微。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中国过去的监管体制之外，这些监管机制，有些是必要的，比如防止非法集资的金融监管措施，有些则是本来就应当被淘汰的，还有一些则是在新经济背景下不合时宜的。这种情况对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监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监管抱残守缺，则有可能因噎废食而使我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被竞争对手所超越，而如果监管缺位，类似非法集资监管套利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互联网新业态的适度监管程度的拿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考验。

另外，政府部门除了直接的监管功能之外，还担负着与监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垄断。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副作用是垄断变得更加易如反掌，互联网产业往往号称有第一就没有第二的生产空间，互联网的跨界搏杀能力更使得垄断涵盖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这个互联网的大时代也是智能制造的时代，各种创新创业层出不穷，经济持续发展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创新创业，要保护人们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就必须加强专利和非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反击垄断对创新的伤害。综合以上两点，在互联网时代，就要特别注重加强反垄断的力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各类创新创业的保护。■

注释：[1] 相关数据均来源于统战部网站 <http://www.zytzb.gov.cn/tzb2010/S1818/201705/5b671e39e3e544e28a694520dd38e9dc.shtml>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值得世界期待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体现了当代中国推崇的国际合作和创新精神，并通过严格的管理和公开透明的制度赢得了银行界的广泛认可。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从开业至今仅仅走过了两个年头，但已经初步夯实了基础，迈出了稳健而扎实的步伐，登上了国际开发和合作的舞台，展示出靓丽风采。亚投行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国际历史时期提出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这个具有 21 世纪治理架构的、新颖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体现了中国的发展理念，融入了中国的发展经验，闪烁着中国的时代精神。同时，中国政府又始终恪守承诺，坚定不移地维护亚投行的国际机构的性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赏。

在中国引领下国际合作的产物

亚投行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和其他国家一起完成章程以及重要政策文件的磋商和谈判，及时挂牌运营，这与中国政府奉行的真诚友善、作风民主、善于倾听、长于协商、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等原则密不可分。

筹建初期，国际舆论和主流媒体不乏质疑之声，对中国的动机有颇多猜测。国际社会主要的担心是：中国有何地缘政治意图？亚投行是否会对现有的国际多边机构造成威胁，触发开发领域的恶性竞争？亚投行的投资是否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加剧温室气体的排放，损害项目区民众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对亚投行予以特别的关注，时时刻刻在观察这家新开发机构的一举一动。

面对种种疑问和忧虑，亚投行不打口水战，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亚投行两年的初创业绩获得了国际上普遍的肯定，疑虑逐步化解，担忧悄然冰释。亚投行从 57 个创始成员，发展到 84 个成员，“朋友圈”不断扩大，并且仍有不少国家在认真考虑加入这个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色的国际多边开发机构。

总的来看，亚投行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国际视野和全局观念，展示了恢宏的气度。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



亚投行北京总部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应该看到，中国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自身并不富裕，脱贫攻坚战尚未拿下最后的堡垒。但是，中国政府出资 30%，全国人大一致通过，及时核准亚投行章程。全国各界人士同声拥护政府的决定，热情支持亚投行，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宽阔胸怀。

体现中国发展理念的国际多边机构

亚投行的创建，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挑战，通过对其成员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强互联互通，促进经济和



金立群

社会的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最终消除贫困。为此，必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亚投行充分借鉴现有国际多边开发机构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的长处，避免或尽可能少走弯路。同时，在构思 21 世纪创建的多边开发机构时，我们认为绝不能去克隆现有的机构。在治理架构和运营模式上，决不能照搬现有国际机构的做法，而是应该取其精华，习其经验，吸取教训，革故创新。在制度建设、运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上，都要闯出一条新路子。亚投行的核心价值观是简洁、廉洁、清洁。我们从一开始就严格要求，坚持机构精简，杜绝冗员，严防官僚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对腐败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坚持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黎协定。亚投行要真正办成所有成员共同拥有的银行，要兼顾域内和域外成员的利益，要倾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声音，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坚持规则至上

两年来，亚投行重视制度建设，严格风险管控，狠抓监督机制，强化人员素质。建章立制，是任何一个新机构必须抓好的关键步骤。管理部门在董事会的指导下，从一开始就抓紧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制定各项业务政策和管理办法，建立完整的项目开发和审批程序，构建风险防范机制，设置

长效的反腐倡廉制度，完善相关的监督机制。上自行长，下到普通员工，都必须遵守各项规定，接受监督，任何人不得例外。高层管理人员尤其要自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上梁端正，下梁齐整。管理部门始终告诫自己，监督我们的不仅是董事会和理事会，整个国际社会每时每刻都在注意我们的所作所为。

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亚投行分别设立了董事会和管理部门的各类委员会，涉及人事管理、资金运作、

截至目前，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全部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这些地方人民带来了切实福祉。

风险管控、内部审计等方面。管理部门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执行委员会，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执行委员会的充分酝酿和讨论，坚决杜绝决策随意性，只有达成共识，才能最终形成决议，下达执行。按照制度，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对某一项议题意见分歧，而又不能久拖不决，那就由行长最终拍板，并承担责任。两年来，还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这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可以调动所有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参与感和责任感，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防止因个人一隅之见而造成重大损失，以保证决策不犯大错误，少犯小错误。

正是由于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执行力度，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给予了亚投行最高的信用评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给予亚投行零风险权重的等级。这为我们从国际资本市场上筹集低成本的资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可以降低借款国的资金成本。应该看到，在开业一年半的时候，亚投行就能获得这样高的信用等级，实属不易。要保持最高的信用评级，我们丝毫不得懈怠，必须始终坚持高标准合规运行，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

“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动者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是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国际合作举措。两者各有其宗旨，又有必然的联系。亚投行是国际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运行；“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的大平台，吸引着众多国家参与合作。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同样适用于亚投行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我们和其他国际机构一道，同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热烈响应，无形中扩大了这个合作大平台的地域概念和参与者的队伍。

截至目前，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全部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这些地方人民带来了切实福祉。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亚投行始终致力于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具体来看，投资决策主要遵循三项标准：第一，在财务上要有可持续性；第二，投资的项目要能够促进环境的改善；第三，无论是哪个国家和区域的项目，都必须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要能够为当地人谋福利。

两年来，我们在有关成员国的交通运输，包括公路、铁路和港口，输变电、城市发展等领域，批准了一批项目。与此同时，我们在今后几年的贷款规划中，也在加大力度，推动更多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

始终保持自己的公信力

走过两年历程，亚投行已经开启第三年的运营。作为中国发起和主导的国际机构，亚投行能够在短短的两年期间内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实属不易。这里有各个成员国的支持，理事会的指引和董事会的指导，以及管理部门和全体员工的努力。我更要强调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体现在恪守承诺，不干预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通过董事会行使职权。这使得亚投行能够保持独立运作的国际机构的性质。这种支持，也反映在中国政府对亚投行倾注的关怀，为亚投行创造一个在中国能够正常运行的政策环境。中国政府积极发挥大股东的的作用，到位而不越位；为管理部门提供便利而不掣肘。这一切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面对赞誉，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始终如一地管理好这个机构，保持亚投行的公信力。难的不是获得一时的光环，而是始终保持锃亮的品牌。我们今天取得的一些成绩，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我们要始终牢记使命，永远走在“长征路”上，永不停步。

进入 2018 年，亚投行将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落实、检查执行力度。同时，进一步招聘人员，特别是加强一线开发项目工作人员的招聘。此外，项目开发的重点会放在我们独立做的项目上，域内域外要兼顾，并且要开始建立项目效益的评价体系。■

国家开发银行： 支持中国改革发展的 重要金融力量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自 1994 年成立以来，国家开发银行从政策性银行发展成为商业银行，到如今的开发性金融银行，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道缩影。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对国家而言如此，对一个机构来讲也是这样，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发展。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 1994 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自成立以来，一直围绕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断砥砺前行、探索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开发性金融道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

改革开放是办好开行的关键一招

开行成立 20 多年来，改革历程一路艰辛，充满了探索性、实践性和艰巨性。每一步改革探索，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试图找到解决制约发展问题的途径与办法，提升自身的效率和活力。每一步改革探索，都试图进一步深化认识，找到更符合国情、更适合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

成立之初，开行按照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和办行要求，筹集和引导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等“两基一支”重点项目建设，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破解瓶颈制约作出贡献。但受当时多重因素影响，主要是用财政的方式办银行，积累了大量风险，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 42.7%。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开行积累的大量不良贷款已导致难以为继。按照中央“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范金融风险”的方针，开行提出要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银行，用市场化方式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开启了向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的改革探索。由此也部分引发了市场化就等同于商业化的模糊认识，以及政策性银行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看法。



郑之杰

2008 年，开行被定位为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改革的方向发展。但受机构定位、债信支持、资金来源等不确定因素困扰，影响了开行服务国家战略作用的发挥。

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对金融改革的总体部署，开行为彻底解决影响自身发展乃至影响服务国家战略的问题，提出深化改革“三步走”战略，即解决长期债信、完善银行控股集团架构、推动开行立法。2015 年 11 月，国务院批准开行的深化改革方案，明确了开行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2016 年新《国家开发银行章程》获批，“三步走”战略的成功实现，使开行的改革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开发性金融也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开行紧随我国对外开放步伐，拓展国际视野，推动开发性金融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放发

展。1999 年，开行成立了国际顾问委员会。自此以后，每年邀请国际金融界和政界知名人士，为开行发展出谋划策，对中国经济提出咨询建议。2001 年，面对我国加入 WTO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开行主动与国际接轨，明确提出建设国际一流银行的目标。2005 年，开行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首次向海外派驻国别工作组，贴近客户、贴近项目，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2013 年起，开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完善国际业务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海外布局。时至今日，开行国际合作业务已经覆盖世界 197 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同时，开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进多双边金融合作，推动设立上合银联合体、中国—东盟银联合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银联合体等多边金融合作平台，不断扩大“朋友圈”，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开行的发展历程既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缩影，也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缩影。开行从政策性银行到商业银行，再到开发性金融机构，从与国际接轨到全球布局，二十多年的历程记录了自身改革开放的足迹。这二十多年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改变了中国金融的格局，使开发性金融作为独立的金融生态登上历史舞台，完善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这一瞬间凝结着解放思想、打破常规的观念突破，包含着披荆斩棘的历史转折，凝聚着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开行发展壮大关键，也是开行发挥更大作用的力量源泉。

开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发性金融道路的探索是否正确，开发性金融作用的发挥是否卓有成效，要靠事实来说话。多年来，开行忠实履行“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崇高使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作出重要贡献。

从成立之初，开行就担负着从资金来源上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及结构进行控制和调节的任务，以“两基一支”为重点，90% 以上的贷款投向煤电油运等重点领域，支持了三峡工程、京九铁路等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夯实国民经济发展基础。1998 年起，开行通过银政合作、共建融资平台，破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题，助力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拓展社会民生和国际合作业务，鼎力支持国家急需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开行主动配合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各项措施，全力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为促进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积极作用。



国开行支持的重大项目，新疆—兰州铁路（新疆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行主动适应新常态，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累计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 16.5 万亿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近 2000 亿元，开行资产中投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占比超过 80%。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任务，易地扶贫搬迁贷款惠及 911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贷款使 1039 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圆梦大学。大力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改贷款帮助 2000 多万户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助力重大基础设施引领“中国速度”，支持高速公路 1.6 万公里、高速铁路超过 1 万公里。参与发起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投贷联动支持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超过 1850 亿美元，实现互利共赢。

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开行自身也实现稳健发展。截至 2017 年末，开行资产总额超过 15.6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连续 51 个季度控制在 1% 以内，拨备覆盖率超过 530%，资本充足率超过 11.4%，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继续在改革开放中推进开发性金融实践

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是开行与生俱来的基因。开发性金融既是开行孜孜以求探索出的一条通向未来的发展之路，也是一条不断自我完善的改革之路。在探索的过程中，开行不断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对经济建设规律、金融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金融原理，形成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不折不扣得到落实；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必须坚持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必须坚持开拓创新，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融资需求；必须坚持风险防控，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这是稳中求进的机遇期，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期，是创新发展的机遇期，是共建“一

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期。新的发展阶段带来新的矛盾，靠什么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靠什么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靠什么来推进高质量发展？新的发展诉求要求改革不能停顿、开放不能止步。开行只有紧跟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响应时代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断推进自身的改革开放，才能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探索出更加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服务方式，才能在助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促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彰显价值，书写新时代更加精彩的开发性金融新篇章。■

进一步深化中欧贸易关系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法国前财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表示，如果欧盟能创建一个可信、稳定的环境，中国对欧盟投资将获得进一步提升，双方实现贸易平衡。



中欧贸易的数字既展示了积极的趋势，也释放出一些令人迷惑的信号。比如就贸易和服务而言，欧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进口贸易仅次于美国。贸易流通在过去十几年也有大幅的增长，对中国的进口贸易增加了 70%，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相对较低。贸易不平衡现象依然非常严重——贸易赤字占贸易总量的一半，2014-2016 这过去三年也显示，欧洲对中国的进口额还在增加，从 3000 亿增加到 3500 亿欧元，但出口仍然只有 1700 亿欧元。如何做好贸易的平衡，有效维护中英、中欧之间的和谐关系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

中欧贸易间的潮起潮落

根据欧盟的数据，欧盟对中国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在 2015 年达到了 1680 亿欧元，而中国对欧洲的 FDI 只有 350 亿欧元。由此可以看出，中欧外贸投资实际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平衡。同时，欧盟委员会也给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2017 年上半年，欧盟在中国的投资交易主要集中在汽车和航空基础材料行业，跟去年相比下降了 33%，主要的欧洲贸易国家是德国、法国和英国。中欧报告显示，中国对欧洲的 FDI 在 2017 年第二季度还不到 40 亿欧元，这是自 2015 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现在中国对欧洲的投资还有进步的空间——事实上双方的投资都有进步空间。

中国和欧盟的贸易往来给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带来巨大影响。所以，中欧双方都非常重视中欧关系，并在 2013 年签署了中欧 2020 合作战略，提出要“协同发展，加强合作，实现双赢”。中欧将通过这个战略计划提高市场准入率，加强投资、金融合作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倡导平等、尊重、互信的原则。这一合作战略同时也涉及网络空间保护、国防安全合作、政务以及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等其他方面的合作。中欧 2020 合作战略将为建立双边长期、双赢的贸易投资合作关系搭建最重要的框架。

为中欧交流提供更好的环境

很多人已经看到中国正经历非常积极的经济变化。第一，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提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它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的稳健，同时它也能够为以欧洲为首的贸易伙伴扩大市场规模。

第二，中国即将推行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并强调金融的稳定性。我们不仅希望看到金融服务业加快实现创新，更希望看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为现在流动性太强，但是世界各地的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还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让货币市场和金融活动得到较好的监管。我们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对中国人民的开放态度深表赞赏，中国开放的货币政策及金融稳定都将对欧盟及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第三，2017 年 6 月中国开始促进在自贸区的外贸投资。虽然有负面清单制度，但很多行业都已经放开了投资的监管，比如制造业、航空、货运、汽车、道路、交通、设备，以及电信、医药等等。银行和保险公司也清除了一些投资障碍。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些自贸区试点，比如深圳，需要国内和国际的投资才能保持它的吸引力。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政府继续推行这些政策，创造更好的政治和营商环境。中国在欧洲的许多投资也已初见成效，包括比雷埃夫斯港和图卢兹机场

但目前贸易不平衡确实存在，欧洲希望在中国进一步扩大欧洲在先进工业产品上的投资，并且想要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零售业市场之一。想要进一步增强中国对欧洲投资环境的信任和信心，欧盟国家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融合。第一是欧元区。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地从欧洲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开始恢复经济增长，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整合银行业和资本市场，让欧盟成员国团结在一起，共同治理欧盟。随着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欧洲现在有一股改革发展的势头，相信这将提高中国投资者对欧元区的信心。虽然英国脱欧带来了一些混乱，关于脱欧的谈判也一言难尽，但最终双方会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

我想在此重申欧盟对于中国的重视，我们非常欢迎更多中国的投资者来到欧盟。2012 年，东欧国家已与中国共建 16+1 合作平台，促进投资、贸易及文化合作。11 个欧盟国家已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我们看到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对欧盟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我们必须继续跟进这样的倡议。同时，欧洲投资银行与丝路联盟基金也已经签署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支持中国在欧洲的股权融资，欧洲投资银行也为中国八个省份的环境项目提供金融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让我们对中欧贸易保持信心，我们相信双方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长远目标法：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

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副主任陈炳才认为，以目标为导向的发展计划，有助于中国人民以大局为重，齐心协力朝着共同繁荣而努力。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国家长远目标

201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制定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工作思路和方法，也是中国改革以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

既往中国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目标的变化

中国的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目标不是不变的，而是根据国际国内时局变化进行调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奋斗目标，这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制定了党纲党章，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并分阶段实施。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就是打倒封建军阀统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1984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到 20 世纪末翻两番，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9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即 2021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就是到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即 2049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对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完善，增加了“美丽”，将“现代化国家”调整为“现

代化强国”，对 2020 年后的发展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有远大理想和长远目标。有了理想和目标，治国理政、发展经济等就有了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执政者就能始终不忘目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长远战略目标法和阶段实施法的作用

制定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首先，制定长远目标，有利于把握未来趋势，指导未来发展。国家有了长远目标，发展就有了方向。长远目标的实现需要制度和政策，因此长远目标是为稳定的制度设计和政



陈炳才

策制定服务的，它是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乃至调整的重要依据。提出实现小康社会和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与之适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就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门、产业和地方政策也是围绕这些目标来制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是以私有制、利润最大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及其开放、发展为前提制定的，兼顾社会公平政策。中国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是依据长远目标来设计的，长远目标兼顾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比如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调动农民增加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积极性，这是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和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进行脱贫攻坚，就需要制定详细的脱贫、扶贫政策，这也是保持国家长期稳定的政策。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前提不同，经济学分析的制度框架不同。因此，用常规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及其趋势，乃至根据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来判断中国经济趋势，往往会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其次，长远目标可以起到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和行动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各省、市等地差异很大，做法也不同，治理起来很不容易。有了一个长远目标，就可以使大家认识到，矛盾和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通过做大蛋糕来解决，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区域、城乡利益调整和存量利益结构调整来解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边缘，经济接近崩溃，思想认识不一致，力量不集中。制定了长远目标，目标与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地方、企业、个人都有积极性共同发展经济，从而使得国家经济强大，人民生活富裕，企业和国家竞争力提高。不仅如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问题和矛盾，甚至社会动荡，解决矛盾和方法就是始终围绕目标不动摇，保障政局社会稳定，在稳定的环境下，坚持改革开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外，在开放过程中，中国也面临众多国际社会思潮冲击和非议，包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价值观选择等方面的不同看法。中国始终坚持既定的目标和制度、政策设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改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改善公共服务，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成功的，改革、开放及其经济制度和政策也是成功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是成功的。中国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成功，道路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有多种选择，关键在于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家历史、文化、国情和社会特征的政治和经济等制度和政策。

最后，阶段法和步骤法是落实长远目标的重要保障措施。

长远目标不是当下所实现的，需要有历史的耐心，更需要当下的细心。需要分阶段、分步骤予以实现，甚至需要进程表和具体的工作任务表、制度和政策设计调整表。为保障长远目标的实现，中国政府每五年就制定国家发展的五年、十年规划，部门、地方乃至企业也会制定五年十年发展规划，并落实到具体项目、地点、企业、资金安排和政策设计及调整。不仅有五年计划，还会对年度计划和行动措施、政策保障加以落实。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到 2018 年，中国制定了八个五年规划，近四十个年度计划。

从实践来看，中国政府制定的长远目标都得到了实现。翻两番和小康社会在 1997 年就提前实现，每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也都提前实现。2017 年中国经济与 1979 年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巨大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000 美元以上，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地位也大大提高，过去中国人崇拜发达国家的商品，今天中国的很多产品开始出口到国外。

目标法是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经验。不仅是国家目标获得成功，部门乃至地方的目标也基本都是成功的。其能够成功，也在于长远目标的制定综合了国家长期发展的经验和不足，集中了国内外专家 and 不同部门人员的智慧，进行了深远的、全方位的思考和论证。

目标法是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经验。不仅是国家目标获得成功，部门乃至地方的目标也基本都是成功的。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成长，未来三十多年，中国将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需要建设现代化强国，这需要更全面的制度政策设计和调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实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共同富裕的政策，强调增长的速度，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未来中国将走向强起来，需要实行共同富裕，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长远目标及其要求的调整和改变，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也需要调整，因此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并出台适应未来发展需求的制度和政策。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制定长远目标和年度计划、五年发展规划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重视的经验。■

十九大后 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特点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方向，认为改革、全球化和混合制经济将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红利。

十九大以后的中国经济，将会变成什么呢？我认为会朝着以下六个方向发展。

第一，它将是梦想引领下的中国经济。这个梦想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它以两个一百年目标，三个阶段性的宏伟蓝图作为主要的构想。十九大以后的中国经济一定会以确保这个梦想实现为目标，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会更加平稳，更有质量。

第二，十九大以后的中国经济将告别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向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对内，它将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它将围绕着 2025 年的中国制造、互联网+，以及智能化等重要内容来重新构造我们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对外开放角度来说，中国的对外经济也要从 1.0 版向 2.0 版提升，它将以稳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点，构造一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负责任的形象，打造一个有助于中国崛起的新国际和平环境。

第三，它将以自贸区的建设作为制度安排，让国外企业、国内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获得公平待遇，一视同仁。在市场开放程度方面，要从过去的正面清单管理为主，转向负面清单管理。这个新的制度安排将对接国际的通行规则，为中外经济更好地融合提供制度的保障。在制度调整的同时，中国要进一步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些带有中国元素的新国际投融资平台，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外国企业走进来，来实现中外企业更好的合作，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建设，以及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动态转变

国际化经济将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 从过去的以贸易为主，要转到贸易和投资并重，即从商品输出为主转到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重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



邱晓华

- 由过去的引进来为主转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由过去国际贸易投资游戏规则遵循者逐步地转到既是遵循者，也是参与者和制定者。总而言之，是告别旧的模式，走向新的发展平台。
- 十九大以后的中国经济将顺应三个新的趋势，来实现它的新发展。
 - 1) 跨国经营的新趋势，大力发展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提升中国跨国经营的竞争能力。
 - 2) 积极推进跨界融合，也就是要拥抱移动互联网，对接智能化，构造生态圈，打造三个方面的跨界新通道，实现资源配置更协调、更和谐的发展。
 - 3) 顺应新阶段、新时代和中国经济政治新特点，实现跨所有制发展。因此可预计未来，中国在传统产业和传统经济方面，包括钢铁、煤炭、有色建材，将更多地以国有控股为主，实现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改变这些产业极度分散的状况；在新经济和新产业方面，更多地以新的所有制形式为主，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通过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构造新的所有制的形式，这方面将以民营经济作为混合所有制的主体。



中共十九大

· 十九大以后的中国经济将依赖和积蓄新的红利，改变旧的红利不断弱化的不利局面。新的红利来自四个方面：

- 1) 人口数量的红利，更好、更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为创新经济提供更好的支撑。
- 2) 全面改革制度的红利，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的改革，构造新的制度红利，推动中国经济的新发展。
- 3) 进一步发挥深度开放带来的红利，通过全球配置资源、全球组织生产、全球经营销售的新格局，让中国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和管理上拥有更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 4) 创新红利，通过对体制、机制、商业模式和技术各个方面的创新，实现创新发展。

总的来说，新的红利意在让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由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这样一个新的形势，

从要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到创新驱动为主，由工业支撑为主转到工业、农业、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新发展阶段。

· 十九大以后中国经济以实践五个新的发展理念作为重点，实现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和共享。这是国家前进的方向，也是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者应当去遵循的基本要求。可预期十九大以后这五个理念将会进一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创和谱写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从眼下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经济正在结束 2010 年以来的下行阶段，转向更平稳，更有质量，以优化结构为主，以增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主的新阶段。同时也将更关注社会发展领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是中国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FDI），它让中国成长为一个贸易大国，并带动了自主创新和科技的进步。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积极利用外资战略，不断创新外资政策和管理体制、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吸收外资大国。截至 2016 年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86.4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77 万亿美元。实践证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有效组合全球生产、服务、创新要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主要方式。目前外资企业数量虽占全国不足 3%，但进出口约占 1/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约占 1/4、税收约占 1/5、吸纳就业约占 1/10，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四个阶段

阶段一：1978-1991 年

这一期间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国家为了解决资金和外汇“双缺口”问题开始利用外资。除利用国外借款之外，先后颁布多项法令保护外商合法权益，通过制定实施减免外资企业所得税、免征进口关税、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于 80 年代初在深圳等地建立经济特区，率先进行开放的试点试验探索。1979-1982 年期间，我国累计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920 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17.69 亿美元。1983-1991 年我国外资企业由 638 家上升到 12978 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由 9.16 亿美元上升到 43.66 亿美元。这一时期虽然引进的主要是港台中小投资和加工贸易企业，但为后来的大规模吸引跨国公司制造业投资奠定了有利的开放政策环境和基础。

阶段二：1992-2000 年

这一期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快速成长期。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改善投资环境和管理办法，扩大引资规模，拓宽引资领域，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发挥我国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实施“市场换技术”战略，其目的是为了带动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1992 年我国外资企业 48764 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10.08 亿美元；2000 年制造业吸收外资占总量比重达 64%。大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效解决了我国发展的资金瓶颈，我国年平均外商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达 12% 左右。制造业结构不断升级，在轻纺、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优势的同时，汽车、装备、电子信息、机械、化工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2000-2004 年期间德国、日本的 30 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项目中，投向电子、汽车、家用电器的项目达 100 多个，其余主要投向通信设备、机械、电器和化工四大行业。

阶段三：2001-2011 年

这一期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结构调整和全面发展阶段。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开始承接跨国公司服务业为主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2002 年我国设立外资企业 34171 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527.43 亿美元。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 100 个服务贸易部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 62.5%。服务业外资进入不断带动国内的金融、物流、商贸以及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研发设计、专业咨询等服务业整体水平迅速提升。2010 年我国设立外资企业 27406 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057.35 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关口。2011 年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吸收外资的第一大产业。这一时期，外资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占高技术产品出口量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80% 上升至 2009 年的 84.5%，其中 2006

年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占比达 68.6%，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力量。

阶段四：2012 年至今

从 2012 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时期。2013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 1239 亿美元，居世界第 2 位。2016 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占总量比重达 70%。信息技术、综合技术服务、建筑、金融等成为吸收外资的热点领域，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物流中心、结算中心等高端服务业投资呈现上升态势。这一特征反映出我国依靠要素与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阶段基本结束，吸收外资重点逐步从以资金规模为主向引进技术、知识、人才、管理、服务等高端要素转变。近 5 年来，我国外资质量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在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7 年高技术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61.7%，占比 28.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 665.9 亿元和 1846.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3% 和 93.2%。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影响和作用

1995 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并不断根据我国产业发展目标进行调整。2017 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分别减少 30 条和 27 条限制性措施。

外商投资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推动我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在外资带动下，“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主要贸易方式，不仅解决了资金和外汇“双缺口”问题，而且为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奠定了基础基础条件。1987 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只有 5% 左右，1995 年以后 39% 以上，最高的 2005 年达到 64% 以上。2016 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也占全国的 46% 左右。

第二，促进我国实现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服务业大国的跨越。我国通过承接跨国公司制造业转移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通过引进国外连锁超市、大卖场等新业态引发了流通业革命，由百货店等传统业态

快速形成各种新型业态。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跨国公司研发设计、软件与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咨询、金融等服务业继续向我国转移，带动了国内服务业整体水平、国际竞争力提升和新兴服务业快速成长。

第三，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企业大量使用国内高管和技术人员，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培训，从而为国内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人才。如，2008 年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管理层有 70% 以上是中国人，本地经理的比例近 80%，中国员工达 1.4 万人。许多具有跨国公司工作经历的人员自己创办了企业；许多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高管人员和技术人员早期就职于大众、通用等公司；许多国内软件、研发、设计等企业的高管人员早期也就职于微软、IBM 等企业。一些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也曾有在加工贸易企业打工的经历。

从 2012 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时期。

第四，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我国一些企业通过合资之后，逐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仅 2017 年全国新增外资各类研发中心就超过 300 家。通过引进 FDI 的方式来引进技术是改革开放后技术引进的显著特征。如，2001 年我国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 90.9 亿美元，其中技术费 43.95 亿美元，占合同总金额 48.3%；2013 年我国签订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达到 433.6 亿美元，几乎是 2001 年的 10 倍。其中技术费 410.9 亿美元，占合同总金额的 94.8%。

第五，促进了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等一批开放平台的建设。这些平台不仅成为吸收外资的集聚区，也是技术创新的引领区和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区。目前，我国拥有国家级经开区 219 个、高新区 156 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16 个。继上海自贸试验区之后，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试验区又相继设立，辽宁等 7 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1+3+7”覆盖东中西部的发展格局。2017 年 1-9 月国家级经开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7.7% 和 16.7%，已形成二十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中国作为“非霸权的国际领导”，推动“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

庞中英，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全球经济治理向何处去？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将是什么？中国领导人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重申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原则，但是，“不称霸”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中国正在发挥着一种我叫做的非霸权的领导（non-hegemonic leadership）。

非霸权的国际领导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以亚投行为例讨论中国的非霸权的国际领导，以及这种国际领导正在推动的一种新型的全球经济治理——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

中国和已有（旧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 / 制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 2016 和 2017 年分别组织了“1+6”框架，即中国总理与六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对话。

中国发起的这一对话机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至关重要：第一，在国际秩序的危机时刻，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关键支持者。目前，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发展，如实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特朗普政府和脱离欧盟的英国政府。中国的所作所为，非但没有构成对现存世界自由秩序的挑战，反而在帮助维持和加强现存的世界自由秩序。中国目前的大外交政策恰恰是主张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第二，中国仍然愿意接受“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1978-2018），“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确实在中国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国的角度，“1+6”说明，中国的国内改革仍然需要“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通过他们，中国继续把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引进中国，内化为中国的国内治理。

中国和新建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制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已经是一个国际领导者。人们往往把领导与霸权

混为一谈。就中国的情况，领导并不意味着霸权。中国在亚投行领导，中国却不是亚投行中的霸权。亚投行里没有霸权。

说亚投行里没有霸权有两个意思：一是亚投行没有当今的世界霸权美国参加；另一个意思是在亚投行内部，出资最多的中国并不是如同美国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那样享受霸权地位（hegemony）。

中国一直希望、欢迎美国参加亚投行。美国将来是否参加亚投行等，在目前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一个个的多边机构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预期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加入亚投行。我们假定美国最后参加了亚投行，但是，除非修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美国在亚投行中不会如在世界银行那样拥有否决权，比中国的投票权肯定要小。

在世界上，没有美国的国际合作其实很多。欧盟就没有美国。东亚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如清迈协定（CMI）和东亚宏观经济研究合作（AMRO）等也没有美国；上海合作组织等也没有美国。

没有美国的国际合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没有美国的国际合作中，谁担任领导？

亚投行的情况表明，中国不仅在一个没有霸权的结构中充当了领导，而且通过中国的自我设限和亚投行的制度安排，中国这个国际领导并非美国那样的霸权，即中国在亚投行重大决策上并不享有否决权。

为了避免全球经济治理由于新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而进一步碎片化，新成立的机构特别注意与已有机构之间的协调，避免与已有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冲突。亚投行的诞生，当然是对已有的世界银行等的挑战和竞争。但是，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则开展了很好的协调与合作。

这里有必要提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The New Development Bank）。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最大区别是：亚投行没有霸权却有领导，金砖银行不仅没有霸权，而且也没有领导。亚投行的影响远远超过金砖银行，原因正在这里。



庞中英

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是没有霸权的全球经济治理吗？

亚投行本身的使命与初步实践等于回答了在西方担心的“新的”或者“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机构”是什么，以及对未来意味着什么的大问题。因为亚投行是一种没有霸权的国际组织，代表的是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

人们充分注意到中国在亚投行中的主导性，即中国试图通过亚投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却忽略了亚投行对中国的约束或者治理。实际上，亚投行是中国把自己的手脚自己“捆绑”起来，以求获得他者的信任。中国的这一行动，为他者提供了治理他们面对的“中国挑战”的机会。有人认为，“亚投行的创立意味着把中国的资金放在多边治理的框架下（其他成员国政府可以阻止中国做出融资决定），而不是让北京方面随心所欲地把资金投向世界上任何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众多的欧洲国家不同于美国和日本而参加亚投行的主要原因。奉行多边主义的欧洲国家最知道多边机构的价值。亚投行必须遵守其在环境和人权保障以及透明度方面的标准，才能走向亚投行宣称的“最佳实践”。

什么是他者眼里的“中国挑战”？在 2010 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China Development Bank)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China Export-Import Bank) 等的全球活动意味着，中国提供的海外发展贷款超过了世行。“中国最大的两家双边开发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China Development Bank) 和中国进出口银行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截至 2014 年底有 6840 亿美元的未偿贷款”。

“一带一路”相比国家开发银行或者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更大的全球行动，构成他者的“中国挑战”。未来的全球治理，从他者的角度，要治理的对象包括“一带一路”。这是主张中国积极参加全球治理的中国政策制定者不愿意面对的。

受到亚投行在启动阶段的巨大成功的启发，我在 2015

年最早呼吁中国政府主动进行“一带一路”的多边化。后来，中国强调“一带一路”需要“共建”，以便以此解决“一带一路”的国际合法性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和遭遇到的国际阻力。

目前，在世界许多地方，全球化陷入危机。而世界最大的通商国家的中国非常焦虑“去全球化”，采取了支持全球化的政策。“一带一路”就是支持全球化的继续。

中国支持全球化的主要理由不是别的，而是其一贯的“受益者”理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需要自由贸易的国家等都相信“受益论”，但是，如果继续支持过去的全球化，势必与那些全球化的“受害者”形成进一步的冲突。目前的中美关系之所以持续紧张，主要原因是中国鼎力支持全球化，而美国则要求中国大让利，以解决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受损。这种矛盾几乎是难以调解的。

如果未来的世界进一步走向多极化或者无极化，亚投行之类的有领导但无霸权的国际组织可能发挥更大作用。

讨论一种不是霸权的全球领导，尤其是建构一种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对 21 世纪的世界意义重大。未来的世界需要领导，但不需要霸权。与 20 世纪不同，领导不应是霸权。

中国不是取代美国的霸权，在美国权力暂时淡出（我们不知道这个时期将多长）之时，去充当本来应该由美国扮演的全球治理角色。这一点许多人已经正确地指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亚投行给出了部分的积极回答。

结论

与美国奥巴马政府等对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担心正好相反，诞生在有多边体制的危机时刻的亚投行，在抑制全球经济治理的危机方面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亚投行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

不过，接下来，我们又面对着新的问题：亚投行这样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是可持续的吗？

亚投行仍然处在其发展的初期，上述问题的答案不在任何论文中，而在亚投行创始行长金立群说的亚投行的未来“实践”中。

亚投行可能对“一带一路”具有示范意义，“一带一路”要实现在多层次上的多边化。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一带一路”的示范地区，如中国与 16 个中东欧国家组成的“1+16”合作框架。中国要与世界“共建”这个“一带一路”，为此，中国举行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 年 5 月 14-15 日，北京）。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带一路”最终能否如同亚投行那样成为新的全球多边体制一部分，还需拭目以待。■

挑战与希望： 转型升级中的中国海洋经济

韩立民，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李大海，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战略规划部副部长

海洋孕育了人类文明，也承载着人类未来发展的希望。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世界各沿海国家纷纷将目光投向海洋。海洋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军事竞争的新舞台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新屏障。我国对海洋事业发展十分重视，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更好更快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的重大战略使命。

蓝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支撑与资源保障

海洋总面积达 3.6 亿平方公里，占全球表面积 70% 以上。我国管辖海域 300 多万平方公里。海洋中的生物占地球生物总数的 80%，远远超过陆地，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来源。海底蕴藏的油气资源储量约占全球油气储量的 1/3。天然气水合物储量是全球石油天然气储量的两倍。深海大洋底分布着广阔的多金属结核沉积区，据估算，多金属结核锰含量 4×10^{11} 吨、镍 1.46×10^{10} 吨、钴 5.8×10^9 吨、铜 8.8×10^9 吨，相当于目前全球年均消费量的数千倍到数十万倍。全世界的海洋潮汐能总功率约 3×10^{10} 千瓦，波浪能约 7×10^{10} 千瓦，可开发利用海洋温差能约 2×10^9 千瓦，海面大气中的风能平均总功率估计约 2.25×10^{17} 。全世界海水储量约为 1.318×10^{17} 吨，约占地球总水量的 97%。海水含有 80 多种化学元素，各种盐类约 5×10^{16} 吨。以海洋资源和空间开发为主要目标，我国逐渐发展形成了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十二个主要海洋产业，并联动发展了若干海洋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海洋经济。

换挡失速：海洋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2016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7.05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5%。2011 年 -2016 年，海洋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 9.1%，高于 GDP 平均增速。2012 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大波动。“十二五”期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较“十一五”期间下降约 5 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始终保持在 9.5% 左右，近 5 年来变化不大，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主要海洋产业分化比较明显：受资源与市场的双重制约，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海洋交通运输等传统海洋产业发展势头放缓，海洋油气业大幅下滑；与之相对应，滨海旅游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海水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迅速扩张。海洋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2015 年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2016 年，我国主要海洋产业中，传统的资源依赖型产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海洋矿业）比重下降到 20%，海洋制造业、工程建筑业和新兴资源开发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

转型升级：海洋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开发方式看，资源依赖型发展特征依然比较明显，初级产品开发仍在海洋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在 10 个非服务业主要海洋产业中，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等 6 个产业系海洋资源直接开发活动，占增加值的 54%。海洋加工制造业增加值仅占 26%，海洋工程建筑业占 20%。这种结构性特征使海洋经济受资源可开发量（如渔业）和初级产品价格（如海洋油气业）的影响非常明显。



我国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实现了我国天然气水合物开发的历史性突破，对促进我国能源安全保障、优化能源结构、甚至对改变世界能源供应格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空间布局来看，海洋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近岸海域，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近年来，我国对深远海开发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总体而言，除海洋捕捞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各主要海洋产业高度集中于近岸海域的空间格局仍未改变。在一些海洋产业聚集区，特别是半封闭海湾和大城市周边浅海，海洋产业竞争性用海矛盾日渐突出，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空间制约越来越明显。而离岸海域和广阔深海大洋，除部分渔业资源和航道空间资源外，总体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

从要素构成来看，我国的海洋产业仍属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创新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在 12 个主要海洋产业中，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船舶工业等 5 个传统海洋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大达 91%，深水油气、海洋生物医药、海洋高端工程装备、海水淡化、海洋能等海洋新兴产业占比仍不足 5%，深海金属矿产、天然气水合物、海洋温差能等新资源尚未实现商业开发。

动能转换：培育海洋经济增长新空间

改造提升传统海洋产业。把科技创新作为突破资源与市场制约的根本动力，提高科技要素对海洋产业发展的贡献率。海洋捕捞业，要瞄准全球新资源开发，严格控制近海捕捞强度，加大远洋渔业投入，积极参与以南极磷虾渔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渔业资源开发竞争。海水养殖业主要针对近岸养

殖空间趋于饱和的实际，大力拓展离岸海洋空间，发展海洋牧场、深水工程养殖等新兴集约化养殖模式，开拓海洋食物增长新空间。海洋油气业要适应全球油气开发深水化趋势，以深水边际油田、稠油开发为重点，努力在装备自主化和降低开采成本方面下功夫。海洋船舶工业要以船舶设计、高附加值船用装备、绿色船舶为发展重点，加快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步伐。海洋化工工业以海洋油气加工和海藻化工为主体，进一步延长加工链条，丰富产品谱系。海洋工程建筑业要抓住沿海开发和南海开发有利契机，突破跨海桥梁隧道、港口、人工岛等大型工程建筑关键性技术，大力开拓全球海洋工程市场。

加快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突破战略新资源开发的核心技术，探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和相应的商业模式。扩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海洋产业中的比重。海洋生物医药业要进一步扩大基础研发规模，重点加强中试和预商业化环节，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应用的瓶颈；扩大海洋功能食品、生物制品、生物材料开发和应用范围。海洋电力业要进一步推进从滨海电力到海洋电力的转变，认真借鉴欧盟海洋风电、潮流能发电、波浪能发电商业开发模式，加快海洋能开发商业化步伐。海水利用业中，以海水淡化为重点，一方面着眼于满足沿海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及用水需求；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海岛、海上平台、船用海水淡化需求，探索低成本高效率运行的商业模式，逐步实现淡化海水并入市政管网，加大海水直接利用在城市大生活用水中的比例。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要围绕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发展的装备需求，以海洋油气平台装备、工程机械装备、探测监测装备、电力和海水淡化装备为重点，尽快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较大规模的新兴产业集群。

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海洋服务业中的比重。强化信息网络技术对海洋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作用，积极推动传统海洋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海洋交通运输业发展要适应海洋物流信息化发展趋势，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提高港口航运效率，建设“智慧海洋”“智慧港口”，发展新一代海洋物流体系。在不断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滨海旅游业要依托海岛开发、人工岛建设、海洋牧场、深水工程平台、邮轮游艇等新载体，大力开发海上运动、休闲渔业、情境体验、高端度假等高附加值特色产品，推动从滨海旅游向海洋旅游的历史性跨越。根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总体要求，逐步增加海洋科教投入，加快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发展，强化海洋经济发展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中非经贸合作四十年： 回顾与展望

黄云卿，中非发展基金研究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通过不断地适应、调整、形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积极推动者和国际经济秩序公平的最坚定维护者。作为中非关系的“压舱石”和“助推器”，中非经贸合作在这四十年中的发展深化与提质升级，尤能够体现出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这一重大变化。

20 世纪 80-90 年代：打开局面

中非经贸合作的新局面得以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



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迅速打开，反映出当时中国与非洲国家寻求外部支持的迫切需要。从更大的世界格局变动看，冷战的结束不仅为经济全球化加速整合了被不同意识形态割裂的世界市场，更为中非经贸合作释放出了快速发展的源动力。

20 世纪 80 年代，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身经济政策失当等因素影响，经济结构脆弱的非洲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据世行统计，1982-1988 年间，非洲外债总量从 1400 亿美元骤升至 2340 亿美元，负债率、偿债率等指标严重恶化。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确立了明确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何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对于财政能力极为有限而又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非洲国家而言十分重要。彼时，西方普遍将非洲视为“无望的大陆”（The hopeless continent），对非经济援助和投资规模不断缩水，促使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急需突破西方束缚、缓解外部压力的中国。由此，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基于寻求民族独立的相似历史而建立起的政治互信之上，开启了加强经贸合作的新局面。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全面推进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FOCAC）在 2000 年成立，中非经贸合作朝着更机制化的方向迈进。中国政府陆续推出深化中非经贸关系的多项务实举措，既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也丰富了中非合作成果与中非关系内涵。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扩大了中国对非经济和技术援助规模，提高了对非融资支持力度，更推动了中非经贸合作从一般商品贸易向加工制造的纵向转型，实现了从工程承包向投资并购的横向拓展。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03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不足 7500 万美元，存量不足 5 亿美元。2006 年北京峰会召开后，中国对非投资开始加速增长，2007 年投资流量骤增至 16 亿美元，存量则增至 45 亿美元。

十多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助力下，中非利益融合持续深化，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并涌现出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截至 2016 年末，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额达 1492 亿美元，连续八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 399 亿美元，较十年前年增长 15 倍。2017 年上半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达 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对非贷款余额已超过 900 亿美元，约占中国海外贷款余额的 16%。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发布报告称，已有超过一万家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落户。目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越来越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

前，中国已成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和最主要的贷款来源方之一，非洲则是中国企业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投资目的地。

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用“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为新时代的中非合作描绘了广阔前景。随后提出的“三网一化”建设和“十大合作计划”，标志着中国将继续加大对非洲工业、农业、金融、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不同领域的支持力度，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从资源类产品主导的贸易模式转向多方位的投资与立体化的产能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

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 年议程”具有实质性的相通之处，即通过平等合作、优势互补来实现国家之间的包容性增长与共同繁荣。当前，中国政府正积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产业升级调整必将进一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非洲本身具备庞大的资源优势与市场潜力，随着非洲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其对中国产能转移的承接能力将不断提升、潜能将不断释放，非洲国家最有可能甚至率先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逐步落地，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与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求将更加契合，中非经贸合作会迎来更多机遇。

然而，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非洲经济在经历快速增长后，增速开始逐年走低，从 2010 年的 5.8% 降至 2015 年的 3.7%，2016 年进一步下探到 1.7%，创近 20 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在快速增长期通过举债对基建和生产性领域的大规模投

资，再次导致非洲国家的债务规模迅速攀升。据世行统计，当前非洲外债总量已逾 5000 亿美元，莫桑比克、

由此，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基于寻求民族独立的相似历史而建立起的政治互信之上，开启了加强经贸合作的新局面。

津巴布韦等国甚至已经出现债务危机的端倪。从短期来看，巨大的偿债压力将会损害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治理与财政健康，中长期更将阻碍非洲的经济转型和多元化发展，进而对中非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挑战。

当前，非洲工业化整体上仍处于将起未起的阶段，鉴于多数非洲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绝非朝夕之事。中国作为非洲重要的经济伙伴（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通过运用自身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来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工业体系、完善产业布局、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以更强有力的姿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全球化进程，不仅是中国长久以来对非洲的庄严承诺，更是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第一）将以何种方式塑造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实践。鉴于此，将于 2018 年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如何规划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蓝图，就更为令人期待。■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 回顾与反思



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 回顾与反思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时联、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张嘉明认为，经济危机不像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国家要加强监管，防止全球化衰退，确保经济健康、稳步增长。

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对全球经济造成深刻影响，十年后的今天对全球金融危机进行重新审视仍然具有镜鉴和警示意义。2017年11月，来自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的官员、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齐聚广州，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4届全球年会上共论“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展望未来。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经济复苏与金融风险并存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危机爆发十年后的今天，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欧元区复苏态势明显，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中步入新常态，世界经济整体上进入复苏通道。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前景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可以说，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经济复苏和金融风险并存的状态。

中国是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经过增长缓慢的十年，全球经济已开始复苏，在此过程中G20扮演了重要角色，各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如加强金融监管、构建全球区域及双边金融安全网等。IFF联合主席、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指出，在这个时期，亚洲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推动的引擎扮演了领导角色。“2016年亚洲贡献了全球68%的增长，2017年IMF预计亚洲仍将贡献全球63%的增长，其中中国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韩升洙如是说。中国对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同。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在谈到中国经济弯道超车时指出，近十年来，“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快速上升，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出口美国的低端产品和中高端产品都有大幅增长。出口的高铁、工业机器人、新能源车都是世界第一。中国自主

摸索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沈建光认为，中国实力的加强改变了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良好基础。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存在潜在风险

当谈到当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时，各国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家普遍认为，目前世界经济仍然存在着潜在的风险。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十年，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开始恢复增长，但尚未摆脱低速低迷的困境。IFF副主席、法国前财长阿尔方戴利，回顾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走势，他表示，虽然世界经济表现向好，但“其实全球还没有完全脱离危机，而且鉴于当下全球不平衡的情形，有再次出现类似危机的可能性”。他还强调：“现在的全球经济情况看上去不错，利率较低，油价较低，流动性充裕，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大家都觉得富有。但是从未来看，目前的货币环境是不可持续的，将来金融市场势必调整，很多国家累计了或公或私的高额债务，地缘政治环境也不稳定，这些都蕴藏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沈建光也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和政治危机并存。更具体地，沈建光指出，当前主要经济体GDP回增，但主要表现在资产价格上升、资本市场繁荣，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也同时存在。他认为民粹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央行量化宽松使得实体经济、劳动生产力提高不多，而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贫富差距扩大。

就国家层面而言，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与会学者基于全球化的视角，分别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研讨。阿尔方戴利认为，欧美主要经济体都有一些潜在危险。就美国来说，虽然以前美联储实施的货币政策成效不错，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货币政策不可能持续，市场泡沫越来越大，将来随时有破灭的风险。欧元区方面，量化宽松的结果是迫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去购买国债，这其实隐藏了欧元区各成员

国之间金融市场破碎、分裂的现实情况。同样在谈到美国时，太平洋养老金协会（PPI）前首席执行官万德博格则指出，美国监管环境的变化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并将对全球未来 5-7 年的增长动力造成影响。”万德博格还说，目前全球政治上还存在不确定性。当前美国采取针对企业的减税措施，企业资产质量有所提高，商业信心和全球贸易也提高了，投资者行为相比过去更为积极，金融稳定性似乎也在提升。然而，现在仍然存在许多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既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现，还有从过去的多边变成单边主义。危机后全球政治环境比较特殊，“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万德博格以美国本届总统大选为例，分析了此类事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她指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正在推出一系列新的监管方式，货币、银行等方面的监管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的监管环境和监管制度将可能对市场形成许多新的挑战。

就中国而言，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沈建光认为防范金融风险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中国政府布局的去杠杆十分重要。他强调，中国的问题是货币乘数上升快，广义货币在过去十年间增加庞大，存在金融风险隐患。与此同时，治理房地产泡沫、控制信贷、控制债务，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之一是经济较为严重的脱实向虚趋势。“金融一定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是全社会进行正视听和正认知的过程。从十九大报告透露的八大改革的着力点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来看，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防范黑天鹅，更要防范灰犀牛。”万喆说。

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强化金融监管，走符合国情的改革之路

首先，有学者总结出关于经济危机的一些经验性规律。万喆指出，从历史上历次经济危机的共性看，一般在危机发生前的数年，美联储的政策都是由宽松转向紧缩，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资本大量流出危机国家。此外，还有专家剖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祝宪总结道，十年前发生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各个国家经济政策改革的力度不一样，所以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祝宪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全球化倒退问题，主要是再分配的不公平引起的。”

2008 年金融危机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给全球决策者以深刻

的教训，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政策框架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对此，IFF 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从监管的角度进行阐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以下三点值得重视：第一，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根本的要求。由于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如果不能及时进行预防和控制，就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第二，金融监管要立足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金融一定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一定要优化金融结构，一定要深化金融改革。第三，要注重把握在金融运行当中出现的一些金融风险，如贪快求全，监管制度不执行等。要弥补监管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加快完善监管制度，清理金融市场乱象，引导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

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教训，发展中国家也在金融危机中总结出一系列应对经验，巴基斯坦的经验就值得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分享了在巴基斯坦的经济改革中，审视国情、坚持适合自己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故事。“1999 年，巴基斯坦经济曾一度跌入谷底，国家储蓄已经处于负状态。在国家经济处于极端崩溃边缘的时候，IMF 提出了非常苛刻、且不符合巴基斯坦发展的援助条件。那时我临危受命，没有按照 IMF 的要求去改变，而是在发展产业、解决就业方面进行了大力改革。”阿齐兹强调：“最重要的不是依赖别国或国际组织进行经济援助，而是需要发展自己的策略，想办法摆脱困境，要用新的思维去改善经济结构。”阿齐兹还说，“其实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监管宽松、私有化、自由化是巴基斯坦改革中的三个关键词，建立私有化的竞争策略，同时实现自由化、开放市场、开放资本流动、开放外币的竞争渠道是最非常重要的举措。

全球金融创新中的新图景： 金融科技创新，却也是一把双刃剑

近年来，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创新方兴未艾，但这种基于科技的金融创新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以 IFF 第 14 届全球年会为契机，相关专家学者就金融科技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技术的变革推动金融体系的变革，首当其冲带来金融体系的“去中心化”。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教授认为，联网技术带来新经济的升级以后，新经济对应的央行和商业银行或者银行系金融机构的监管关系和逻辑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联网技术是能够去掉传统央行和清算体系经济的终结技术。他指出，如果区块链技术出来，人们

能够用另外一维的技术重建中央银行的顶层账户，一二级清算、三级四级结算和五级支付，这个体系在另外一个领域建设，去传统中央银行化的现象就会出现。

在讨论金融科技创新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金融科技创新的积极意义。金融领域的学者对金融科技创新表示肯定。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指出，“金融科技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工作，在风险识别、风险管理和缓释、风险化解三个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他以银行业为例向会议介绍：“大数据和互联网把社区、消费场景、个人信用联系起来，更精确、更普遍、更低成本地抓取客户，通过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分析信用记录数据，更好地评价个人信用。以管理和缓释风险为例，在做供应链融资的时候，区块链的技术要求合约的各方都同时在计算机上或者在互联网上进行登记，分类账户，这时贸易真实性与各方合约的有效性就有很大的约束，对于管理和缓释风险起很大的作用。”来自互联网技术领域的专家也对金融科技创新持赞赏态度。亚太网络空间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闫伟宁介绍 IPV9 在金融系统中的应用，并指出 IPV9 必将会在包括全球金融体系及其他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IPV9 和 IPV6、IPV4 的比较优势在于，它具有更大的存储能力，还能够保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支持资产地址空间锚，IPV9 能确保 IPV9 实现数字货币地址加密。”闫伟宁解释说。在谈到这轮汹涌来袭的技术革命时，微软（中国）首席技术官韦青指出，数字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效率的极大提高，他表示：“效率提高相当于成本下降。数字化通过把物理世界变成 0 和 1，再用软件定义一切的方法使得同样一个社会、同样一个金融行业，它们所能承载的行为存在对象的效率就比原来高了很多，这个其实就是数字化的本意。”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的挑战。eGeneration 集团主席 Ahsan 强调，“在目前世界上，各国金融体系、国防体系和安全都可能受到网络袭击的威胁，信息的安全性是无法避免的挑战和问题。”IFF 学术委员、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学院院长贾圣林则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提出金融科技化、跨界化、智能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一是金融监管可能会滞后于市场的发展；二是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监管可能会相对滞后于国际一些先进的做法；三是如何监管我国的金融巨头使之能兼顾服务国家利益与消费者利益。

无论科技还是金融，抑或二者的结合，都要以人为核心、为人类服务。韦青指出，在创新的过程中，不能产生技术迷信论，因为技术再怎么先进，它也是为人服务。他提到，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也好，归根结底是数学或工程学，它只是一种工具。“这个世界上极少数人需要研究和开发这种工



具，但需要整个社会的人都会使用工具。谁能够高效地利用这种工具，谁就能赢得这轮工业革命先机。”韦青认为。

对于当下的中国，金融科技正迅速兴起且方兴未艾，而中国在金融科技的市场规模和创新深度方面，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强调：“我们一方面既要眼睛往外望，不断地吸收借鉴各国发展金融科技的良好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眼睛向内看，要立足中国的经济金融实际，充分考虑中国在市场基础、制度环境、监管安排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致力于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信息化时代要求的金融科技发展道路，为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他强调，要把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及是否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基本评判标准，从而积极稳妥地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绝不能搞脱离自身发展阶段、超出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的过度创新，更不能搞打着创新旗号、规避法律监管、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伪创新。李东荣还结合自己金融监管和治理工作实践，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要注重价值导向和创新实现的动态校准。第二，要注重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第三，要注重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的适度平衡。第四，要注重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的有机协调。

后危机时期全球金融治理： 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话语权，中国将发挥更大影响力

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需要各国的协同努力，这一认识已经在此次会议上达成共识。万德博格认为，各国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稳定经济结构，希望全球成为更加整合的经济



体，从整体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推进政策和监管方面的改革，形成更加稳健的经济体系。埃德蒙指出，除了各国进行内部改革外，各区域、国家间也要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应对全球发展不平衡，较好管控未来金融风险。

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应该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巴基斯坦前财长、国立科技大学院长 **Ashfaq** 强调，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制定监管规则方面仍处于弱势，这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的贡献不匹配，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制定规则方面拥有更多发言权，这有利于加强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对于全球化不满的情绪根源在于决策过程，有些发达国家拥有过多的发言权，这导致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承受了不必要的惨重损失。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代表性并不匹配它们对全球的贡献，这种状况是不公平的。” **Ashfaq** 的观点也得到了中国专家的呼应，祝宪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他指出，目前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主要由美国及 OECD 国家制定，这些国家不仅在制定规则时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采用双重标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没有得到合理的满足。“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还没有拿出一套清晰、可操作的方案改造和改革现在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祝宪指出，“一带一路”在此方面大有可为，“它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

此次参会者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但他们都赞同并呼吁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韩升洙认为，即便存在脆弱性和风险，他坚信亚洲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中国有资源支持和缓冲。在政治方面，

中国也有决心完成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改革。基于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强调包容性普惠的增长，而不再专注于短期的增长目标。二是解决财政部门的风险、降低信贷和协同监管。三是强调资产特别是外国投资的品质，“中国的市场的稳健性对很多国家都很重要。”韩升洙说。

Ashfaq 强调，中国将在领导全球经济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更符合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公平性。**Ashfaq** 进一步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努力，一方面，在现有的全球金融体制中发挥作用，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减少了美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建立新的机制和新的融资机构，中国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补充了世行、亚开行等机构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不足。对于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国内代表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局长王景武指出，近年来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不断推进 IMF 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正在成为未来全球金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领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推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存量的改革；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主动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运用金融工具，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必须重视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申曙光强调了系统性风险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危险性，并提出建议。申曙光认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应该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而非技术性、操作性的风险。他认为系统性风险更多存在于金融系统的结构和方向中。申曙光据此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需要调整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为此，申曙光建议，“金融应往民生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四个方向进行调整。”第二，要增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申曙光认为，“金融系统应该是多主体开放系统，是共赢、公平、公正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量、金融体量大增，目前的金融治理体系与这一情况不相适应，需要增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话语权。”第三，要充分认识保险业的价值，更加重视保险业的发展。申曙光认为，“保险业在金融体系里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稳定作用，可以借鉴保险业的体制和经验，为金融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自主承担危机，打破改革瓶颈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认为，发展中国家需理性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1999年我被任命为巴基斯坦财政部部长，上任之初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交涉。

我观察到 IMF 的人受制于自己的结构，采取统一标准式的做法，对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同一套方案，无法有效解决巴基斯坦的问题。受限于资金，巴基斯坦最终还是接受了 IMF 的方案以获得贷款。但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制定了自己的改革议程，提出要创造就业，并打破面临的瓶颈——当然最重要的是促进经济的增长。

巴基斯坦拥有 2 亿人口，识字率较低。为了让民众快速了解政府的改革决策，我给出了三个关键点——实现自由化、监管宽松化和私有化。这三个主要的关键词在当时的结构性的改革里没有出现，IMF 也不感兴趣，但这是我们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释放市场力量，降低债务。

做大市场这块“蛋糕”

巴基斯坦通过自由化、监管宽松化和私有化开启改革之路，市场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以电讯公司为例，私人资本进入后，行业立即获得新技术发展。除此之外，原本国有化的银行体系一年后全都走向私有化，由于过程透明、公平，我们没有收到类似徇私、走后门的投诉。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之后我们将私有化延伸至其他领域。私有化是我们经济复苏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一定要跳出老的思维框架，不能僵化死板。OECD 国家往往有这种固有的想法，但我们发展中国家其实可以更具灵活性。

结构性改革政策执行后，巴基斯坦的 GDP 在五六年里翻了两倍，经济总量增大带来了无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国民消费获得提高，外资也排队进入国内市场。而在这之前我们很难获得外资。

所以，我想向发展中国家建议，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法是依靠自己的发展策略，而不是将 IMF 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当然，国家可以向 IMF 寻求咨询和帮助，但必须先有自己的结构性改革计划。我觉得结构改善和提高不光针对发展中国家，



阿齐兹

发达国家也要改革。改革有助于跳出框住思维的盒子，找到新思路。OECD 国家往往认为自己不需要改革，事实上哪个国家觉得自己不需要改革，那肯定就面临麻烦了。

我们的改革颇具成效。就业有所增加，消费水平也有所提高，原来骑自行车的人五年后换上了摩托车。我本人两次看到了本田的摩托车厂在巴基斯坦扩容。之后，铃木也进入巴基斯坦市场。原本的国有电信公司效率极低，我们通过公开拍卖出售给一家来自阿联酋国家的公司。现在，巴基斯坦已经有五六家电信公司。

竞争是改革和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径，因为它迫使企业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今天，移动网络覆盖了整个巴基斯坦，甚至偏远的小村庄。这不仅改变了巴基斯坦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经济活动。巴基斯坦的成功是建立自己的战略，并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巴基斯坦也会坚定地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发展战略，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当其他国家干预你内政的时候，你只



能跟着做，放弃自我管理的权利；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想法并敢于负责——不管想法对或错——最终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未来发展战略

我分享巴基斯坦的经验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发展策略——巴基斯坦的策略即自由化、开放市场、私有化、开放资本的流动、开放外币。虽然巴基斯坦是一

个小国家，只有 2 亿人，但跟大国面临相似的挑战，只不过具体的应对方式不一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败，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他们只有一个标准做法，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开放想法，创造一个让各个政府自己定政策的环境，而不是一味告诉他们如何去做。每个国家都要牢记，变革不是出于害怕，而是一种主人翁精神，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亚洲新崛起 ——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认为，亚洲特别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



上海铜牛雕像，象征坚忍、勤劳和财富



韩升洙

全球增长经历了缓慢的十年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全球经济正在逐步复苏。2017年10月，IFF提出全球在2017-2018年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2017年的增长预计将达到3.7%，2018年则达到3.9%。

G20成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希望通过对全球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进行大型改革，确保金融的体制在未来可以吸收这些冲击，确保正常运作。G20为稳定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上几大经济体都加强了金融监管，并实施反周期的微观审慎监管。但让人失望的是，经济复苏依然乏善可陈，并且持续了十年之久——这在几个发达国家尤其明显。

从欧洲到美国都经历了长期的缓慢增长，并引发了政治风险以及反全球化、反全球贸易等问题，比如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英国脱欧。虽然我们面临许多困难，但亚洲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表现亮眼。在全球缓慢增长的时期，亚洲及中国扮演了领导角色，成为全球经济的推动引擎。2016年，亚洲贡献了全球68%的经济增长；2017年，国际金融论坛（IFF）

的数据显示，亚洲贡献了全球63%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占了一半。这些都为全球经济结构改革带来了机会。

中国的杠杆危机

但是，亚洲和中国的增长故事也不完全都是非常美好的，新的经济脆弱性也逐渐暴露。其中，债务和养老金问题尤其突出。比如，按国际标准，中国的信贷对GDP的比例现在非常高，公司债务占GDP的165%，家庭债务也在快速上升，未来可能会有风险。高杠杆不只在中国出现，很多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也过度依赖信贷和扩大预算。可以说，高杠杆和信贷过快扩张在亚洲是一个突出问题。

为此，中国在中共十九大上出台了一些列应对政策。

第一，不再专注于短期的增长目标，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要修正过去宽松的信贷增长，强调包容性、普惠性的增长，而不是高增长。

第二，加强协同监管，应对金融领域的风险。中国成立金融稳健和发展委员会是一个受欢迎的举措。

第三，提高投资质量，特别是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质量。这些海外投资其实占被投资国的GDP比例较大，会影响到他们中期的债务稳健性，要妥善处理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和获益性，增加它们的活力。所以中国的市场稳健性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与全球的经济、贸易、财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现在中国是100多个国家排名前十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些国家的GDP超过了全球的80%。所以，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既是福音，也潜在巨大的风险。

总的来说，虽然亚洲经济存在脆弱性和风险，但是我相信亚洲以及中国的发展仍然非常关键的，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中国具备资源、知识储备、缓冲力和政治决心实现平顺的改革，成为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管理金融风险，应对金融脆弱性从来不易，但是我们要随时保持警觉，快速推动改革，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 全球化复兴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认为，依靠结构调整和改革，提高发展中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成熟度，壮大它们的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现在都开始恢复增长，至少和一年前相比，无论是市场还是国际金融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都比过去更为正面、积极。但同时世界经济并未跳脱出 IMF 所说的平庸经济（new

mediocre），未见主要经济体的强劲增长。正如一些评论所言：世界经济增长的前途可能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这或许不算一个太差的评价。

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做好准备：



我们未必能够看到下一轮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因为十年前发生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周期性的，也可以说是结构性的。

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及改革方向和力度不一样，但从政治、经济、社会整体而言，我个人认为目前改革还不到位。就好比本应该进行比较快速手术的地方我们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疗法。在很多国家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可能也不得不如此。所以就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而言，政策不到位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全球化的回潮

我想从以下两点来谈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再分配的问题。因为这 10-20 年间，在金融领域和其他领域再分配的不公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低收入、中产阶级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一点我认为在下一轮的经济改革和全球治理中不应该被低估。这同时也反映了旧经济和新经济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西方国家现在民粹主义抬头，一些既得利益者对全球化的认知非常消极甚至反对全球化，这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不应该低估。

中国面对这种复杂的、不确定经济形势要做好应对准备，完成自己的使命——即在十九大的形势之下深入改革，特别是改变自己经济结构中的失衡问题，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更快地转型，转向质量型、效益型，而不是进行投资性、扩张性、外延性的经济发展的模式。

其次，不少人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已经不适合全球化的新要求。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异军突起，在过去二十年中，它们对经济的贡献已经达到 80%，其中最大份额来自于中国。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达到了近 40%。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希望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声音，有更大的发言权，但进展比较缓慢。同时，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定者还是以美国为首的 OECD 国家。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在制定规则时，他们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经济层面和利益，同时在执行过程中经常双重标准。在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刻板地用 OECD 国家的要求约束发展中国家，不顾及这些国家的实际条件，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承受能力。比如说在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很少有货币当局考虑它的外溢效应对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没有得到合理的满足，但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还没有拿出一套清晰、可操作性方案改革现在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世界经济范畴内，虽然发展中



祝宪

国家的份额现在在上升，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包括它们的成熟度也不应被小看。所以什么是斗而不破的方针，能够达到最大公约数，应该是下一轮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点。可能大家记得在 WTO 上一轮多方谈判中间，由于双方分歧意见太大，最终造成破裂的局面。我们还是要在一个同舟共济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商量好未来的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

很多人把“一带一路”倡议看成是互联互通，在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但从战略层面来讲，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 40 年经验，可以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它可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入下一轮正能量的全球化。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可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融入全球的供应链。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高的战略认识，而不仅仅把它看成是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一个金砖国家创立的银行，新开发银行更关注金砖国家。尽管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在经过上一轮金融危机后，经济基本期指开始回升，但同时也面临一个挑战。这些国家的政府有没有政治勇气进行急需的结构调整，特别是那些过多地依靠初级产品出口作为经济重要支柱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由于拥有相对容易的初级资源，其他的经济部门，比如制造业、服务业可能都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所以目前金砖五国出现了比较好的增长势头，但是这个势头是否能够持续，取决于本国的政府有没有勇气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and 改革。

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五个国家都是大国经济，我相信它们可以让金砖五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支柱，同时也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最佳代言人。■

向全球化 4.0 迈进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每一次全球化的浪潮都伴随着危机和“全球化失败”的唱衰之音，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也不例外。

今年是 2007 年次贷危机十周年，也是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二十周年，回顾一下这十年的危机和反危机历程颇有裨益。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 2007 年 8 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 2008 年 9 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此后，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大规模的扩张政策以应对。2009 年底人们认为危机逐渐远去、全球已进入“后危机时代”。而就在此时，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源头的欧债危机初现端倪；危机随即愈演愈烈，并经历了发展、蔓延、升级等阶段，最终演变为欧债危机。2011 年 8 月，当市场还在关注卷土重来的欧债危机时，标普下调美国 AAA 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引发的美债危机震惊世界。

面对重重困难，发达经济体一再使用货币宽松的工具：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共出台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总共购买资产约 3.9 万亿美元；欧洲央行先后开展长期再融资操作，推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并于 2015 年 3 月全面启动量化宽松的政策；英国和日本央行多次扩大资产购买计划。这些政策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

从根源看，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这三次危机是由 2007 年之前“失衡的全球化”即全球化 3.0 造成的。全球化其实并不神秘，也不会一马平川或者高潮不断，它也会停滞、消退甚至崩溃。从近代历史来看，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三波浪潮，分别是全球化 1.0 即大航海时代，全球化 2.0 即英国和英镑时代，全球化 3.0 美国和美元时代。也经历三次重大贸易和经济失衡，分别是中英失衡、欧美失衡、亚美失衡。其失衡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两种失衡”，这一次尤其表现为美国全球化与美元全球化带来的失衡。

世界实体经济失衡包括各国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内部失衡表现为：以美国和欧债危机最严重的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五国为代表的经济体长期超前消费、收不抵支——政府部门收入小于支出，私人部门储蓄小于消费；以亚洲为代表的国家则勤劳工作、积极储蓄。

外部失衡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长期贸易逆差、

美元流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美元。

世界金融经济失衡是由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失衡导致的，包括两个层面：全球范围的“中心—外围”失衡和区域范围的“中心—外围”失衡。全球范围的“中心—外围”失衡是指，美国利用其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很低成本获得资源，使实体经济失衡得以持续、放大；而外围国家被美国牵制。

区域范围的“中心—外围”失衡的代表是欧元区，中心国（德国、法国）反而被外围国牵制：由于共用一种货币、同一基准利率，危机发生时，中心国需承担更多维护货币区稳定的义务；虽然欧元区统一了货币，却无法协调财政，“后进拖累先进”的机制使中心国被外围国牵制。

失衡引发的过度消费

次贷危机和美债危机反映了世界的“东西失衡”。研究数据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东”）是出口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西”）是过度消费型。欧债危机反映了欧元区的“南北失衡”：以 PIIGS 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南”）是超前消费型；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北”）是勤劳工作型，过去十多年来工资上涨幅度不大，以保持其出口的成本优势。

“两种失衡”同时带来了国家、企业、个人、中央银行等不同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次贷危机爆发十周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发现金融危机更像是连锁店的逐渐扩张。

首先，这个连锁店的第一家分店是在美国开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全线崩溃，因为杠杆太高。其次，这个危机连锁店开到了欧洲，表现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就意味着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崩溃，因为财政的杠杆太高。然后，金融危机又来到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借入了大量的储备型货币，而同时拿出相应的本币来支持。一旦美联储加息，这些资本会疯狂逃离新兴市场，这就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膨胀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最终将面临一个“审判”。



全球化是将各国联系为“一个世界”的重要动力。从全球宏观来看，危机前的全球化是“失衡的全球化”。它的重要特征是全球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下带来的“两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三次危机”。

去全球化趋势

但是，2007 年次贷危机、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逐渐显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其传导机制表现为：全球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两种失衡导致金融危机，并发展为局部的经济危机；应对危机过程中，在部分国家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粹主义，这又抑制了全球化，从而推动“失衡的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转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逆全球化的趋势，真正的触发点是 2007 年次贷危机，而在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后，不断升级到新的阶段，并于 2016 年底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显形化”了。当前，逆全球化现象逐渐显现，表现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增速连年下滑、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且不均衡、多边贸易体系规则被部分边缘化，以及近年来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逆全球化进一步导致贸易投资减速，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世界由此呼唤新一代全球化，即全球化 4.0，这是指更“可持续、合理、均衡”，以“创新、普惠、共享和包容”引领的全球化。“新全球化”是相对危机前的“失衡的全球化”、以及危机后的“逆全球化”而言的，其核心特点是更加均衡、包容。“新全球化”要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实体经济领域与金融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影响力和规则制订权，改变“失衡的全球化”下的“两种失衡”状况；“新全

球化”还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带动的“逆全球化”。

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担当必然有着自身的义利观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必须注意到，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教训——全球化 4.0 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 3.0 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的经验和灵感的发挥。

但随着美国特朗普新政、英国脱欧、地缘摩擦等频频出现，现实显得愈发骨感，笔者有一种不安的预感，2008 金融危机几乎肯定被浪费了，除了会投放更多流动性以外，各方面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全球正在经历一个三高三低的状态，即高央行资产负债表水平、实体经济高负债或者杠杆率、风险资产价格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则是低波动率、低通胀率、低增长和贸易水平。

过去十年恐怕是人类历史上货币幻觉最严重的时期，看看那些核心资产的价格膨胀程度，看看全球财富分化的程度，让人不寒而栗。所谓宏观审慎政策（MPA），即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努力似乎是唯一的进展，但仔细看看有几个大型经济体的宏观杠杆是真正被控制住了的？传说中用天文量级的流动性浇灌出来的史诗级创新呢？苹果倒是更新到 x 代了，比特币算吗？理论创新呢？每次重大金融经济危机都有思想巨人的出现和重大的经济学理论突破，一如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带来闪电光芒，而现在我们只看到左右两派吵吵嚷嚷相互指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日益亢奋，流动性是如此充沛而思想是如此贫乏，成为最鲜明的对比。■

十年回望， 我们见证一个颠倒了的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弱点，所谓的成功也被夸大其词。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课堂里的学生转身变成了老师。自信的中国正成为自由和全球化的灯塔，为世界经济提供第三条发展道路。

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开创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所谓后危机时代。十年回望，金融危机究竟改变了什么？记得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金融界的评论家们比如债券之王 Bill Gross 先生曾提出，后危机时代将有三大主题，再规制化、去杠杆和去全球化（regulation, deleverage, deglobalization）。这个预言实现了多少？

再规制化曾被犹豫、三心二意地尝试了一下，然后坚决地放弃了：金融危机的罪人们并没有坐牢，而是被救助了，成功地保住了他们的奖金和自由，其中一些人甚至保住了他们的职位。

美欧的高杠杆，十年来发生了转移而不是下降。先是让公共部门大幅扩张了债务以承接金融部门和私人部门转移出来的债务和亏空，然后是利用美元和欧元的特权将债务利率压到零乃至负利率，从而将数万亿美元的亏空转化为全球外围地区的高通胀。

当年预言的三个主题中，只有去全球化正在切实发生，2016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标志着自 1979 年开始向全世界布道全球化福音的西方国家，如今掉转枪口攻击自己当年提倡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被它自己的母国给抛弃了，成为 21 世纪的思想弃儿。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取代了开放、多元、平等、创新等一系列全球化精神。

世界进入“倒车挡”

这个世界在后金融危机的十年间迅速颠倒过来，全球化课堂里的学生变成了老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向全世界宣传继续开放市场的好处。在各种场合维护多



边治理体系和全球气候治理，并正在中国国内付出巨大政策和财政代价鼓励创新和环保。IMF 的拉加德女士发现自己跟中国领导人而不是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前者正在争取 IMF 中更多份额、更大发言权，并乐意承担更大的责任；而美国至少一半国民将其先辈们一手建立的一众多边机构视为低效、负担和累赘。IMF 的经济学家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资本项目的开放，而中国恰恰在努力让其汇率和利率获得弹性和自主性，并审慎却又坚定地放开其资本项目。

据说 IMF 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其总部应该设在经济规模最大的成员国。考虑到中国经济未来数年的增速、通胀、统计方式的调整和汇率升值前景，我预估，人们早晚会面临一个严肃的选择题：IMF 和世界银行的第二总部应该选址上海浦东还是北京南边的雄安新区？我甚至建议自由女神不妨搬去上海，因为这位来自法国的“非法”移民长期徘徊在纽约市

大门口，刻在其基座上的词语已经在美国显得相当不合时宜。假如自由女神搬到长江口的长兴岛，她将得以见证脚下的造船基地如何快速建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海军舰队，从而守护一个更加开放的全球航海和贸易秩序。

颠倒过来的除了开放议题，还有节能减排环保理念。2007 年，当我在布鲁塞尔一所大学工作的时候，我曾与中国驻欧盟使团的朋友们聊起气候变化，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欧洲的阴谋：他们在推动此项全球议题，不仅有利于欧盟的全球道义领导地位，同时又有利于欧洲的新能源和环保产业。欧洲人施压中国人与之共同搞节能减排，一定是想剥夺我们淮河以南的中国人过冬取暖的权利。然而，随着中国在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的进步，这种阴谋论已经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不对，事实上这种阴谋论没有消失，而是悄悄转移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十年后的今天，美国有不少朋友认为是中国人在阴谋推动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国际议题，以便谋取产业





翟东升

上的好处；他们相信气候变暖是一个伪科学假新闻；多开采煤炭和石油有利于改善美国经济结构。

对于中国而言，2008年以来真正变化的可能是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十年前，中国的GDP规模还小于日本，位列全球第三；中国的出口项是劳动密集型为主，所谓的高科技主要是他国高科技零部件在中国的组装品，比如苹果手机在台资富士康大陆工厂中的组装出口工业。但是到今天，美国的超市中多数消费商品不再来源于中国，而是越南、印尼、孟加拉国乃至非洲国家。中国在产业链的阶梯上已经爬上了若干台阶。在苹果手机的供应链中，中国厂商不再是单纯的组装者，而是提供了其中数十种重要元器件。“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正在转变为“由中国制造（made by China）”。中国的自有品牌和专利产品，在许多领域表现出它们自身的竞争力，比如电动汽车、智能手机、无人机、高铁等等。

中国的“赶超行动”

甚至在创新和互联网领域，中国的角色也正在发生变化。多年前听过一个笑话说，万维网被分为两部分：全球网和中国互联网。但是站在今天的全球互联网发展和治理水平来看，中国的主张和政策路径恐怕不无道理。200年前，报纸等大众媒体的崛起使得各社会内绝大多数识字人口都被各自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覆盖，从而出现了政治学上所谓的“大众政治”，人们的意识形态分布呈现钟型曲线状态，换言之，社会共识很强大且稳定。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被网络信息边缘化，普通个体从信息的接受者变成了传播者和加工者，人们不再被媒体精英洗脑，而是自我寻

找信源从而自我洗脑，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剧烈的分裂，社会共识迅速瓦解。许多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恐怕同移动互联网和即时通信时代的到来不无关系，而中国的信息管控和审查虽然有明显的代价，但是至少人们相对少受泛滥的假消息假新闻之困扰，社会共识比较稳定。不但是政治，从商业和产业角度看，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道路也是成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在互联网领域的保护主义者、模仿者、闭关自守者中国，正在悄悄地改变其被动地位，开始对外输出其网络服务和品牌。除美国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在网络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都没有真正发展起有竞争力的品牌和企业来，唯独能够同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相抗衡的可能主要是中国的少数几家BAT企业。互联网应用转移到手机平台之际，中国的网络企业似乎有反超之势，不止一位欧洲来华留学生告诉我，当他们回到欧洲时才意识到带着现金或者信用卡上街是多么落后且不安全。深圳的一位IT业企业家则说，他去年夏天前往硅谷住了三个月，试图学习硅谷的新思想新模式，但是等他回到深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落伍了。

在持续了十年的负利率和超低利率之后，西方经济体正在看到走出后危机时代的曙光。日本央行开始缩减长期国债的购买。十年来美日欧依靠什么产业走出后危机时代？答案可能还是央行。一个悖论在于，后危机时代的美日欧央行大幅扩大其资产负债表，或者说印了很多钞票以兜住其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和公共部门，但是他们的汇率贬值了吗？没有！大幅贬值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印度、巴西、俄罗斯等等。这让我们想起美国前财政部长的那句名言，这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用自己的本币借债，是发达国家才拥有的特权，如今中国的人民币正在努力加入这个特权俱乐部，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来改变自己在这个无（硬）锚货币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当然，十年来中国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让她变得更加自由主义，而是对自己的文明和制度更加自信。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弊病和夸张之处，最典型的代表是我的朋友李世默先生在TED上的那篇演讲。中国人曾经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希望他们教导的全能主义体系能够帮助中国迅速站起来；80年代开始中国又真诚地向美国和西方学习，希望他们教导的自由市场模式能让中国富起来。这两位老师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但是这位学生却发现老师们其实也不完美，苏联太穷太专制，而美国太弱太混乱。现在，中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欧洲，但是这次的目光不再是仰视，而是平视，中国希望与欧洲大国一起复兴丝绸之路，探索一条融合市场效率与政府管控能力的第三条道路。全球化能否获得新生，希望可能就在欧洲和中国之间。■

中国金融改革： 扩大开放与创新



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解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从三个主要方面解读新时代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年度经济指标超出预期，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

2017 年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部分指标甚至在上限区¹。从经济总量看，GDP 达到 82.7 万亿元，增长 6.9%，为 2011 年以来首次增速回升，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从经济活跃度看，全年新增就业 1351 万人，连续 5 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新登记企业 607 万户，增长 9.9%。从经济结构看，服务业主导特征更加突出，GDP 中第三产业占比为 51.6%，比第二产业高 11.1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比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消费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比资本形成总额高 26.7 个百分点。从经济质量看，万元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3.7%，大家可以切身感受到环境状况的改善、雾霾天数的减少，其中固然有“天公作美”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污染治理的成效；居民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3%，比上年下降 0.8 个百分点，2017 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 8.9% 和 11%，明显快于人均消费支出 7.1% 的平均水平。随着“制造业、服务业 + 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带动高端消费向中等收入群体覆盖。

总之，2017 年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关键作用。比如，我们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政策在各地全面推行²，打通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³，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⁴。我们推进土地要素流动和用途配置市场化的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始在用途管制下同等入市⁵，农用地三权分离可流转⁶，

农产品价格改革⁷使得土地使用配置优化。我们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在自贸试验区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削减贸易壁垒。我们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重点是解除不当行政管制，大幅降低了市场自由准入门槛。我们推行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设立 6 个巡回法庭，实现全覆盖，合同的执行率稳步上升，跨区域民事诉讼案件审判的公正性有效增强。在北上广分别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产权保护。上述一系列措施使得我国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营商环境在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78 位，比 2013 年大幅跃升了 18 位⁸。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关键作用。

需求管理的空间在今后一段时间并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党的十九大没有再提出 GDP 增长的预期目标。但要实现十九大明确的分两步走的宏伟蓝图，需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立足现实情况，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取向必须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今后一段时期实施需求管理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

一是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从财政政策看，历经前期多轮刺激，大规模集中基建的余地不大。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凸显，不宜再增加基建债务；另一方面，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

把握好度，如果超前 10-20 年就必然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典型的如最近被叫停的包头地铁项目。当然，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经济上可行的基建投资还有广阔持续的空间。从货币政策看，近年来我国货币乘数快速提升，从 2012 年的 3.86 提高到 2016 年的 5.02，同期 M2 与 GDP 的比例也由 180.3% 上升到 208.3%⁹，表明经济快速货币化。但与此同时，GDP 增速却呈下行态势，说明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因此，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

二是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发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还有较大的空间。比如，收入方面可以通过减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提升经济活力；支出方面可以通过对支出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¹⁰，并引导资源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产业流动，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水平。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大有可为。而货币政策从原理上讲仅有总量属性，不具备结构调整的功能。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除非出现外部重大冲击或内部系统性风险，才有必要采用类似美国的货币政策扭曲性操作或欧央行创设的多种结构性政策工具。需要说明的是，欧盟由于只有统一货币，没有统一财政，才不得不由欧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长远，问题导向，久久为功。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立足上述基本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问题为导向，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着眼长远和机制建设，不断推出改革举措，逐年释放改革效能，久久为功。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重点问题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趋势性的客观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表现，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外一类属于体制机制扭曲形成的效



楼继伟

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看，为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政府已逐步加大了工作力度。

率损失，可以通过改革校正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水平。

对于第一类的趋势性问题，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做出适当改善，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比如，我国劳动力总量从 2015 年开始净减少并且呈加速态势。2017 年，16-59 岁劳动人口 9.02 亿人，比上年减少 548 万人，比上年多减近 200 万人。60 岁以上人口达 2.41 亿，比上年增加 1000 万，占总人口的 17.3%，老龄化进一步加剧¹¹。放开二孩后，虽然有利于增加人口总量，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但带来的近期劳动参与率下降又成为对冲因素，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料。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看，为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政府已逐步加大了工作力度。但在归还欠账的同时，也对 GDP 增长形成压抑作用。此外，外部环境也面临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经济全球化相互碰撞，短期内很难说“东风压倒西风”或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我们难以左右的不确定因素。总之，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对于这类不可扭转的趋势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改善问题的表征或做出适当的延缓，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经济运行不发生大的波动，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

对于第二类的体制机制扭曲问题，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择其要点，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应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推动要素自由流动。近年来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农村土地流转开始试点，土地使用形态的市场化配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低效种植地区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2017 年库存较多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了 3.6%，豆类播种面积增长了 6.7%¹²。农民虽然辛苦一些，但杂粮、豆类价格更高，收入获得改善。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束缚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还很多。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一些城市以户口限制车子、房子、学籍的做法仍较为普遍，不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效果。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是具有收入分配改善效果的。2017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467，连续两年上升，虽然幅度很小，但说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实际上人口自由流动仍有障碍，因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应当考虑去除户籍附带的种种福利，推进“租购同权”¹³，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者享有同等待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

二是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大力气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成效固然显著，但从国际对比看，我们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把握好具有外部性事项的处理，确保“好事办好”。在减税方面，2017 年全年财政收入 17.3 万亿元，增长 7.4%¹⁴。这一增长是具有减税效果的。如果财政收入与 10.5%（6.9%+3.6% 平减指数）的名义 GDP 增长同步，全年财政收入应为 17.8 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 5000 亿元体现了减税效应。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长与 PPI 的关联度更高，如果按去年 6.3% 的 PPI 估算，上述测算的减税幅度还会更大¹⁵。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 8%，PPI 上涨 6.3%，CPI 上涨 1.6%，说明压力向中下游逐步传导，税收虽然更多地来自前端，但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是有限的。进一步分析，仍有减税的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项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当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重点。

三是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2010 年开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已经到



中共十九大会址，中国人民大会堂。



了以消费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的拐点。实际上，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看，后发的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投资、高增长阶段。从我国实际看，虽然近年来居民杠杆率增加较快，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仍然高于消费增长，说明储蓄仍在增加。今后，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要求，居民杠杆率会稳步下降，我们还可以维持一定水平的储蓄率，这为保持可观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以及提升司法公正为重点，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高擎全球化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落实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承诺，继续扩大其他领域市场准入。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上述要素流动、简政放权、保护民间投资、扩大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如果到位，我国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改善，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保持在 6% 以上的较高水平。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其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例超过 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 91% 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 年我国一个月的 SHIBOR 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 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 -0.01%，美国为 1.1%¹⁶。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 MBS、CDS、CDO 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



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高层的认识。习总书记在 2015 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2006 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

第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后，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要求资产回表，收紧同业，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这说明全社会已认识到“灰犀牛”事件。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

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

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习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¹⁷，“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¹⁸。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 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 峰会和财经渠道系列会议，除了合力拯救全球经济外，对加强金融监管迅速形成共识，并不断具体化。我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主要金融机构比较健康，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个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暴露在七大主要金融机构。

作出上述比较，绝无幸灾乐祸、盲目自信之意，而是要汲取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¹⁹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第五，对未来金融模式的反思。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

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第一点，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上世纪 90 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²⁰。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7 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佩服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第二点，金融危机之后，2010 年 1 月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美国应当向其邻居加拿大学习。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且限制了证券化进程。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约束，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那些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约束都是正确的”²¹。就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枯燥乏味”的，金融当局严格规范控制混业，限制衍生品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仍被标普和 IMF 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体系²²。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刻反思。

十九大报告提醒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习总书记“一·五”重要讲话²³，进一步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防范应对风险挑战，特别要防范可能迟滞或中断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本段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7 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好于预期》，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1/t20180118_1574917.html。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72 号）。

3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 号）。

4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 号）。

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6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7 农产品价格改革主要包括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以及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等。

8 世界银行《2018 年营商环境报告：改革创造就业》。

9 数据来源：WIND。

10 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参见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21/c_1117533201.htm。

11 国家统计局《2017 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好于预期》，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1/t20180118_1574917.html。

12 《国家统计局关于 2017 年粮食产量的公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12/t20171208_1561546.html。

13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39 号）规定：“（七）完善住房租赁支持政策。……非本地户籍承租人可按照《居住证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申领居住证，享受义务教育、医疗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

14 财政部《2017 年财政收支情况》，http://gks.mof.gov.cn/zhengfuxinxi/tongjishuju/201801/t20180125_2800116.html。

15 我国财政收入以增值税、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等间接税为主体，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因此与名义 GDP 和 CPI 的增长关系密切。

16 数据来源：WIND。

17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28/c_1120545454.htm。

18 新华社《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jplm/20.htm>。

19 刘鹤《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2018 年 1 月 24 日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

20 参见《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当时，按主业拆分是将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以及保险、证券、信托拆分出去，成为独立的金融机构，并将所办工商类企业卖出。

21 保罗·克鲁格曼 2010 年 1 月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

22 IMF，“2009 年加拿大金融稳定性评估”。

23 2018 年 1 月 5 日新华社《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zhuanti/2018-01/05/content_5253681.htm。

金融科技发展为金融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贲圣林认为金融科技毫无疑问将带来科技和金融双重效益，但监管风险、复杂性、数据泄密、消费者权益等都是金融科技面临的挑战，需要强有力的监管。

随着传统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加速融合，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焕发出新的发展活力。但金融创新的发展、科技化与智能化也为金融监管和整个金融行业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金融科技给金融行业带来的挑战

近两年来，金融科技（Fintech）似乎成为了我国最热门金融词汇之一。实际上，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并不局限在最近两年的时间，在过去 70 年中，从第一台电脑的诞生，到第一张信用卡的出现，再到后来的第一台 ATM 机器的投入使用等等，都是金融与科技融合的表现。只不过如今这个趋势在不断加强，并对整个金融行业格局产生了新一轮的巨大影响。

新金融发展在不断实现金融科技化、智能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挑战。**第一，金融科技具有“去中心化”的趋势。**在此过程中，银行机构、保险机构等金融中介的作用被大大减弱。然而，在“去中心化”这样一个看似民主、平等的过程中，却掩藏着新的行业分割趋势，可能出现新的中心化特征。所以，如何在两方面之间获得平衡，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二，金融科技具有“跨界化”的特征。虽然某些金融科技产品具有简单化、标准化的特征，但仍是跨越了金融与科技两大部门的综合性产品，具有显著的跨界和虚拟特征，形成了较为复杂的通道和模式。

第三，金融科技发展也具有无人化、智能化和机器化的特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词语现在非常热门，形成的创新性成果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因素。例如，当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出了车祸，责任归属难以判定。同样，在金融行业，

智能投顾中的一些模型和算法都依靠机器自我学习、自我运算产生，一旦出现了偏差或者这个机器通过自我学习变成了一个坏人，责任是属于投资者、股东还是程序设计者，现阶段我们同样难以判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时，如果金融数据泄露，数据的安全问题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并有可能处于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使得金融科技在给社会大众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引起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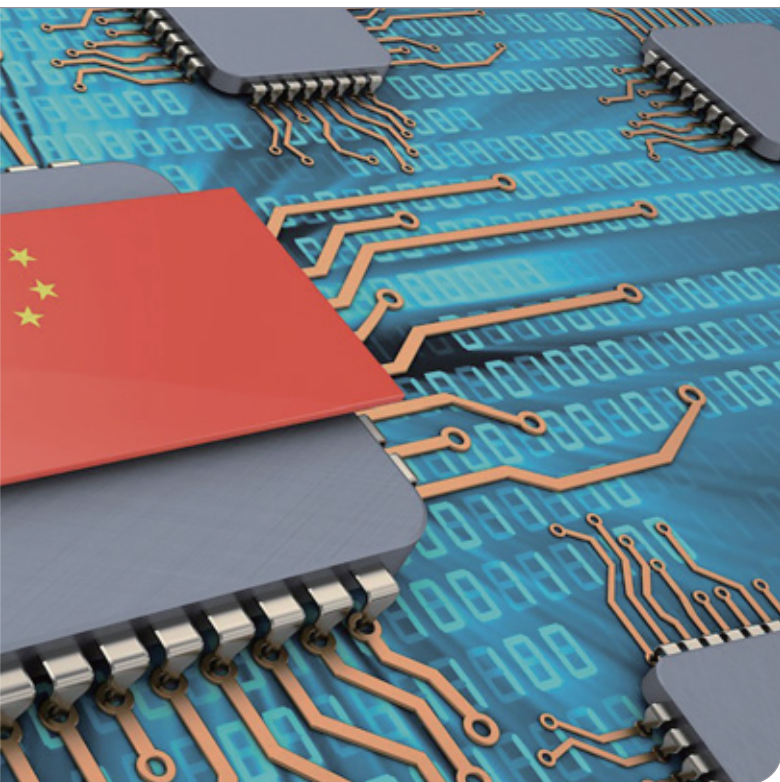
金融科技给金融监管带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传统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融合也给监管带来了诸多挑战。

第一，金融监管制度和政策大大滞后于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往往超越金融监管政策，比如，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支付宝 2003 年就已经开始运作，但是直到 2011 年才正式真正拿到支付牌照，类似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现象比较常见，监管滞后于市场存在普遍性，如何尽量减少这个滞后现象是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二，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相对滞后于国际先进做法。目前在金融科技领域，虽然有些国家的市场发展不如中国式的互联网金融这么繁荣，但其金融监管规则和体制等方面更为完善。例如，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

第三，如何处理好金融科技公司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的一些金融科技巨头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许多的福利，也为中国在这一新兴领域争取了利益。全球主要的金融科技巨头，前几名目前基本上是在中国。那么，如何处理好它既要服务国家的发展和利益的同时，又要保证它真正的为消费者服务，为整个实体经济服务，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贵圣林

针对金融科技实施有效监管

如何实现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有效监管，首先需要确立我们的目标，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首先，以金融稳定为前提；第二，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要造福社会；第三，金融要处理好创新与稳定。创新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保护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金融科技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高效、美好的金融体系。对此我有三点建议：

一是学习国际经验。在全球，金融科技有的发展三个主要的驱动力，第一是市场，即用户需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第二是技术，我国的科学技术运作，尤其是互联网应用技术虽然跟美国相比还会有些小的差距，但是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第三是规则，在规则制定上，我们的政府，包括监管机构、监管体制和监管的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和取经。

二是加强整体机构能力的建设，不仅仅是顶层设计。现在金融有很多监管方式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属地化管理。如地方金融工作局，工作量都非常之大。我们的省、市、区级都面临如何管好金融等问题，而地方的金融办往往都依赖于发改委等部门，人手和资源都非常紧缺。监管人手、人力不足，能力、手段有限，问题突出，如何补好能力赤字和人才赤字成为各省、市、区政府促进金融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挑战。

三是打造一个比较友善的生态系统，包括市场主体、企业、行业协会、监管体制的参与，以及高校、媒体各方面的舆论引导，让金融科技或者金融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金融科技给行业发展、社会大众带来了许多优势和机遇，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挑战与可能的风险。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国金融科技巨头为国争光，以及同时为全人类造福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所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F20 倡议：重塑金融本质

当前，全球发展已迈入关键的临界点，重新思考并重构人类社会价值基础，积极引领推动金融回归本质：服务实体经济，重构和完善基础经济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全面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总部设于北

京，非营利、非官方的独立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财经领袖、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专家学者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网络。其宗旨是通过构建多边、平等、务实及建设性的非官方高层对话与合作，维护及改善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包容及全面可持续发展。论坛致力于成为一个独立、透明、非官方的国际金融公共外交及战略智库平台。

为应对当前世界新秩序、新形势、新挑战，促进全球稳定与合作对话，值逢中国杭州 G20 峰会前夕，国际金融论坛（IFF）全体成员一致提议：以国际金融论坛（IFF）13 年成熟框架为基础，共同将 IFF 升级打造为全球金融领域的 F20，致力于推动：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创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时代。鉴于此，我们共同向全球发出 F20 倡议，倡议如下：

壹、建立 F20 全球网络。重组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理事会和执行机构，以 G20 国家和地区为核心，联合新兴经济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全球开放性网络，将 IFF 打造为全球金融 F20。

贰、重塑金融本质。发挥 F20 全球网络平台作用，积极引领推动金融回归本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基础经济体系完善，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全面可持续发展。发挥金融工具的血液功能，有力促进基础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以回归金融之本质。



叁、促进全球治理新动力。包括通过 F20 对话，促进 G20 作为国际经济主要论坛的作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加快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对世界金融秩序，全球金融治理架构、金融稳定、金融与和平关系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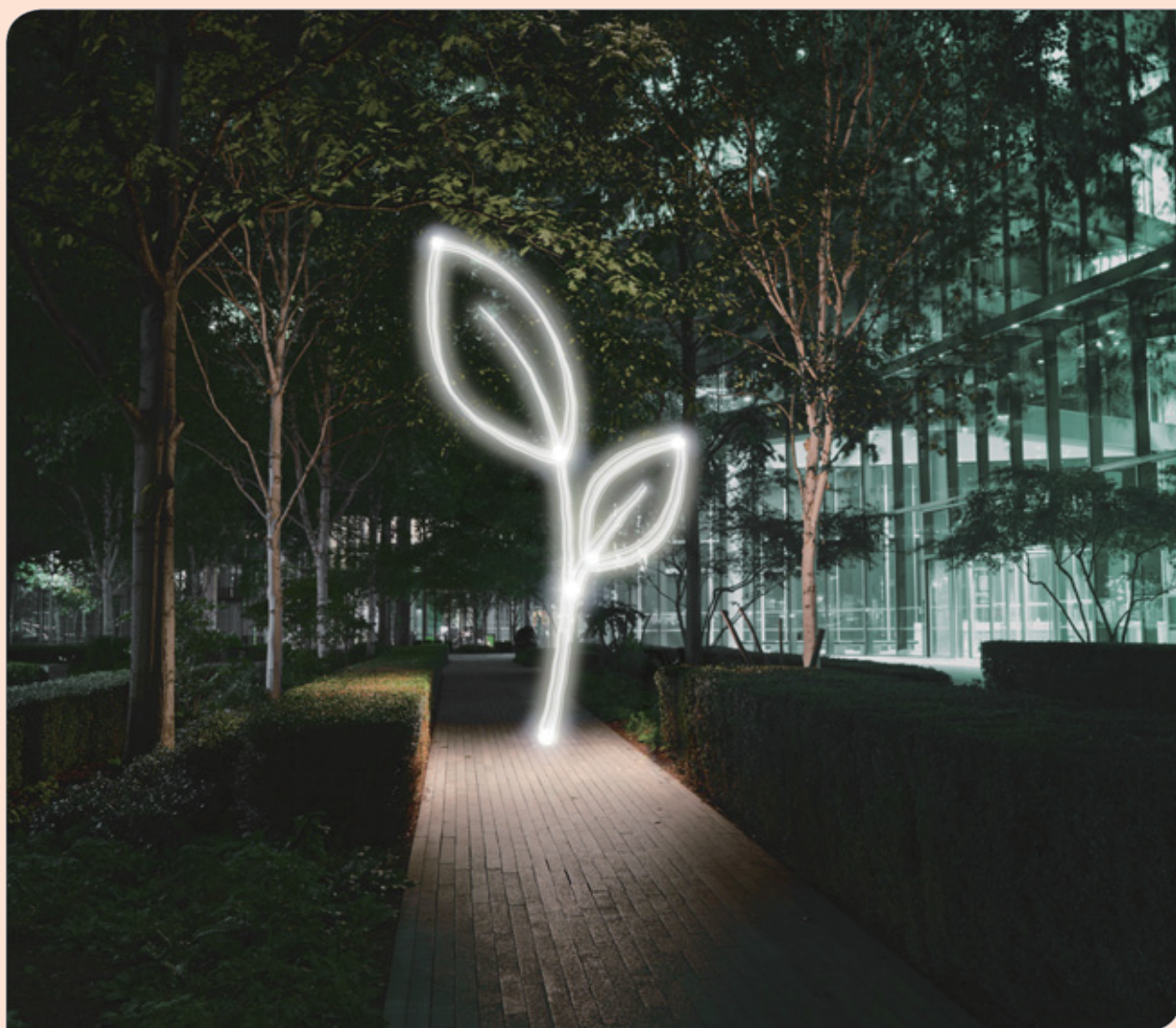
肆、广泛开展国家和地区金融合作对话。

以国际金融论坛（IFF）为平台，定期举办 F20 峰会、国家和地区金融合作会议，分享各成员国发展理念及经验，就 G20 国家及相关国际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推进 G20 峰会成果进展和实施措施，力争将 F20 打造成为 G20 的有力补充，成为促进国际经济、金融、公共关系等领域的综合对话、交流、合作权威平台。

伍、发挥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作用。通过发挥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作用，促进国家和区域稳定与合作对话，促进大国经济和金融协调。包括通过 F20 加强对 G20 新动力与新挑战的研究，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激发新兴经济体的活力与潜力。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资本技术产能，实现互利互惠共赢。

陆、推动建立全球绿色金融体系。积极推进世界各国政府将绿色金融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增长，健全绿色金融法律法规，有效推动投资结构 and 经济结构向绿色转型，建立对绿色项目的担保机制，通过多样化金融工具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并鼓励民间资本投入。

柒、积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全球合作与融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积极推动各国提升社会福利、增强社会保障、扶贫和保护弱势群体，向普罗大众提供更完善、更便捷、更安全的金融服务。促进世界和平、社会稳定和改善民生。



捌、金融创新应促进增长力。金融创新的核心在于运用科技优势更有效地发挥金融的基本功能和属性，得以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加强对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服务的治理监管，加强对电子商务创新潜在利益与风险的监控，加强对数字革命与区块链技术等领域的促进和包容，构建公平有效的监管机制与框架。

玖、积极支持丝绸之路倡议与行动。通过创立丝绸之路国际联盟和峰会，创造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发展模式，激发丝绸之路合作新动力；推动区域合作，构建双赢与多赢格局，打造利益共同体，促进世界的和平、包容及可持续发展。

拾、创建国际金融论坛 (IFF) 研究院。充分发挥 IFF 国际学术网络机制，广泛开展国际学术合作，推进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就国际金融重大问题进行深层次研究，探讨

并提出促进合作建议方案，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和完善，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具有引导性、前瞻性、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报告。

拾壹、创建国际金融论坛 (IFF) 学院。打造集合金融人才培养、创新实践于一身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跨学科教育机构。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掌握新知识，新技能，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高端复合型金融人才，培育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屋建瓴战略眼光的全球新资本领袖力量。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交流、合作与发展，打造辐射世界的国际金融教育高地和高级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我们相信，通过共建国际金融论坛 (IFF) F20 全球网络，将积极引导金融回归本质，服务实体经济，重构和完善基础经济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全面可持续发展。■

着力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可持续金融项目总裁孙轶颀强调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提出五个扩大金融影响力的方法。



中国的共享单车是创新产业的一个代表，得益于有竞争力的市场和较低的技术门槛。



孙铁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建设指明了方向。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出台的降成本措施，以及 11 部委关于《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中都强调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重大问题。如何做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必须先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根本性问题：

需获得金融支持的项目分类

笔者通常将金融项目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市场化成熟度很高，行业很成熟的项目，这些项目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第二种是公益性很强、外部性很强，完全要靠财政投入的资金和项目；第三种是本文所要关心的，介于前述两种之间的项目。

对于需要获得金融支持的项目，我提出四个方面的标准：一是技术先进的、在世界领先的项目；二是具有创新性的项目；三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且影响力大的项目；四是能推动地方差异化发展，有特色的项目。

因此，建议对需要金融支持的实体经济列一个行业清单，做出标准供银行业参考。有了行业范围和目标以后，我们才能配以相应的金融手段和政策支持。

鼓励创新和企业精神

虽然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持，但金融不是扶贫，也不是做公益。实体经济项目的商业性、风险的可控性、技

术成熟度、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都需要考虑。例如，共享单车是一个高度竞争、技术性相对较低的市场，现在对该行业进行金融支持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风险因素。

国家给予了很多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和补贴，但是，有些企业用这些优惠政策来描绘财务报表，增加现金流，而不是用来进行资本运作、技术革新和长期发展规划。因此，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需要不断鼓励创新和企业精神。

拓宽融资渠道

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一直困扰着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有自身的局限和困境。我建议根据项目的不同阶段和产业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项目初期，可以通过天使基金和风险投资进行融资。美国在 19 世纪许多产业依靠私人资本取得了长足发展。项目发展阶段，考虑采取私募基金和银行贷款进一步融资。项目成熟阶段可采取资本市场工具融资，比如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这样对于不同的项目和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投资和融资渠道。

解决融资困难问题，还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既要有大、中型银行，又要有小型银行，甚至更小型的银行，分别针对不同的行业、产业和地区，提供不同金融服务。当然，为了让实体经济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到我国金融市场应该持欢迎态度。

做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工作

基础性工作包括以下四个：一是信息管理和大数据分析；二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信用体系必须建立。政府信用指政府借债能力和发债能力，包括政府对于一些承诺的责任，目前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撬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关键；三是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四是建立鼓励创新和企业精神的专利制度，专利制度对产业发展和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明确政府和市场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角色

政府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定游戏规则，划好红线，不要犯规；二是必要的财政财税手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让金融机构按市场运行的规律，落实政府各项合理的政策。■

构建多层次银行体系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王沅认为，中国要鼓励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2010年中国已经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金融的支持，无论是从银行机构还是资本市场融资，或是其他各方面的借贷，仅仅靠企业的自有资金和财政资金，中国制造业不可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就。所以，整个经济改革发展的历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银行机构和资本市场支持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的过程。

银行对企业的融资与增信作用

有人认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做得不够，没有把应该支持的方面都支持到位。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一个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投资资金基本上来自财政。银行没有长期的投资，它所提供的资金基本上都是流动性贷款。例如，制造业需要一些短期的周转，大都是一年半载。对于长期投资，尤其在国有企业，几乎都来自于财政预算拨款，但这是完全不可以持续的。如果要实现高速发展，资本的投资要么就是通过银行的长期大额，要么就是通过资本的直接投资，这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中需要改革的一个层面。所以，在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整个增量快速增加的过程中，银行资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

企业如果面向社会融资，或者到资本市场上市，银行就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提供者。在企业贷款的过程中，企业如果从银行成功借到资金，银行不仅给的是资金，实际上相当于给企业的增信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企业要发债券，评级公司首先看这家企业向银行借贷的能力。如果企业从银行借不到资金，企业评级会下降，再想发行债券更加不容易，而且债券成本会提高。所以，中国的银行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融资以外，还有一些隐性的增信作用。



王沅

大型银行应主动与优质客户保持联系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几家大型银行都不叫国有商业银行，而叫专业银行。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主要做储蓄，针对工商业信贷客户的贷款；中国建设银行做基本建设投资；中国银行做外汇；中国农业银行的网点铺在广大的农村。相互之间的业务没有交叉，且除了中国银行以外，其他的银行都不可以做外汇业务。但是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银行自身也经历日新月异的改革，回首这二十多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银行体制。

从传统的银行业务来说，原来都是国有的银行，从专业银行到国有的商业银行，从国有商业银行到上市公司，国家仍然持大股。银行习惯打交道的客户全都是国营企业，所以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以及做业务的方式实际上非常传统。而且银行虽然吸储的时候可能会追逐客户，但是一到贷款，银行就变成了一个“坐商”，坐在那等着所有的客户上门。



中国银行（香港）

上述实际上是一种很不好的模式。如果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无论银行规模大小，都应该去追逐最好的客户，积极主动地去与优质客户保持联系，提供创新的金融产品，而不是仅仅提供一般的信贷。所以，中国银行业在主动营销和客户方面做得还是不够的，尤其大银行做得不如小银行，也不如股份制银行和其他私有资本进入的银行。

建立多层次银行业体系

中国银行业在类别上还要进一步多样化，不仅需要工、农、中、建、交，还需要招商、民生这种股份制银行，也需要有小额信贷公司，这样才能在一个非常完整的框架内把各个层次、各个层级类别的客户的融资需要包含进去。有很多专门做小额信贷的银行提出的口号就是“了解你的客户”（KYC），这样银行与客户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才能找到好的客户，客户能从银行贷到资金，客户获得资金支持后，不断经营成长并进入良性循环，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也同样进入良性循环。

国家开发银行虽然是一个很大的银行，但是有小额信贷业务。陈元董事长曾提出，人人都要享有平等的融资权。这是一种金融服务理念的创新。通常认为，银行嫌贫爱富是一个现实现象，但国家开发银行是一个“批发的银行”，把资金批发给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让这些银行去找熟悉的中小企业贷款，甚至是很小的个体，最小单项的贷款额有可能是五千、一万。这种业务大银行做不到，也没有这样的人力。所以，国开行就是通过与其他银行合作进行，用批发的方式来带动零售。

金融业是一个协同发展的行业，银行无法独善其身。对银行诟病比较多一点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资金

根本不出金融体系。按照中国现行的监管体系和制度，银行资金是不允许进资本市场的，这也是造成金融乱象的部分原因。

银行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果国企改革没有发生全面的改革，银行系统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银行不得不承担支持国有企业的义务。但这样的融资方式将不是可持续的。与此同时，我们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银行业对亏损企业贷款的负担。

很多银行已在香港和上海上市，获得盈利成为银行运营的重要目标。如果希望金融体系能够可持续地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包括实体经济在内必须要进一步改革。否则在硬性的行政规定下，银行作为一个营利性的金融机构一定会拆东墙补西墙，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今后 5-10 年的发展是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金融体系一定要在这个轨道上发展才有前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金融体系仍然不健全，国有金融机构资产占比仍然很大。今后，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金融服务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向。最近证监会又宣布，允许外资进入，原来像证券等金融服务都不允许外资超过 20%，现在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 51%，

目前，香港也在讨论十九大以后香港的市场怎么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自己如何定位。香港业界也非常关心如何参与进来。其实全球都看好中国，但是同时又对中国有很多的疑问和困惑。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的讲话提出来一些要点和方向性的内容，但媒体和社会大众鲜有进行脚踏实地的讨论。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开诚布公地讨论下一步的政策应该怎么制定、政策应该怎么落实、还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多种所有制形式也是在十九大当中提出来的非常明确的方向，外资进入以及国内的私人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是今后的发展的方向。要支持实体经济不能只作为一句口号，而是要下大力气把整个政策体系、监管制度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框架制定好，才有有能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所以，无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如果实现两者今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一定要进一步地改革，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促进新时代金融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认为，金融科技越来越重要，但创新需与自律结合才能助力中国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增长动能、发展方式、治理体系和全球化进程等方面深层次的转变，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局面正在形成，市场向好的预期和信号也明显增强。中国经济也正在由高速增长的阶段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变，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不断地增强了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原则和政策

当前，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正逐步形成，并得到快速发展。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正日益成为全球金融创新发展的亮点和焦点。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出台了一些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监管沙箱（Regulatory Sandbox），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兼具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监管环境。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专门发布了一份名为《金融科技框架》（“Framework for Fintech”）的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阐述了奥巴马政府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原则和框架政策，旨在促进金融科技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等国际组织也很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纷纷成立了金融科技研究小组、工作组或专门的委员会。这些工作组和委员会深度地评估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以及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影响，积极探索建立金融科技的国际政策框架。总体来看，经过这几年的讨论和互相梳理，各国以及各方组织对于金融科技已经



李东荣

逐渐形成了一些国际的共识和原则。例如，有些原则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要以消费者保护为前提，要以发展普惠金融为重点，要以风险防范为核心，这几点原则在各国和各国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意见是基本趋向一致的。这些共识对于各国促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应吸收国际经验和立足本国实际

放眼全球，金融科技正迅速兴起且方兴未艾，而中国在金融科技的市场规模和创新深度方面，均已位于世界前列，处于整个金融科技行业的前沿。

一方面，我们要注重不断吸收和借鉴各国金融科技发展的良好经验。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很多国际组织，都对金融科技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拥有成功的经验，我国要注意吸取他们良好的经验和做法。

另一方面，要注重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实际发展出发，

充分地考虑中国在市场基础、制度环境、监管安排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致力于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信息化时代要求的金融科技发展道路，为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贡献我们中国的方案和智慧。不论什么样的改革，什么样的监管模式，必须立足于其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大的环境以及这些企业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所相配套的软件环境，包括管理制度、会计制度、标准体系、监管敏锐性和监管的有效性等，脱离这些实际去谈发展是不全面的。

实现全球金融科技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实现全球金融科技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要注重价值导向和创新实现的动态校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既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在发展过程中把握方向的重要性。金融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与财富打交道的特殊行业，存在着高风险、内

在脆弱性以及涉及面广等特点，这就决定了金融创新如果缺乏正确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导向就有可能滑向自我循环、过度膨胀、非理性繁荣，甚至引致经济金融危机的境地。典型的事例如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回顾全球的金融发展历史，由于金融创新过度或者说方向偏移所引致的危机在各国屡见不鲜，只是规模和程度不同而已，但背后的机制和原理基本是类似的。所以，我国新时代金融科技的发展绝不应该重蹈覆辙。

金融科技当前业界有多种说法，有的被称之为金融科技，有的说是科技金融，还有的叫做 FinTech 或者 TechFin，这个名词的顺序或者称呼并不重要，关键需要看其背后实际的交易行为。要把是否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是否有利于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作为我们基本的评判标准，从而积极稳妥地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绝不能出现脱离自身发展阶段，超出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的“过度创新”，更不能出现打着创新旗号、规避法律监管、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伪创新”。



第二，要注重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当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扩大服务覆盖面、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技术创新在解决传统金融领域存在高成本、低效率、供需不匹配等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鸿沟、过度技术依赖、多重风险叠加等新挑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技术创新，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金融科技发展也不能靠技术创新单兵突进，包打天下。回顾人类金融发展史，从来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金融风险就不再发生了，它始终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相互促进、相互循环式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注意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监管规则、治理标准等制度性安排，提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度，真正使金融科技创新有方向、有底线、有规矩。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也在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尝试。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指导意见里面明确了金融科技发展的基本业务规则和监管分工，并推出了互联网支付、个体网络借贷等领域的监管规则和治理标准，有效促进了金融科技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阳光化发展的轨道。

第三，要注重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的适度平衡。纵观人类发展史，寻求实现创新与监管的平衡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一课题一直处于研究和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客观地说，在创新与监管的博弈中，金融创新总是走在前边，但监管不能落后太远，也不能落后太久，这两者的时间差必须要妥善地处理好。在金融科技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坚持掌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点，实现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动态博弈和良性循环。

一方面，加强我国金融科技监管，可以考虑借鉴监管沙箱、监管科技等新的理念、新的工具，建立能够试错、容错、纠错的包容性创新管理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开展应用试点、产品测试，从而让金融科技创新走得动、行得通、做得正；另一方面，也要按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所有的金融活动都要获取准入的基本原则，通过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互补，建立金融科技风险全覆盖的长效监管机制。这种全覆盖必须能够穿透，从源头到后边、从资产端到负债端全部打通，能够有效地追溯下去。让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创新看得到、穿得透、管得住，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考

验监管的水平，因此，监管部门需要不断提高监管能力，改善管理手段。

第四，要注重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的有机协调。从理论上讲，行业自律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约束机制，通过标准规则、信息披露、自律惩戒等市场化措施，有效地减少从业机构只顾短期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培育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形成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资本。同时，行业自律还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沟通机制。当前，金融科技创新不断涌现，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交叉性不断增强，金融业发展到今天很多都是混业经营的，在混业经营对监管有效性提出了很大挑战。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交叉性不断增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所加剧，市场预期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所以，应该通过行业自律，为政府提供标准化、透明化、集中化的行业数据，以及有效的沟通对话机制，这样有助于降低政府与市场之间沟通的成本。

放眼全球，金融科技正迅速兴起且方兴未艾，而中国在金融科技的市场规模和创新深度方面，均已位于世界前列，处于整个金融科技行业的前沿。

建立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有机协调配合的行业管理机制，对于金融科技创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监管安排。在这个方面，中国也做了一些探索。201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专门成立了金融科技领域的全国性行业自律组织，即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同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协会。自成立以来，这些行业自律组织尊重市场法则，积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加快建设数据统计、风险监测、信息披露、信用信息共享等行业基础设施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以金融风险防控和消费者保护为重点，抓紧出台信息披露、合同要素登记、资金存管等方面的行业标准和自律规则，在规范金融科技市场秩序、促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

放眼全球，金融科技还处于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成熟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探索和推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愿意继续与大家一道加强沟通、相互借鉴、通力合作，共同促进金融科技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金精不朽 融通天下



- 传播交流成果，探索学术前沿，扩展国际视野，发表权威观点，服务金融事业，满足读者需求。
- 以服务中国经济界、金融界，服务广大读者为使命，致力于 IFF 信息的全面、及时、准确传递，与社会共同分享 IFF 的研究成果。
- 为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搭建顺畅的信息平台，使对话交流中的重要思路、观念、观点得以传播，服务中国经济和金融业。

着眼宏观大局·关注金融动态·探寻内在规律

《国际金融论坛》是反映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的高端学术刊物，面向广大经济界、金融界的读者，以传播中国金融国际合作交流成果，提高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宗旨。

《国际金融论坛》具有天然的国际信息渠道、丰富的信息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将国外金融信息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国际金融论坛》成为我国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国内、国外双重信息资源的优势，以全球化的视野解读本土的金融事业，站在中国的角度对话世界金融市场，为读者展示一个完整的金融世界。



扫一扫加关注
微信：IFFweixin

构建新型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申曙光，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申曙光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应该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而不是一些技术性、操作性的风险。对此，我认为系统性风险更多地存在于金融系统的结构和方向中，所以，我根据该观点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调整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大部分人都认为，调整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是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过去几十年，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偏差，甚至在慢慢异化，主要的表现是脱实向虚、自娱自乐，形成了封闭的体系。现实中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已经展现出这种方向性偏差的趋势，并进一步形成了系统性风险。我认为，金融业发展方向的调整，应该朝向民生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四个方面，并且，这四个调整方向的条件早已经成熟。例如，对于民生金融，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应该进入金融支持民生发展的新时代。在这样大的局面下，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如健康、养老、医疗等方面，这些方面跟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既是服务业又是产业，并且永远是朝阳行业。

第二，实现新形势、增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对于这一点，我想从全球治理的角度阐释金融系统的特征。首先，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开放的系统，是由多主体参与，而不是由少数国家所霸占的系统；其次，它是共赢的，不能只有少数国家从中获利；最后，它应该是公平、公正的。按照这三个标准来看，现在还没有形成所谓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现在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基本上仍然是二战以来美国等少数国家主导的金融体制，与当前的形势完全不相适应。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规模、金融体量大为增加，造成现在的金融体系结构跟全球治理体系是不相适应的，并形成了冲突。如果要解决上述问题，方法是增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话语权。这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思考，过去几年里，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的设立，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包括中国积极参与 G20 峰会等等，实际上都是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中国等国家的参与，一定会对全球金融稳定做出卓越的贡献。

第三，充分认识保险业的价值，更加重视保险业的发展。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保险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金融体系里面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稳定作用。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保险业发展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保险业的发展和上升趋势却非常明显。保险业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它是一种稳定的发展机制。例如，保险业强调责任分担，捆绑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保险业的准入“门槛”比较高，特别是中国很多资金都想进入这一“门槛”，但是实际上很难进来。另外，保险业的偿付能力监管非常明确。中国早就引进了偿二代，成效非常明显。这些确实证明了保险业的发展能够起到明确的稳定和支持作用。我的建议是要更加重视保险业的发展，应当借鉴保险业的体制和经验，为金融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提升中国产业政策改革的正面外溢效应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认为，中国正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透明度和市场准入，这将让产业增长更加强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国际上具有非常强的外溢效应，不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产业改革，对整个世界产品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以及全球产业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2017年钢铁价格上涨较多，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密切。拉美钢铁协会既兴奋又担忧。因为铁矿石的价格会随着钢铁价格一起提升，钢铁制造成本也随之上升。

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多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将对国际社会有一个正面的外溢效应。



夏乐

为了提升我国产业政策的正面溢出效应，我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产业和产业政策方面的深入研究。根据外溢效应，对各个产业进行进一步的分类，衡量这些产业对全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第二，提高未来产业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为了使产业政策的外溢效应处于一个可控的、正面的状态，我们在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提高透明度，避免搞突然袭击。简单粗暴的政策制定过程与未来的开放、贡献世界经济是难以适应的。我们应该提高对未来的产业政策制定的透明度，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内的厂商、学者，以及海外的厂商和投资人都参与到产业制定的讨论中。

第三，产业政策执行中，更加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价格是最好的信息披露和传递机制。如果能供给侧改革能更依靠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调控，可更好地帮助国外厂商形成预期，因为市场价格可以传递最为丰富的信息。不仅仅是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中国的其他制造业、服务业都可以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致力于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平台。我希望能继续这一重要使命。

当前局势下，我想我们都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金融已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金融全球化的本质，需要我们把更多冲突、观念和思想都调和在一起，不仅仅是在金融监管，还包括金融框架、会计、审计、信用评级以及其它诸多方面。

——保罗·沃尔克
国际金融论坛（IFF）荣誉主席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



力挽狂澜

保罗·沃尔克和他改变的金融世界
国际金融论坛（IFF）十周年特别奉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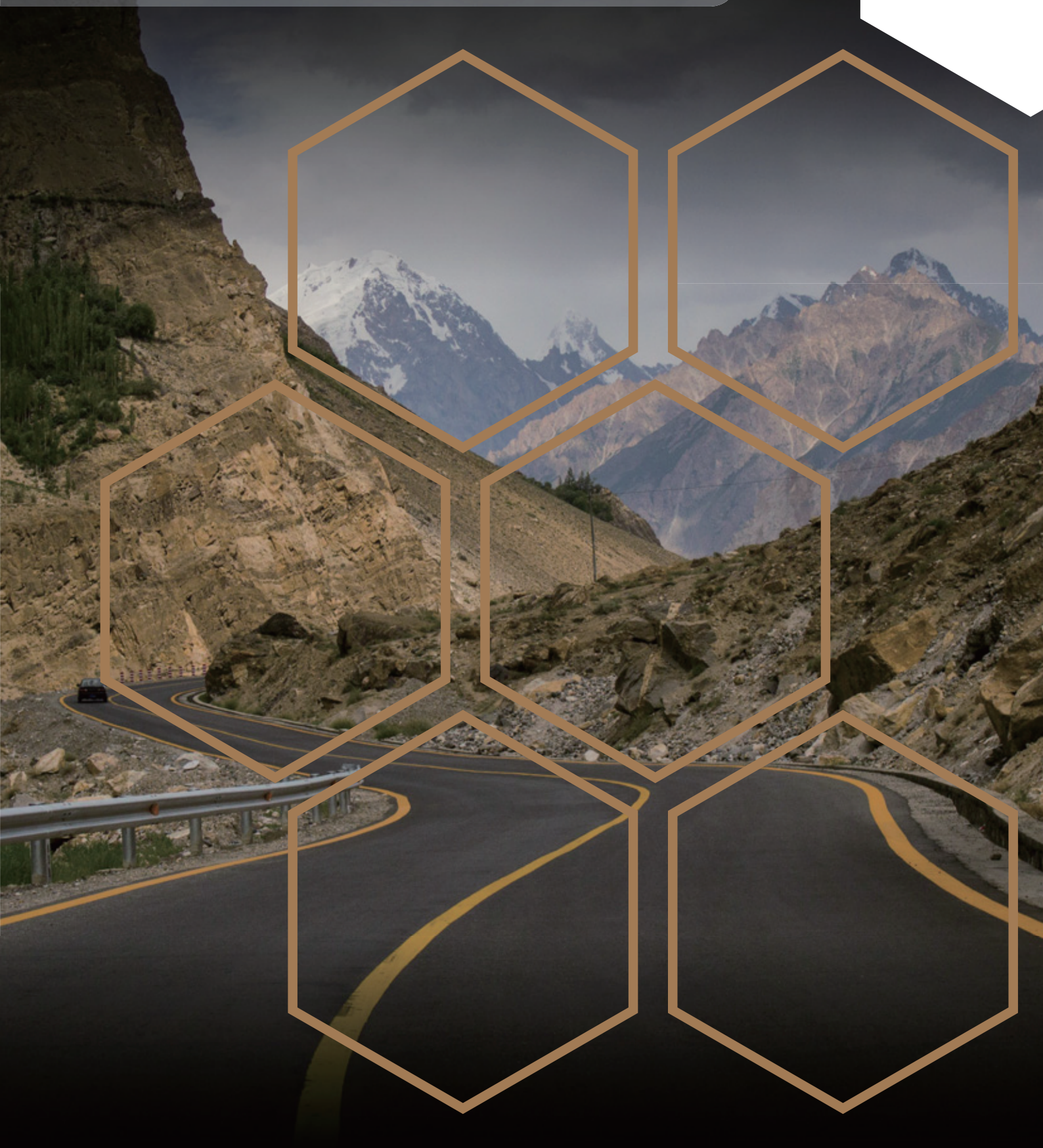


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
成功制服通胀怪兽，创造了“沃尔克奇迹”

被誉为“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没有沃尔克，就没有美国经济的“大稳定”

沃尔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基辛格

“一带一路”： 中国倡议促进世界发展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打造全球化升级版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认为，“一带一路”将促进互联互通，带来变革性的、更加包容的全新全球化。

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它的退出引发了世界各国的不安。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若美国退出全球领导角色，那其他国家会取而代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利的一面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但双刃剑自然也有弊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全球经济领域中的各种矛盾，现阶段即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

保护主义是一种倒退

如今，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仍有七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目前，意大

“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是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利青年失业率已接近40%，美国一些州的年轻人失业率也超过30%。在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时我们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实行关门主义、保护主义，力求去全球化；其二是对传统的全球化进行调整和改造，推进新型全球化，实现全球化的转型升级。今年4月份，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展开了针对钢铁进口的调查，这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会导致两败俱伤。

习近平主席指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是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一带一路”倡议是复古还是复兴？是建立中国自有的后花园，还是建立共享的百花园？是中国梦？还是世界梦？我认为，“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之间有传承的一面，特别是对



辜胜阻

“丝路精神”的传承。但是，“一带一路”也有对历史的超越，一是空间上的超越，沿线国家数量远远超出了古“丝绸之路”；

二是在性质上的超越，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时便指出要以此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今年5月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又提出了“五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

开放之路、文明之路、创新之路。很显然，“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沿线各国的大合唱。

今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变成全球共识，从理念设计到行动实践，向全世界释放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推动包容性全球化的发展。

“一带一路”调查

笔者对沿线九个国家进行了调研，得出如下四个判断：

其一，机遇与风险并存。“一带一路”建设蕴藏着相当大的风险，如何在准确研判风险的前提下把握好“一带一路”



的机遇十分重要。其二，利益与责任同在，“一带一路”塑造的不仅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其三，政府与企业共舞，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也同样重要。其四，经济与人文相依，经济和人文是“一带一路”驱动全球化所依靠的两个轮子。

“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很大，习近平主席讲古“丝绸之路”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而如今这些地方却已成为动荡、危险和挑战的代名词。因此，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智库与媒体的共同参与，应当是官、产、经、学、媒五方联动。在顶层设计方面，一是要“新”，要革新；二是要“通”，“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三是要“共”，合作共赢；四是要“治”，即善治，优化全球治理。其系统构架方面，首先是“一顶”，即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顶层设计。其次是“双轮”，以经济合作和可持续发展与人文交流为双轮驱动；再次是“六柱”，即以基础设施、贸易、产业投资、金融、能源和科技创新为支柱的经济合作；最后是“一基”，以全球的治理机制优化为基础和基本保障。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八点建议：

- 积极推进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强化战略共识，完善双多边沟通机制，以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性全球化。这一倡议如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如何与国际组织的战略对接至关重要。比如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对接等。
-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个互联互通不仅是硬件的联通，还要推动政策、规则、标准等三位一体的软联通，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在扶贫过程中有句话，“要想富，先修路。”指出了实现要素自由联通的重要意义。

- 建立均衡平等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贸易的比重相当大。中国承诺进口 2 万亿美元的商品，建立一大批合作区，合作区对于产业合作相当重要，而且要以民营企业引领这些合作区。
- 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鼓励开发性金融、商业金融、普惠金融，推进金融服务对接，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就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对于资金融通非常重要。
- 加强国际能源合作。通过能源合作，中国以油气管道建设从单向走向多元。
- 密切科技与人才交流合作。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创新之路，创新之路就需要加强科技合作。目前，中国已与 49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很多国家都呼吁加强“一带一路”高科技园区方面的合作。
- 使民心相通成为最重要的联通，让文化融合成为最重要的融合，提高“一带一路”文化软实力，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以民心相通获取价值共鸣与战略互信。这个民心相通是五通之中最重要的，是其他四通的基础。
-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好地贡献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等公共产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G20 杭州峰会的主题是创新、开放、发展、绿色，与中国“十三五”的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G20 杭州峰会的中国印记。总体而言，我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是，它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它能够引领新型的、包容性的全球化，是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新引擎。■

健全法治环境 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关键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认为，将“一带一路”从愿景变为现实的关键在于健全国际法治环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中国的古语说得好，“预则利，不预则废。”“一带一路”伟大的战略构想、愿景和行动不会一蹴而就，而将持续数十年时间完成。与任何重要的战略一样，既然是个国际战略，那就应当设想相关的环境问题，我们每每讲到环境，总是由五个要素构成，一是政治环境，二是经济环境，三是文化环境，四是社会环境，五是法制环境。这五个环境之总称，我们谓之投资环境或营商环境。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9月提出，于2015年3月形成愿景和行动成文，之后，不仅有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而且联合国安理会也在2016年的11月17日联合国大会文件和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的文件中说明它的重要。从投资而言，这三年多来，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是511亿美元，去年一年投了149亿。

去年我们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去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是36500亿美元。虽然形势喜人，但上述的五大环境要引起高度重视。

就政治环境而言，我们还面临某些地区的政局动荡，纷乱频起。特别是要注意到一些国家在国有化征收和征用等问题上如何补偿，没有作出非常明确的规定。

在经济领域，过往的五年，全球经济年均发展水平对发达国家而言是2.5%，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4.0%。而中国在过往五年年均GDP的增长是7.2%，世界之最。但是，我们要打交道的国家有许多，经济的结构尚未得到必要的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尚不很明确。

因此从经济而言，全球仍然没有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1月份是预测了今年可以增长3.1%，目前把它调高到3.5%，也不过就是3.5%而已。

就贸易而言，今年年初WTO的预测是今年贸易增长1.7%，在5月份做了调整，由于考虑到中国今年1至5月贸易增长两位数的现实，因此目前调高到1.7%至3.4%的区间，但仍然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由此可见，经济风险就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散去，相关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明，而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

就文化而言，有些地方已经出现较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文化的排外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就社会而言，我们需要清廉的政府来支持投资的增长，我们需要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环境。就法治而言，法治在许多方面尚不健全。

当然，法治永远没有健全的一天，只能在与时俱进的推进中来健全法制。

防范风险

人们谈风险，似乎认为风险就是威胁。其实这样大的国际发展合作战略，风险十分正常，关键是如何来防范风险。因此“一带一路”提出三个“共”，我认为都基于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第一是共商，共商的原则就是国际法一个重要原则的延伸，就是相互尊重主权原则。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国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发展不论先后，我们来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如何推进。

第二是共建。共建基于契约原则，首先就是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契约问题，契约精神如何得到弘扬。

第三就是共享问题，利益共享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原则更多，有物权问题、有劳工法问题、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林林总总。

法治建设的五个层次

“一带一路”宏伟愿景要变为现实，法治是最根本的，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 **需要继续健全国家立法。**有一部法呼之欲出，应当成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就是对外投资促进法，或者叫对外投资法，或者叫对外投资保护法。去年，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名列全球第三，约为 1240 亿美元，比前年略减了 1%。但中国去年对外投资是 1830 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增长率是 44.1%。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大踏步走向世界的当下，国家制定对外投资法就显得极为重要。
- **完成更多国际条约的谈判。**到目前为止，中国和世界上 52 个国家有双边税收协定，和 56 个国家有双边投资协定，和 60 个国家有双边民航协定，这三类协定极为关键，但是远远不够。
- **用好当前的法治框架。**“一带一路”主要是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该地区有一个重要的协会叫做亚非法律协会，拥有 42 个成员国，其中有 28 个是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要充分用好这一 NGO 组织。
- **全力推进 WTO 相关法治的建设。**WTO 拥有 163 个成员，但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有一部分尚未成为 WTO 的成员。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推动 WTO 相关法治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促成部分国家成为 WTO 的成



周汉民

员。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重视周边体制的谈判。当下，十分重要的谈判包括：

1) RCEP 谈判，这属于 10+6 谈判的一部分，包括东盟 10 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该谈判将对“一带一路”推进、六廊六路、5+15 港口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2) 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这将对未来的“一带一路”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 **争端解决。**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哪些争议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明显的，大概有四大类。第一，合同法争议。第二，保护知识产权的争议。第三，劳工法相关争议。第四，物权法相关争议。

解决争议，一要借助相关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的帮助；二要对《纽约公约》和《华盛顿公约》这两大公约认真研究，对两大公约的实施应做到心知肚明。企业之间发生争议，如果用仲裁的方法，就要十分熟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的《纽约公约》。同时，要对《华盛顿公约》尤其是在华盛顿所设立的解决争议的国际中心 ICSID 高度关注。

一些人认为，世界的法律体制可以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然而，细分起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是一样的。因此，作为投资国家，对到往国家的法律现状、架构、内容有最基本的了解，是企业走向世界、防范风险最主要的手段。

“一带一路”未来继续发展，健全法治环境是第一步，而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落到实处、落到最根本处，就是法治环境。■

促进保险业发展 符合“一带一路”利益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主席、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周延礼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经济风险突出，中国正在建设一个现代、充满活力的保险业，积极采取风险防范措施，更好地满足沿线国家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需求。



周延礼

“一带一路”是相关国家携手发展的共赢之路，但在建设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风险。现代保险源于海上贸易的兴起，一部海上保险发展的历史就是大航海时代商品和资本全球流动的历史。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技术的进步，为近百年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指出，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从保险业的历史和属性看，保险业与建设“一带一路”是天然契合的，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保险业讲政治，顾大局，坚持保险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险业适应中国对外开放新形势、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还是保险业抓住历史机遇、拓展发展空间的必然要求。保险业应抓住机遇，乘势而进，充分发挥资金支持、风险管理、信用管理和监管制度等优势，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和融资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国际化发展，

这也是历史赋予保险业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本课题首先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其次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再次梳理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保险的需求；然后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险业发展及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现状；最后提出了我国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的方向举措。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继承和提升，是发展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开放的倡议，也是连接亚欧非的广阔“朋友圈”，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合作平等互利方式，追求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致力于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发展，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交流，发展区域经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促进中国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保障战略大通道安全以及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整个世界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以及世界和平稳定。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着诸多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认同，“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和平合作、开发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目前，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进来，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众多重大项目不断落地，在基础设施、项目合作、贸易投资等方面取得超预期的进展和成果。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局势动荡、民族宗教林立、种族冲突不断，“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政治、经济、法律、违约等诸多风险。其中，政治风险包含地缘政治风险、大国博弈风险、国家政局风险；经济风险包括投资环境风险、国际市场环境风险、企业国际经营能力风险；法律风险包括东道国法律法规风险、与东道国政府或企业谈判风险。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这些风险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巨大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巨大的保险需求

风险管理是保险业的重要属性，是保险区别于其他金融行业的重要特点。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机制与资金融通机制，保险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加快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和其他保险业务，发挥保险的损失补偿和风险管理作用，积极应对国内“一带一路”核心区、节点城市建设中的特殊风险保障需求和我国海外人员和财产、海外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保险保障。例如，在财产风险保障方面，工程保险、火灾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运输工具险、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为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财产风险保障；在人身风险保障方面，务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险种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相关人员保驾护航；在资金支持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长、稳定性高的优势，在依法依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债股结合、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方式参与“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

沿线国家保险业发展及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尽管面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保险业依然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从区域来看，“一带一路”沿线跨越中国、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独联体和中东欧等多个经济体，共65个国家和地区。总体而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保险市场大多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总体规模尤其是保险深度较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保险机构通过构建全球保险服务网络、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等方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中国保险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实力大幅提高，服务社会保障的范围日益扩大，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持续突破，具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基础。中国保险业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一方面统筹推进，做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主动对接风险保障和融资需求，创新产品和服务，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具体来说，一是提供资金支持。保监会加快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减少前置审批，放宽投资比例限制，丰富投资形式，支持保险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二是完善保险服务。保险业针对海外投资项目和出口合同的特点，量身定制保险方案。加强与银行合作，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融资设计等增值服务，提高企业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境外投资、海外工程承包等方面的竞标优势和投融资能力。三是深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保险业讲政治，顾大局，坚持保险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

化监管合作。加强与亚洲地区保险监管多双边合作，提升我国保险监管的区域影响力。加强“偿二代”在新兴市场的宣传和推广。

我国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方向及举措。

保险业要充分认识参与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建立长效服务机制，主动配合国家战略，在顶层设计、产品服务创新、资金运用、合作机制、风险管控等方面积极行动、主动作为，护航“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一是统筹做好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产品服务创新；三是创新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运用方式；四是建立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机制；五是提升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管控水平。■

“一带一路” ——创新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模式

外交部原副部长、国侨办原副主任何亚非表示，全球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将用自己的方式应对全球化挑战，并为世界经济指明一条更开放、更包容、更平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主席站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的新起点上，从中国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出发，面对日趋严重的逆全球化、碎片化和愈益抬头的民粹主义，就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未来提出了一系列根植于中国思想的全球公共产品。在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习近平主席已就创新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既为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核心理念和具体路径，也为创新全球治理的思想和模式提供了公共产品。这些思想和理念来源于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又紧密结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全球化面临巨大变化的现实。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脉相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哲学升华，“一带一路”则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应当说，这两者是道与路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是中国创新全球治理思想与模式的目标。“一带一路”正能够体现全球化的普惠、公平和共享精神，希望能够让沿线国家的人民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也是全球化的主人和推动力量。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无论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还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提出的这些新思想和新方案都把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

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处在十字路口，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已日落西山，全球治理呼唤结构性改革以及新



何亚非

的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创新了国际合作模式，希望沿线国家能够平等相待、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富裕。“一带一路”融合了中国梦与世界梦，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度一致性。

习近平主席说过，“‘一带一路’是各国人民的大合唱，不是中国的独奏，是建设百花园，不是中国的后花园”，这其中的深刻含义就在于“一带一路”将带动沿线国家人民的普遍参与。全球化要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就不能成为少数国家、少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的特权。开启全球化新时代，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更加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的全球化进程，提升开放与合作的水平，扩大开放与合作的范围。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中国在全球化新时代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对外开放，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开放，以构建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填补世界经

济的洼地，并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治加快转变。

“一带一路”所体现的开放与合作将带动欧亚大陆不同文明相互融合，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为世界和平与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新动力、新动能。有数据显示，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以减少关税、建立世界市场为目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5% 左右，而新的全球化通过软硬两方面的互联互通，将使全球经济增长 10% 到 15%。通过支持、引导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货币流通、拓展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将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开放与合作。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资金的筹集已初现成效，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兴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纷纷成立。亚投行去年为 7 个国家的 9 个能源和基建项目贷款 17.3 亿美元，撬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 125 亿美元，成功地实践了 PPP 模式。丝路基金投资集中在水电、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截至 2016 年底，实际投资额也达到 40 亿美元。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范围扩大，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与 28 个国家的央行签署了互换货币协议，其中涉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18 个，规模达 1.4 万亿人民币。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全球化变化的解决方案，既有理论上的创新，也有中国实践的经验，并非无本之木、空中楼阁。中国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是坚持走一条有别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靠和有效的政治制度作为体制保障，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两手并用，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确保社会的公平。站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全球治理的新思想，它所体现的是中国新的天下观、世界观，可总结为以下四点：

其一，中国新的大国观。中国已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强国之路受到高度关注。近年来，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修昔底德陷阱难以避免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表明中国不会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中国倡导的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其强盛之路就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合作共赢。

其二，是中国新的发展观。全球化的目标是促进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文明相互融合，从利益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进程中可能会有曲折和反复，但大方向不会变。“一

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希望在新的历史阶段带动合作伙伴共同发展，扩大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深化文明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来实现工业化，进而解决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问题。

其三，是中国新的国际合作观。“一带一路”倡议以平等发展、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国际合作基本原则，在相互尊重发展战略和文明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合作。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既强调南北合作，也重视南南合作，这显然符合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趋势。

“一带一路”所体现的开放与合作将带动欧亚大陆不同文明相互融合，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其四，是中国新的国际秩序观。“一带一路”突显了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的大国风范，中国既努力维护国际秩序，又呼吁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进而弥合发展的鸿沟，使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公正、合理。

围绕“一带一路”带来的新思路、新发展、新格局，我认为有三个重要方面需要加以重视。

首先，普惠性对战胜逆全球化的重要意义。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向世界释放出的强烈信息就是“一带一路”带来新的合作机遇，将给沿线各国人民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这体现出普惠性的重要性。

其次，加强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实现联动发展，克服世界经济失衡问题。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协调与合作。“一带一路”倡导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共享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跟上全球化步伐以及适应全球化变化提供了绝佳平台。“一带一路”突出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性，强调发展与和平这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为各国经济的联动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最后，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主要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要发挥表率作用，要克服地缘政治矛盾，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中美合作的加强将提升全球市场的信心，并进一步降低风险。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的核心是规则制定，“一带一路”建设同样涉及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国究竟寻求共同发展还是自行其是，“一带一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一带一路”倡议发表五周年调查报告： 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

2018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发表 5 周年，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中央银行》向 30 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进行了问卷调查，希望总结“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中国与双边及多边共同就“带路”项目开展合作所呈现的成果、问题及经验。

在此次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中央银行》调查问卷中，大多数受访国家期待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能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并认为高效的合作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一带一路”潜力。

——IFF CEO/ 秘书长张继中，《中央银行》杂志主编 Christopher Jeffery, 中央银行研究员 Emma Glass



中印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

就“一带一路”的规模和覆盖范围而言，它极有可能成为现代史上最大的发展性项目。中国签署的“走出去”项目已与 71 个国家缔结协议，这 71 个国家意味着 35 亿人口和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包括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泰国新建的高铁、中国 - 白俄罗斯工业园、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铁路系统升级，以及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项目——该项目包括一个全新的集装箱港口，以及连接中国西部内陆省份，长达 1800 英里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

“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官方援助项目，而是由中国领导的，旨在提高互联互通及合作的发展计划。因此，一带一路投资有望产生经济效益，并且项目成败也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一带一路”辐射范围广，也将面临一些挑战。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如：沿线国家如何提高自身能力，充分参与“一带一路”？资金来源有哪些？有什么风险？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地缘政治带来的问题。另外，这项由中国主导，并传播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及资本的项目，是否会引发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的紧张局势？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中央银行》杂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央银行展开关于“一带一路”的问卷调查，收集他们对“一带一路”现状，以及对未来挑战和机遇的看法。大多数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为国家经济和金融事务建言献策的主体机构，同时承担着维护金融稳定，以及管理货币政策的职责。近三分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互换货币协定。

本文将呈现 2018 年 1-2 月在各中央银行展开问卷调查的结果。该调查问卷为匿名调查问卷，秉持自愿参与、积极合作的原则。

调查报告要点归纳：

- 大多数中央银行并未积极地向本国政府的官方发展机构宣传“一带一路”倡议，但大多数中央银行都会积极建议政府直接同中国开展贸易。
- 近一半的中央银行将“一带一路”倡议看做“千载难逢”的机遇。

受访者范围：

中央银行向 30 个具有代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央银行发放调查问卷，并最终获得 26 个有效调查问卷，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来自欧洲，亚洲地区仅占三分之一，中东和大洋洲地区亦有参与。转型经济体在这次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占 4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均占总数的 19%。四家中央银行来自工业经济体。

地区	百分比
欧洲	58%
中东	15%
亚洲和大洋洲	27%

经济体	百分比
新兴市场	19%
转型经济体	46%
发展中经济体	19%
工业经济体	15%

在部分图表中，由于四舍五入，总和的百分比可能会大于或小于 100%

- 50% 的受访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比本国开发银行的项目更重要；21% 认为比 IMF 和世界银行的项目重要；14% 认为比区域开发银行的项目更重要。
- 近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一带一路”带来的投资尚未达到预期。
- 92% 的受访者期待“一带一路”能在接下来五年内让本国经济获得提升，其中 67% 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带来的增长不超过一个百分点，25% 认为在 2-5 个百分点之间。
-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资金将被投入超大型和大型项目，而非小型项目。
-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资金来源是中国的开发性银行、亚投行以及其他多边机构——金融中心在该项排名靠后，排在首位的伦敦仅为 33%。
- 32% 受访者倾向于使用本国货币作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货币。29% 倾向于使用欧元。支持人民币和美元的数量持平，都为 19%。
- 63% 受访者积极支持 / 支持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用储备货币扩大资本规模。60% 倾向于用本国货币扩大资本金规模——但所有受访人一致不建议将本国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用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

- 受访者非常重视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道德标准和透明度。
- 35% 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发展成为区域性、全球性的合作机制；35% 认为“一带一路”需要制定更详细的标准；29% 认为“一带一路”需进一步提高机构机制建设和透明度。其中，欧洲的中央银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绿色金融的发展，其他受访者则认为两者不太相关。
- 法律框架、融资及政府部门被认为是阻碍发展的最大障碍。
- 政策和政治风险被普遍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威胁。
- 42% 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会与欧盟合作伙伴产生冲突；33% 受访者认为最可能产生冲突的是美国。被认为最不可能产生冲突的国家 / 地区是俄罗斯、日本和印度。

- 就国家层面而言，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以下领域带来威胁：36% 受访者认为是资金能力；27% 认为是货币政策；18% 认为是金融稳定。
- 各国的“一带一路”参与程度参差不齐；大多数受访的中央银行认为本国还未为“一带一路”倡议制定配套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调查结果详细说明

推广中国“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来自中央银行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并未积极地向国家政府及 / 或发展机构宣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但中央银行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通货、支付以及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所以目前各国中央银行不是推动“一带一路”的主要力量。不过，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 5 年了，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金融及经济顾问，他们的态度应当引起关注。当然，也有部分央行对此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欧洲一家中央银行表示，“就‘一带一路’问题而言，我们同政府开展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另一家亚洲的大型中央银行也表示，“我们会定期向政府提供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展望。”

部分央行借由与多边机构的合作，特别是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支持的发展银行相比，各国央行行长目前不太可能加入亚投行董事会担任金融部门的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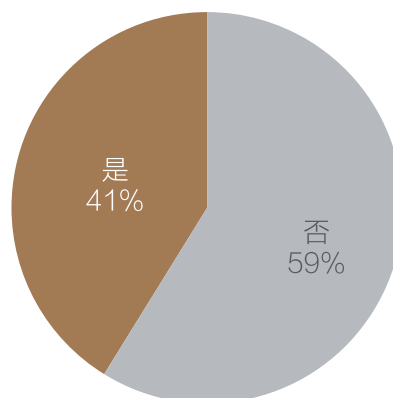
部分中央银行非常积极地参与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金融问题。一家中东欧的中央银行表示，银行在本国内就“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很多相关的战略指导方针咨询，涉及最多的是财务问题和金融体系发展问题。

积极参与中国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央行中，超过 70% 的央行表示已与中国直接接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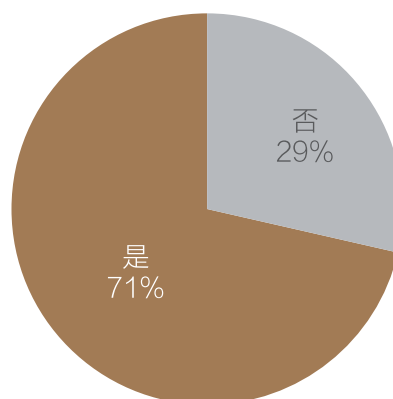
中亚地区的一家大型中央银行表示，他们已就银行间的合作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家东南亚的央行表示，他们一贯支持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与中国开展合作。一家欧洲中央银行提到，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已经启动，而且愿意进一步与一带一路参与国深化合作。另一家欧洲银行则强调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协议并非“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组成部分，但他们希望借此加强双边的商业贸易。

图 1：您所在国的央行是否积极地向政府及 / 或发展机构宣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9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图 1.1：若上题选择“是”，那么您所在的央行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是否有直接的接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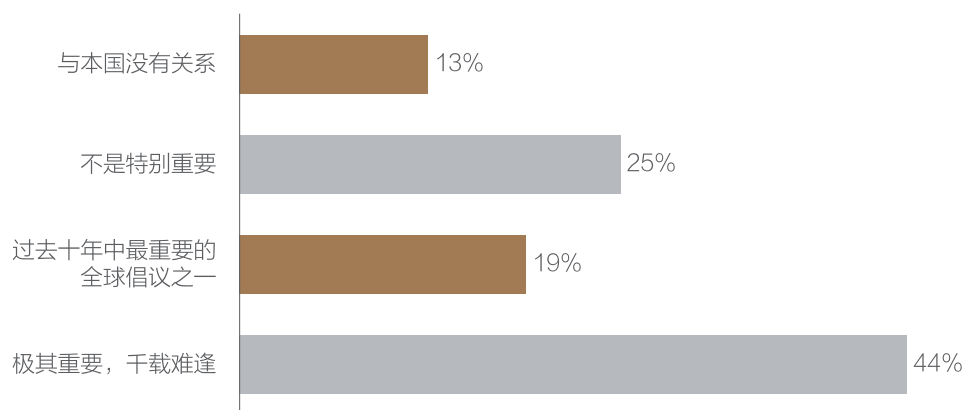
“一带一路”倡议对其他国家的意义

近一半的中央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极其重要，千载难逢”，20% 的央行认为这是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全球倡议之一。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欠发达国家交通、物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发展的大好机遇，同时还能够提高相关国家贸易和服务的速度。

来自中东地区的央行表示：“我们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之间的贸易流通。此外，该倡议让我们有能力获取新的融资来源，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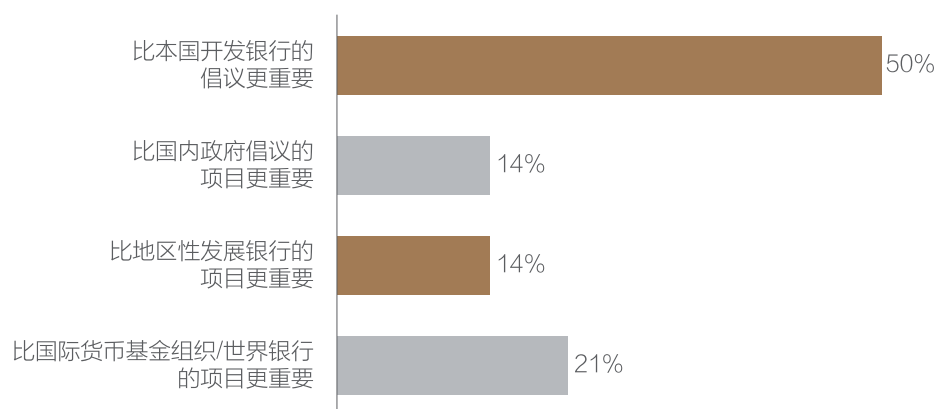
一家远东中央银行补充道，“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

图 2：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贵国的意义属于以下哪个等级？



10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图 3：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属于以下哪个等级？



15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提高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连通性。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基础设施网络连接起来，使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建立更紧密、规模更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

一家大型中央银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增加双边投资的好机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推动国内技术和社会的进步。来自前苏联的一家中央银行表示，这项倡议将对技术能力建设、技能开发和创造就业影响最大，特别是为年轻人和女性创造就业机会。另外，倡议应推动依托贸易，尤其是中小企的贸易活动，建立长期增长的发展模式。

一家中东欧的中央银行认为，如果能积极有效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它将发挥重大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等级

15% 的央行受访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优于本国政府倡议的项目；另外，50% 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比本国开发银行的倡议更为重要。

比较出人意料的是，总计 35% 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本国的重要性要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21%）以及地区性发展机构（14%）的项目。一家中东欧的中央银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参与国之间的双赢合作，来自东方的技术和资金对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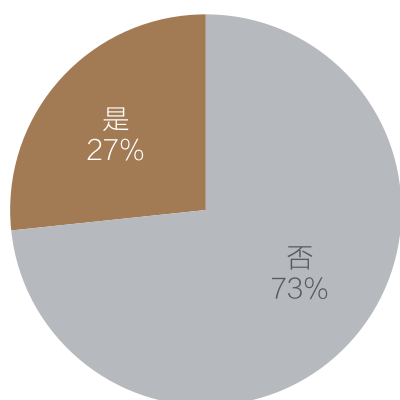
很多中央银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与现有的多边及国内发展机构孰轻孰重难以评判，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倡议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位来自中等规模的亚洲央行的受访者表示，倡议和上述机构提供的项目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实操都不尽相同，因此难以直接比较。

一家欧洲中央银行还提到：

“虽然题目中有很多可供选择的答案，但其实很难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性的程度，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肯定与国际和国内发展有很大关系，必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项目产生重要关联。从另一方面来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其他此类机构参与金融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发展都至关重要。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将伴随“一带一路”倡议。

一些中央银行认为，问题的范围应当更加广泛，不只限于财政方面的影响。

图 4：“一带一路”倡议为贵国带来的投资是否比预期更高？



11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更多投资

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投资并没有高于预期。多数中央银行都表示，假如没有“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这些投资依然会存在。

然而也有一些不同观点。一家中型的中央银行提到了中国国企和公共部门的港口建设项目。另一家来自中东欧的中央银行指出，他们希望在今后的几年内，“一带一路”倡议能为铁路和公路建设、住房、能源部门、采矿和其他等领域带来更多的投资。

来自亚洲的中央银行表示：“我们同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能够进一步确保中国主导的开发银行会提供所需的资金支持，帮助我们升级基础设施，提高与其他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

一家中等规模的中央银行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项目。该项目着重发展物流以及高价值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知识型社会。受访者表示：“我们还想将整个地区的创新型经济体和供应链连接起来，‘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让该项目更加完善。”

预计“一带一路”倡议将拉动 GDP 增长

中国愿意向欠发达国家推广其增长模式，并且认为互联互通有助于帮助“一带一路”参与国经济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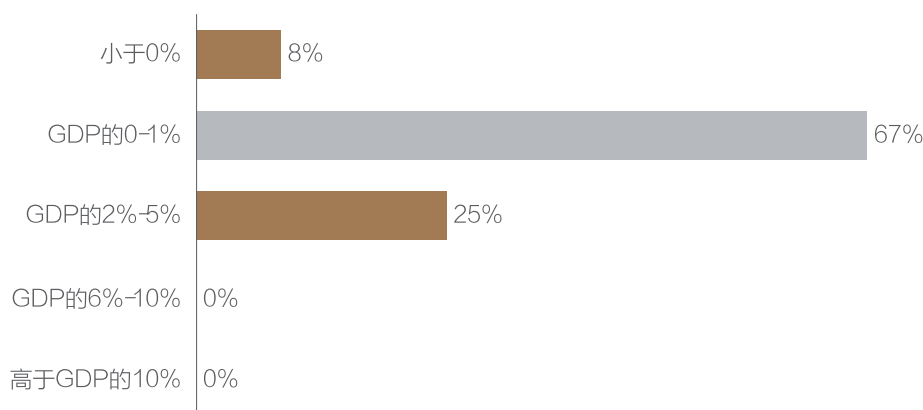
92% 的中央银行受访者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能够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其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增长不会超过 1 个百分点。有 25% 的受访者态度更加乐观，预计增长将介于 2-5 个百分点。对增长普遍乐观的预期可以说明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家来自中东欧的中央银行表示，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他们的国家有机会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利用来自中国的资金，以此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区域间和国际贸易路线也能更加畅通。这种方式也可以为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政府同意全力支持中国的新型“经济哲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原则，即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融资。该银行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未来五年定会 GDP 产生积极的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很难用数字来计算。

另一位中东欧的中央银行受访人补充道，增长预期不仅取决于参与度，还取决于来自外部的机会。这些倡议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涉及许多机构和决策机构。目前，倡议对 GDP 产生了很大范围的影响，不过，这一举措有望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其他中央银行认为很难估计整体影响。一家东南亚中央银行表示，未来增长的主要引擎还是本国的新经济战略。他们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促进投资，与本国的经济战略互为补充，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预计会很小。也就是说，直接贡献可能很小，但间接效应会更大。

图 5：在未来五年内，预计“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能够拉动多少 GDP 的增长？



14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很多央行选择不做出预测。一位欧洲央行的受访者表示，因为目前尚未形成稳定的投入，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中东地区央行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不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经济。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公开披露的项目只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因此对 GDP 可能有边际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分布

中国经常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的不仅仅是大型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且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建设，其中还包括中小企业和财政。但这一精神还尚未完全渗透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央银行当中。

调查结果显示，中央银行普遍认为，大型基础设施（铁路、

公路、高速公路、工厂、农业水利工程）和超大型基础设施（发电站、电网、高速铁路网、城市地铁、轨道交通）能得到最多资金支持。55%的中央银行认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最有可能获得“一带一路”资金，这部分人中 44% 将第二名给了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36%的受访者将超大型基础设施列为最有可能的项目，这部分人中 22% 的人将第二名给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一位东南亚中央银行的受访者表示：“我们可能会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物流的枢纽。说到这一点，我认为基础设施和建设项目将优先获得‘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资金支持。”

一家欧洲的小型央行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道路建设和一般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获得的资金支持最多。一些区域内和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也会获得发展机会。

另一家欧洲央行表示，他们是基于中国投资者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发电厂项目的投资表现而得出的观点。“根据我们

图 6：下列选项中，哪个项目能获得“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资金支持？

	1		2		3		4		5		总计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超大型基础设施	4	36	2	22	1	11	1	11	1	13	9
大型基础设施	6	55	4	44	0	0	0	0	1	13	11
中型发展项目	0	0	2	22	4	44	2	22	1	13	9
中小型企业	0	0	1	11	3	33	4	44	1	13	9
金融之外的领域	1	9	0	0	1	11	2	22	4	50	8

1-5 排序，1 表示最重要。

图 7：您认为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哪里？

	1		2		3		4		5		6		总计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中国发展性银行和国有银行	4	40	2	22	1	10	0	0	0	0	2	22	9
中国民营企业	1	10	2	22	3	30	3	33	0	0	0	0	9
国际商业银行	0	0	1	11	1	10	3	33	1	11	3	33	9
多边机构	2	20	1	11	1	10	2	22	4	44	0	0	10
中国支持的多边机构	2	20	2	22	3	30	0	0	2	22	0	0	9
金融市场	1	10	1	11	1	10	1	11	2	22	4	44	10

1-6 排序，1 表示最重要。

了解，到目前为止，选项中的剩余三类项目（中型发展项目、中小型企业 and 金融之外的领域）没有因“一带一路”倡议而获益。（但是，这些项目有获得来自非“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资金来源

44%的中央银行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支持将来自中国发展性银行和国有银行，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预期资金来源。中国支持的多边机构（20%将其作为首选，22%作为第二选择）和其他多边机构（首选为10%，第二选择为20%）占比也较高。与此同时，中国民营企业（第一选择为10%，第二选择为22%）尽管相比于前两个选项重要性有所降低，但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中国鼓励私人资本进入，但预计国际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的作用不突出。

一家16+1集团的中央银行总结了许多机构的意见，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支持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发展银行和国有银行，部分来自中国民营企业以及中国支持的多边机构。

一些央行表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一家中东欧的中央银行表示，与中国投资者就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会谈仍处于初期阶段，所以目前还无法精确地给潜在资金来源排位。

少数央行提到应将欧洲的机构纳入选项，如欧元/欧盟的市场及欧元/欧盟的银行。另一位中央银行受访者表示，应将欧洲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一同列入多边机构的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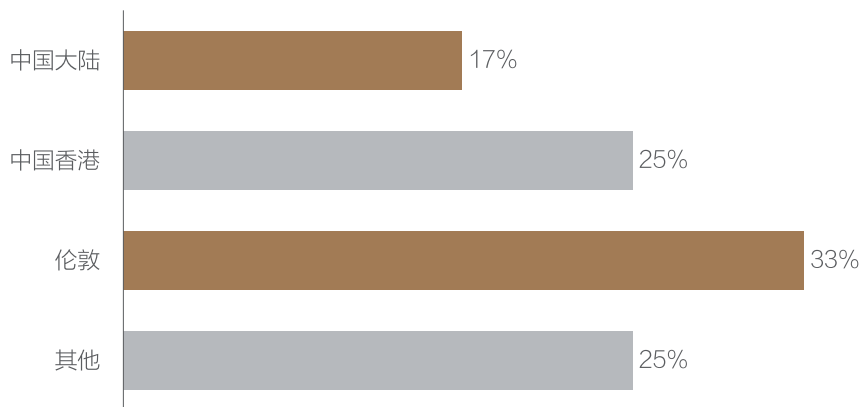
一家大型央行表示，他们已频繁与中国人民银行探讨在中国的金融市场首次公开募股（IPO）的问题，但“项目尚未实施”。

就目前来看，尽管现在有大量资金想要寻求比现存市场手段更高的回报率，但金融市场暂时不会在“一带一路”项目的资金筹措中发挥重要作用。伦敦在这一选项中排名第一，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紧随其后。一位欧洲央行受访者表示：“鉴于当前的大趋势而言，资金很有可能来自香港市场。”

“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使用货币

许多中央银行意料之中希望使用本国货币为“一带一路”倡议融资（32%），以避免外汇风险。但是许多央行也赞成使用欧元（29%）融资。

图 7.1：若上述问题选择选择“金融市场”这一选项，请指出地点



一家中东欧央行认为：“为了尽量减少对经济和金融潜在的负面影响，可能更青睐使用本国货币。但是，当地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对市场的过度依赖可能会挤压国内投资项目。欧元（鉴于我们和欧盟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增长）和国内货币的组合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一家欧元区的央行补充称：“欧元是唯一的官方货币，所以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最好能够消除外汇风险。除非进行有效的对冲，并且（或者）确保非欧元资金的收益会超过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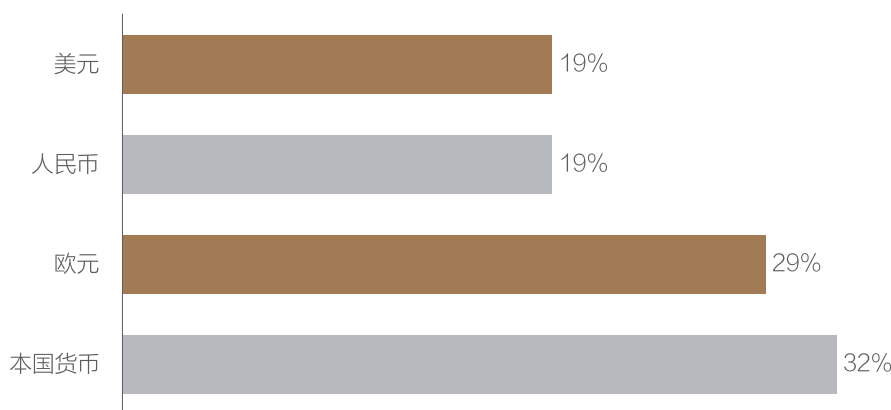
部分受访者认为人民币在国际上作用日益重要，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赞成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使用人民币，与赞同美元的比例相同。一家中等规模的中央银行表示：“我们国家致力于通过人民币相关协议和举措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关系。”

一家中型亚洲央行表示正在推动区域货币的使用：“就人民币的推广情况来看，我们已经指定了一家中国的银行作为清算银行来处理人民币交易。除此之外，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也签署了一系列互换协议，保证货币的流动性，这使得双方的央行能够使用对方的货币。这一举措也增强了私营部门和金融机构使用本地货币完成跨境投资结算的信心。”

另一家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双边互换协议的中央银行称，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将来中国投资从人民币直接兑换为当地的货币，并且，所有的项目活动都可使用本国货币。然而，即使“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其他硬通货如美元和欧元进行融资，项目对于刺激当地经济增长也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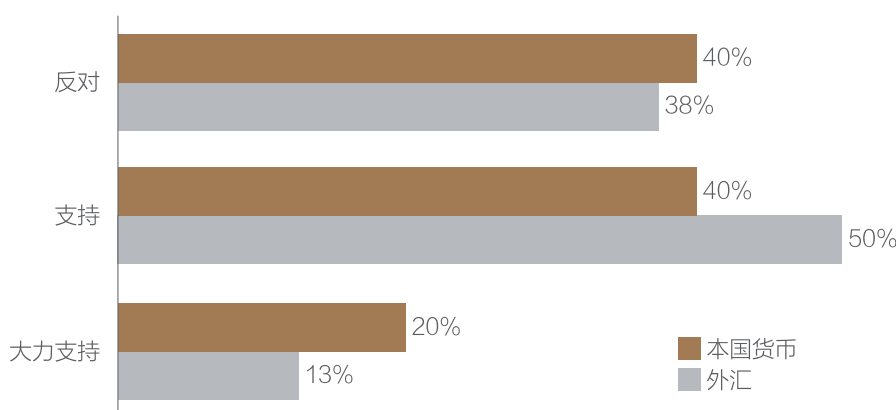
另一家亚洲央行较为不偏不倚，认为货币的选择应该由相关决策者来决定。

图 8：您建议“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使用以下哪种货币？（可多选）



8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图 9：如果新开发银行 (NDB)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通过外汇储备（如美元）扩大资金，您所在的中央银行持什么态度？



17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扩大新开发银行 (NDB)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资金

对于中国领导的多边机构，如新开发银行（又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扩充资金的问题，参与此次调查的大多数中央银行并未表达观点。目前新开发银行正在争取扩充成员数量。

一家中型央行表示：“我们不是上述提到的银行的成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特别明确的立场。”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央行认为，中央银行参与亚投行的程度有限，因为这些事项属于财政部的职责范围，涉及财政资源的使用。

尽管如此，在做出回应的央行中，共计有 63% 的央行表示“大力支持”或“支持”使用储备货币扩大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资金，有 38% 的央行表示反对。与此同时，60% 的受访者赞成以本国货币扩张资本，而 40%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总体来说，中央银行愿意为中国领导的多边机构进一步扩充资金。一家亚洲央行表示：“我们支持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增资，更好地在‘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中发挥作用。”

但并非所有机构都赞成额外筹资。一家欧洲央行表示：“因为我们不是新开发银行的成员，所以我们的答案只针对亚投行。亚投行现在看起来资本很充足。”另一位受访者表示：“目前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不利于我们在新开发银行中扩大份额。”

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及主权基金 (SWF) 资产是否应当用于投资“一带一路”建设

尽管传统储备货币资产的收益环境充满挑战，中央银行难以从外汇储备上获得利润，加之去年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投资了 10 亿美元用于国际金融公司基础设施项目，但央行还是一致反对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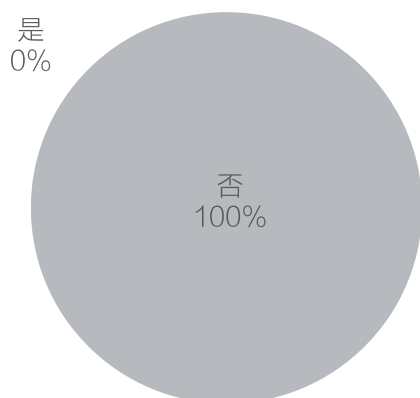
一家中型央行表示，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的作用不应有所改变。

另一位央行受访者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央行的认同：“国际储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资金的国际流动性。所以我们认为，为了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国际储备基金的投资不应仅仅着眼于某一具体项目，而是要根据证券的信用等级来决定。”

一家中东欧的中央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不应是外汇储备。另一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大型央行补充道：“外汇储备不用于工业和基础设施。”

实际上，即使是拥有主权财富基金，或央行外汇储备较大的国家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流动性较小的领域。

图 9.1：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及主权财富基金 (SWF) 是否应当用于投资“一带一路”建设？



15 位调查参与人没有回复。

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道德标准和透明度

中央银行压倒性地支持“一带一路”项目贯彻合理的道德标准和透明原则，89%的受访者表示这“非常重要”。只有 11% 的央行认为道德标准是“重要但不是必要的”，没有任何中央银行选择“不重要”或“不相关”。

一家欧亚中央银行表示，道德标准和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亚太地区的中央银行则补充道：“道德标准和透明度对‘一带一路’以外的发展同样重要。”

一家小型欧洲央行也指出透明度的优势：“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都应对透明度有所要求，这样一来，所有市场代理都能清楚相关的收益和成本。”

关于对“一带一路”发展的评价

共计有 35% 的受访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发展成为区域或国际合作机制。一家亚洲中央银行认为：“区域金融的贯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之间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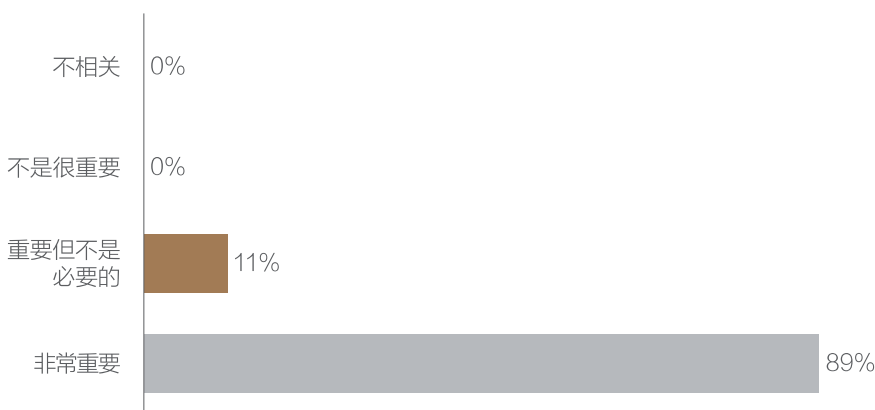
但是，35% 的受访者认为该举措需要更加具体，并且要制定标准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另外 30% 的受访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更加透明，体制机制也需进一步改善。

“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金融

与欧盟关系密切的央行以及其他欧洲各国央行就“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对绿色金融做出了贡献这一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调查参与人中有一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会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其中多数人来自欧洲。一家中大型欧盟央行表示：“我们相信，‘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会符合国际气候变化的协议以及基础设施融资的新兴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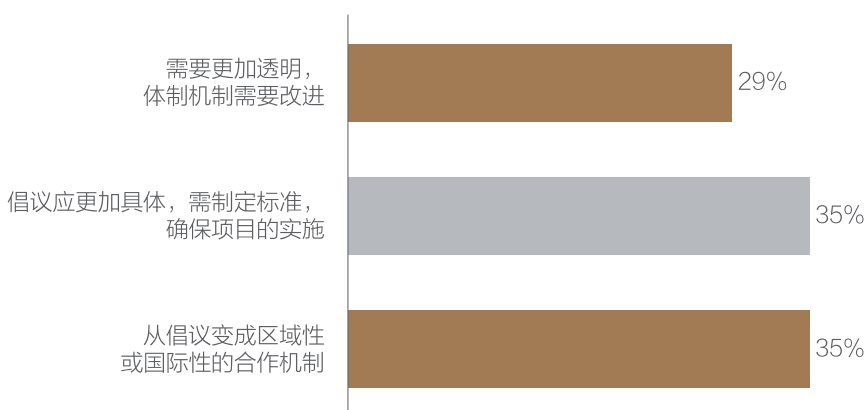
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一家央行补充道：“现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今后‘一带一路’

图 10：“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道德标准和透明度有多重要？



8 位调查参与人没有回复。

图 11：下述哪个选项最符合您所在的央行对“一带一路”发展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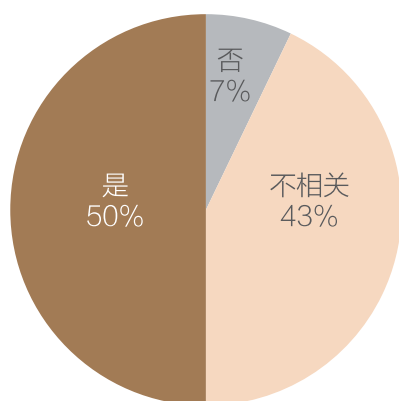
9 位调查参与人没有回复。

倡议所有项目都需要将重点放在绿色金融上，这一点非常重要。”另一家欧洲央行则表示：“我们国家一直都致力于环境保护，绿色金融可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长期的投资，而且在这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者对中国有一些批评，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包括巴基斯坦等国资助了高污染的燃煤发电厂。南亚的国家需要自己生产煤炭，这就不得不进口天然气，这些国家的银行业人士认为，即使不是中国，他们也不得不寻找其他来源资助新的燃煤电站。这种迫切的发展需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43% 的受访者，特别是亚洲的受访者，认为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无关。

然而，态度可能正在改变。一家小型央行的受访者称，投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厂有助于绿色金融的发展。另一个小型央行补充道：“中国现在认为绿色金融是发展计划的核心。‘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绿色金融提供平台，为建设非碳氢化合物能源设施提供更多的资金。”

图 11.1: 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绿色金融有关联吗？



12 位调查参与人没有回复。

发展“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潜在阻碍

“一带一路”项目发展的最大障碍依次是法律框架、融资、政府部门和信用评级。共计 45% 的受访者认为法律框架是“一带一路”项目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阻碍，36% 的受访者则认为融资是首要问题。有 44% 的受访者第二选择为政府部门。信用评级问题在首选中占据 11%，第二选择为 33%。

由于一些国家是现有的贸易集团中的成员，他们必须遵循贸易集团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可能成为部分阻碍“一带一路”的法律障碍。一位欧洲央行受访者认为，最大的障碍来自法律规定（仅指欧盟法律框架）。亚洲中央银行表示，尽管正在试图精简法规，但是参与项目的外国承包商可能仍会面临监管上的负担。

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的高成本资金。中欧和东欧的一家中央银行说道：“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最大障碍是来自中国的昂贵融资，还包括融资保险上的花费。如果这方面能够有所调整的话，相信‘一带一路’的项目会更多。”

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在政策壁垒

受访者认为政策风险（首选为 18%，第二选择为 45%）和政治风险（首选为 36%，第二选择为 9%）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障碍。一家中等规模的“一带一路”参与国央行认为：“我们现在的立场非常明确。国家过去的政治局势较为紧张，受到的外国势力影响也较复杂，所以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国际上的政治风险。”

有些受访者还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一位亚洲央行的受访者表示，利益相关方并不明确政策的实施计划。

一些受访者则表示担心汇率的波动（首选为 27%）和其他的投资风险（首选为 9%，第二选择为 45%）。

图 12. 下列选项中，哪个是贵国发展“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最大阻碍？

	1		2		3		4		5		总计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政府部门	0	0	4	44	1	11	2	22	2	22	9
私营部门	1	9	1	11	3	33	1	11	3	33	9
融资	4	36	0	0	3	33	2	22	1	11	11
法律	5	45	1	11	0	0	3	33	0	0	9
信用评级	1	9	3	33	2	22	1	11	3	33	10

用 1-5 排序，1 表示最重要，14 位调查参与人没有回复。

图 13. 您所在的央行认为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政策壁垒是什么？

	1		2		3		4		5		总计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投资风险	1	9	5	45	2	18	2	18	1	9	11
政策风险	2	18	5	45	3	27	0	0	1	9	11
政治风险	4	36	1	9	3	27	2	18	2	18	12
资本项目管理风险	1	9	0	0	1	9	5	45	2	18	9
汇率波动风险	3	27	0	0	2	18	1	9	5	45	11

用 1-5 排序，1 表示最重要，13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一家小型欧洲央行担心外汇流入可能引发汇率波动以及经济和金融震荡。来自 20 国集团的中央银行也提到了汇率的动荡：“部分‘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投资人指出了汇率波动的对冲风险问题。”

与战略伙伴的摩擦

中国已经阐述了一系列欢迎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但由于参与国家众多，且会影响既得利益集团，未来势必会产生紧张局势。

参与调查的中央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与欧盟（42%）和美国（33%）产生的冲突最大。欧盟成员国在 2017 年时对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项目的部分内容提出异议，其原因是认为不符合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以及透明原则。与此同时，美国最近称中国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并开始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其中包括对价值 600 亿美元的产品进行投资和关税的限制。

一位中东欧的央行受访者称：“如果这项倡议与欧盟 / 美国的项目和政策不一致，或者说没有适当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或政治利益，那么肯定有产生摩擦的风险。但是考虑到‘一带一路’目前在这的投资规模和范围，我们预计不会产生冲突。”

另一位欧洲央行的受访者表示：“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与欧盟的目标相冲突。中央银行坚定地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同时希望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建立友好、繁荣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两个过程应该相互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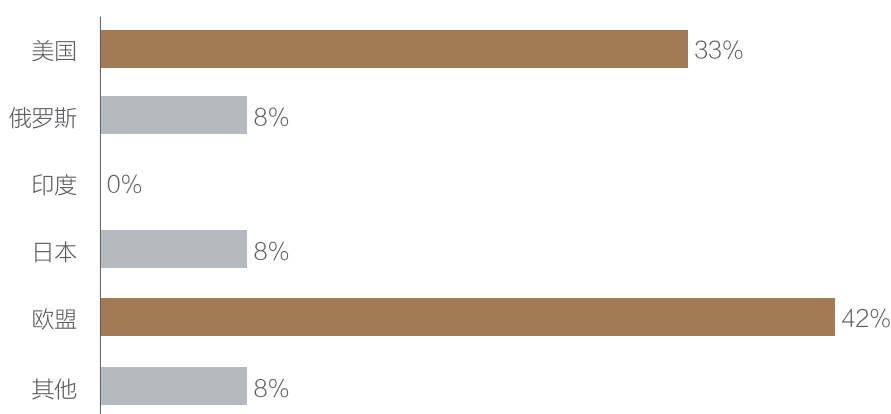
一家中东的中央银行也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供净收益：“‘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加强我们与现有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并创造新的机会，与新的经济伙伴合作。”

一位亚洲受访者补充道：“‘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视为是双赢合作。这个倡议是个很好的机会，让国家之间更融洽。我们并不认为会因‘一带一路’倡议而与战略伙伴产生冲突。”

尽管中亚和中东欧的许多“一带一路”参与国属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但这些国家似乎并不担心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会产生冲突。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俄罗斯本身已经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并对中国这一战略性倡议持欢迎态度。

一家位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的欧亚中央银行表示：

图 14: 您是否担心“一带一路”倡议会与其他战略合作伙伴产生冲突？（可多选）



14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央行并不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导致我们与任何战略合作伙伴产生摩擦。”

比较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任何央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会导致与印度产生摩擦。作为最初的金砖国家之一，印度没有参加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印度还反对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经济走廊，因为走廊穿越了引发印巴归属问题的克什米尔争议地区。

“一带一路”倡议与风险领域

虽然很多央行没有对此问题作出回应，或认为在指定区域内没有风险，但是在有回复的中央银行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为国家带来的最主要风险是对国内融资能力的影响（36%），其次是货币政策（27%）和金融稳定（18%）。一位中东欧央行的受访者表示：“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不会对上述领域构成风险。”东南亚的一家中央银行则认为：“在国家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在上述领域内不会有风险。”

央行没有详细说明他们担心国内融资能力受到“一带一路”倡议负面影响的原因，但他们确实就其他问题提供了一些细节。一家巴尔干半岛的中央银行道：“项目需要经过精心挑选，设计并实施。否则，会因此造成财政上的负担，而且其外溢效应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尤其是财政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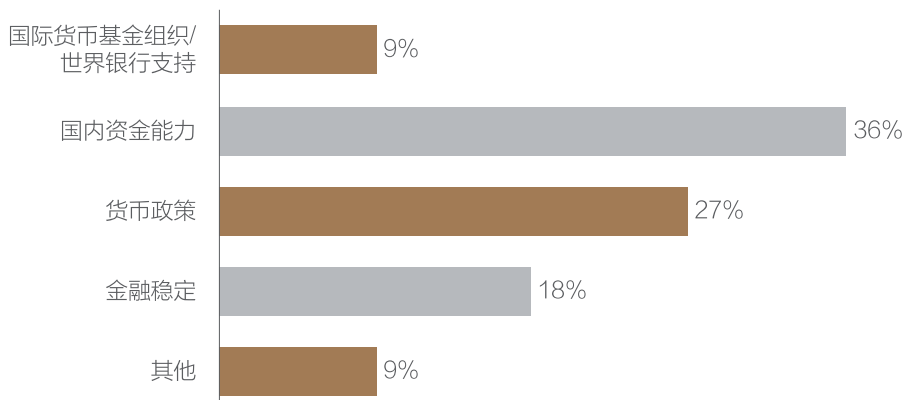
另一家小型央行重申了之前对外汇资金风险的担忧。这家央行表示：“外汇融资出现风险会导致货币政策也出现问题。如果项目因外包建筑合同给国内的施工人员，引发大量的国内借贷，那么金融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应计划

目前中国迅速采取行动，“一带一路”已经囊括了约71个国家，但是各地区的参与度层次不齐。大多数中央银行表示，他们的国家还没有拟定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

一家中型亚洲中央银行的回应总结了多方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制定相应的计划参加‘一带一路’倡议。但是，我国已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框架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图 14.1 您是否认为“一带一路”会给贵国以下领域带来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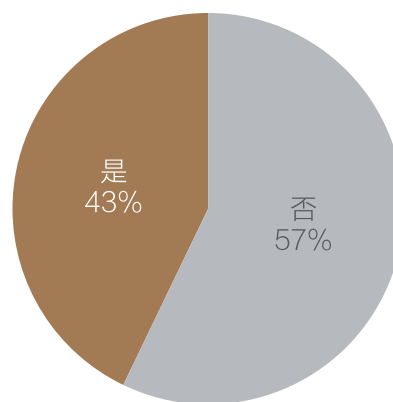
15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另一家中欧的中央银行补充：“我们政府在2017年5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全面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指导原则，但参与这一倡议的具体计划仍有待细化。”

一家来自较大经济体的中东国家央行表示，由于该国目前有一些中国基建公司的投资，所以出台了一些计划，但尚未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中。

一家央行所在的国家自2014年起，因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该国投资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获益，该央行的受访人表示，2017年5月中旬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其他国家除了签署“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之外，还将开展更具体的合作，例如港口和港口工业园区项目，这类情况在16+1国家较为常见。■

图 15：为了参与和用好“一带一路”倡议，您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12 位调查参与者没有回复。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全球金融领域 "F20"

战略对话 / 交流合作 / 实践创新 / 全球智库 / 金融人才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由中国主导，总部设在北京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G20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

官方网站：

www.ifforum.org

腾讯微博 / 新浪微博：

国际金融论坛



关注IFF微信

搜索“IFFweixin” / 扫描上方二维码



国际金融论坛（IFF）北京总部

“丝路国际联盟”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表示，“丝路国际联盟”将遵循联通性、创造性、可持续性与社会责任这几大原则，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金融论坛发起成立的“丝路国际联盟”能够在促进“一带一路”目标实现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战后的全球化让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尽管它也带来了收入不平衡等负面影响，但其积极影响仍远多于负面和消极的影响，对全球经济增长与普通人生活质量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丝绸之路”可以被看作全球化的开端，人员与货品沿着丝路的交流创造出新的增长和就业，进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丝绸之路”使沿线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其承载的并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通过人员交往也促进了知识、思想、文化乃至宗教的交流，对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些相关的地方最后都发展成为文化中心，科学、艺术、文化都沿着丝路得到传播。今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会因丝绸之路的复兴而受到巨大影响。因此，“丝路国际联盟”在做项目规划时必须时刻牢记要以人为本。

国际金融论坛发起建立“丝路国际联盟”基金，由“丝路国际联盟”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而这个管理公司将由国际金融论坛负责运营。当前，已有诸如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致力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同样还有中国政府主导的丝路基金和进出口银行。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相信像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也将参与其中。

在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和社会项目投资时，“丝路国际联盟”与 IFF 资产管理公司必须确立自身独特的定位以及明确的投资原则，即强调联通性、创造性、可持续性与社会责任。联通性和创造性或许也是其他机构追求的目标，但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应该成为我们进行项目选择时所特有的原则和标准。

谈及“联通性”，“一带一路”的核心无疑是互联互通，通过公路、铁路等物流线路将六十多个亚欧国家连接起来，覆盖全球经济与人口的一半以及四分之三的能源，“丝路国际联盟”一定努力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积极贡献。



韩升洙

对于“创新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依赖的是蒸汽机和机械化，第二次依靠电力和其他能源来发展大规模制造业，第三次是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来实现信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仍以信息技术为最重要的资本，它的基础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3D 打印、生命科学及其他前沿技术。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在选项目时技术革新应当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丝路国际联盟”应努力将科技创新置于项目推进的首要地位，帮助丝路沿线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参与技术密集型项目来获益。

“可持续性”与“社会责任”也是十分重要的标准。2015 年 9 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商议，推出了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拟在全球层面推动 17 项发展计划，以应对贫穷、饥饿、就业和健康等问题。“丝路国际联盟”应当尽力参与和推动这类项目，比如支持低碳、新能源及互联网发展等。在社会责任方面，由于全球化最负面的效应是财富分配不均衡，丝路沿线国家应尽力减少这类影响。为避免贫富差距扩大，应当鼓励各类机构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尽可能促进收入的平等并确保弱势群体生活的改善。

随着国际金融论坛步入投资这个新领域，共同的知识经验和遍及全球的广泛网络，将能够帮助我们推动“丝路国际联盟”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助力边缘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化

新西兰前总理詹妮·希普莉认为，“一带一路”能让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共享全球合作的硕果。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帮助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尤其能够让很多没有出海口的国家与世界联系起来。

毋庸置疑，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支持下这一倡议的落实进展非常快，无论质量还是资源汇集的速度都引发世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公路、铁路、航空网的建设将相关经济体联系起来，其关键在于让人与人之间以及市场之间能够联通起来。

全球经济处于转型阶段，新兴技术的应用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正在颠覆一切旧的概念，我们也正在适应这些变化。“丝路国际联盟”应当思考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对于“联通性”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应当认识到有很多人并没有获取资源和资金的渠道，因此仅仅是修建高速公路和铁路这类交通基础设施是不够的，还须建设电子银行、电子商务这样的平台来缩小这种差距。

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差异体现在许多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是不发达的、被孤立和隔绝的经济体，我们应当努力把这些地方与外部联通起来，让它们融入到全球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去。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使人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提高生活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生活的愉悦和幸福感。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然而，文化方面的差别更不容忽视。“一带一路”倡议应当传播一种普世价值，对于很多地区的人们而言，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寻找和培养相关人才，借助他们多样化的经验以及不同的文化、教育、宗教背景，将各种各样的因素进行融合，以此创造一种包容、开放的生态。在治理结构方面，我们必须作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和改变，以期能够让更多的人对这一倡议产生认同感。



詹妮·希普莉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使人们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提高生活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生活的愉悦和幸福感。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请大家思考。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基于这样的目标制定什么样的原则。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任何组织，如果自身宗旨不明确，或者缺乏明确的办法来实现目标都是行不通的。对于“丝路国际联盟”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而言，就是促进各方的对话和交流，最终实现彼此心理上的互联互通。对此，我们不能够再固守以前的对话体系和传统，而应该着眼于未来，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变化。其次，我们必须重视加强合作。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习俗、文化和宗教，但是我們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生活得更美好，能够拥有繁荣的未来。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合作，需要求同存异，以此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



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一名中国货车司机等待出发。

我们现在面临的真正挑战就是如何建立互信，如果不能创造一个互信的环境或体系，一切期望都无从谈起。我们必须整合和运用过去积累的数据和资源，依托人力和金融资本来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来推动和促进各方的互信，在此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的创造力，营造一个稳定、和平、包容和开放的发展环境，进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资源的获取是人们共同的问题，因为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的供给，无论身处世界的中心还是边缘，人们对资源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因此，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融资渠道和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希望“丝路国际联盟”能够找到办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提供可靠的融资渠道，以帮助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

身处世界边缘的人们可能会被全球化的市场机制所遗忘，而电子世界贸易平台这样的机制能够帮助那些在地理上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与全球最核心、最活跃的市场进行

对接，让他们能够拥有开展贸易、获取信息的平等机会。传统的世界贸易体系固然重要，但电子世界贸易平台将成为重要补充，能够让我们更多地关注那些被忽略的地区和群体，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各项资源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能够将这些落后和边缘地区以更平等的方式融入全球化的世界。

我确信我们能够通过“一带一路”把不同地区和国家联系起来，使我们能够更加尊重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能够更好地理解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差异对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有益之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能够激励我们对包容性和多样性作更多思考，我也愿意尽我所能来推动“丝路国际联盟”在未来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

丝绸之路国际联盟倡议书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大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然而，受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信仰等多重因素影响，还有待国际社会进一步认同和积极参与。

我们一致认为，当前全球发展已迈入关键的临界点，有必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联合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力量，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型国际网络。通过深化交流合作、沟通协调，促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以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基础，促进各方对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包容、互利和共营”核心内涵的认同，并形成共识，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各国经济增长，营造稳定的国际环境。

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前政要、专家学者，经济、金融机构和企业领袖，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先导和核心作用，共同倡议发起丝绸之路国际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希望通过联盟搭建国际共享平台，深化民间交流合作，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科技创新、文明对话等领域沟通协调，促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让世界参与“一带一路”，让“一带一路”推进国际社会和谐发展，共进共荣。为促进这一步目标实现，我们共同倡议如下：

壹、建立丝绸之路国际联盟，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前政要、专家学者，经济、金融机构和企业领袖共同参与，统筹运用国际智库资源，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型国际网络。通过推动沿线重点国家战略合作，形成国际公共外交和战略合作网络的主体框架，以发挥协同效应，形成协作合力；

贰、建立“一带一路”国家和区域常态化对话、人员交流互访与合作研究机制。以联盟为平台，建立研究成果交流、共同发表成果、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互访、



2017 年 6 月，SRIA 首届峰会举办城市杭州

合作研究等机制，通过委托、资助和聘请有关国家智库和学者开展研究，及时反映沿线国家的困难、问题、期待与利益诉求，提出共同解决对策方案等；

叁、以国际金融论坛（IFF）和联盟为平台，定期举办丝绸之路国际联盟峰会。分享各成员国发展理念及经验，就“一带一路”建设和相关国际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力争打造成为沿线国家政产学研各界对“一带一路”进行综合对话、交流、合作的权威平台；

肆、通过联盟，建立“一带一路”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合作的多边沟通渠道与促进机制。并根据合作需要，积极推动建立民营丝路金融机构，以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伍、联盟将以国际金融论坛（IFF）为依托，设立丝绸之路国际联盟全球理事会，建立会员机制，常设秘书处，负责协调和主持日常工作。

我们相信，丝绸之路国际联盟发起和创立，将是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进一步认同和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里程碑，将为促进世界全面可持续发展，增强全球经济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的国际化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贸易机遇，人民币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都属于国家战略，都涉及开放，是长远发展战略。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一带一路”也是一个长远的战略，构造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可能是更加长远的愿景。当然，我们应有具体的步骤和程序，一方面有理想，另外一方面用实践推动。

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之间的联系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首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确实需要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二，“一带一路”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它反过来又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实行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实践中已经碰到。特别从2016年底到2017年初，资本项目收紧实际上给很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带来了困扰——外汇打不出去，或者外汇进不来。很多项目已谈好，钱无法汇出，项目只得暂停。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资本项目收紧又有合理性。2015年以来，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这种普遍的贬值预期，确实对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带来较大压力。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是一个长远的战略。人民币国际化其实必须要具备一定条件，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自由的金融体系，即汇率要相对市场化，资本项目要相对开放。实现这一金融体系，离不开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稳定和监管制度的完善。2015年以来，资本市场以及外汇改革中出现很多问题，这其实反映出金融监管和金融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真正做到保持金融市场相对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地开放资本项目，或者贸然地走向汇率完全市场化，会遇到很多问题。

因此我认为，“一带一路”确实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但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为国际化而国际化，而应循序渐进地、根据中国的国内发展情况和监管体制的完善情况，慢慢地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总量、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除美元之外，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可能会寻找其他的货币作为一个结算工具。但人民币并非唯一选择，因为沿线的国家应也有较大经济体。例如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实际上也超过中国，从长远的角度看，它将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体，货币影响力不容小觑。

有人质疑为什么一定要用美元，或者一定要用某一种货币。为什么不能有超主权的货币，如SDR为基准的货币，或者是新出现的电子货币，如比特币，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因为超主权的货币，如SDR、电子货币、比特币等当前还很难让市场接受，需要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信用支撑。

此时，人民币就有较大的机会。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实体经济总量最大，货币经济总量也相应很大。实际上一个国际货币首先应该满足交易量大、流通性好、市场大、交易成本低这些条件，各个国家才会使用这种货币。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成为最主要国际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选择主权货币作为结算货币有它的必要性，而人民币国际化也抓住了这样机会。

有舆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似乎跟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冲突——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不能一起用一个货币？为什么用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虽然不是美元，但是为什么是人民币呢？这看起来似乎有矛盾。笔者认为，现在的主权货币包括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同时也是一种公共产品，有很多好处和一定正面的作用。但是，因为美元独大，美国决策者会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困扰。因此，在世界货币的体系里面，有竞争货币其实是一件好事。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当全球有两到三个大的国际货币时，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更好。因此，把人民币看作公共产品，跟“一带一路”和共同命运是吻合的。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绝好机遇。■

凝聚环保共识 共建绿色丝路

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方莉希望能够通过建立“丝路联盟”来加强环境领域的合作，进而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不仅有产业的相互连通、资金的融通、贸易的畅通以及政策的沟通协调，民心相通同样至关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位置不同，经济条件和发展阶段各异，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距，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也不尽相同。那么，如何在如此多的差异中找到丝路沿线国家共同的价值观和共性呢？

我认为，环境保护正是能够凝聚丝路国家共识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联合国 2015 年大会上，193 个国家共同达成了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消除贫困、环境保护和共同繁荣等。在今年 5 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出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加强生态环保合作，以“一带一路”为载体共建生态文明，为相关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援助，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共同实现 2030 发展目标。

就中国而言，环保部、外交部、发改委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应当说，绿色环保不仅是能够帮助大家“走出去”，并且还是能“走进去”、“走下去”的重要保障。谈及生态文明理念，其实中国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过去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忽视对环境的影响，后来发现经济发展的代价十分巨大。如今，环保意识已得到明显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开始引导产业聚集到产业园中协同处理，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还实现了环境综合治理，这些经验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中加以借鉴和运用。回溯历史不难发现，环境污染是随着投资转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生地理位置上的变化的，这说明全球治理机制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改善全球环境治理结构，以更低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来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这是“一带一路”所承载着的绿色希望。

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成立于 1989 年，一直与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开展贷款相关合作，从中学习和汲取了许多经验。目前，中心是亚洲地区唯一的绿色气候基金实施机构，在做项目投资时通过国际合作能够降低项目成本。同时，中心也是全球环境基金在中国的唯一执行机构，很多企业在“走出去”时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政策缺乏了解，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进行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帮助他们规避风险以更好地“走出去”。此外，中心也在推广绿色金融的示范试点，我们和证监会、银监会，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开发绿色平台指南。



方莉

在产业园区方面，对外合作中心和联合国工发组织正在推动绿色产业园建设，帮助入园企业降低环境管理的成本，同时也能减少环境污染的风险。在政策研究方面，对外合作中心正在尝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希望以此帮助大家能够降低“走出去”的成本。在绿色投资领域，我们倡导建立基础设施环境建设的环境标准，希望产业界能够参与制定。在贸易和生产方面，可以通过追溯标识来确保消费者对产品的知悉权，在循环经济领域中国也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在金融方面，2014 年中国的绿债为零，但现在绿债发行量已占全球份额的 40% 以上。

我们希望通过与各方合作在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环保来推动“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像联合国环境署、开发计划署、工发组织等对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有兴趣的国际机构都可以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背书，我们应当把这些资源共同利用好。我们希望通过与各方合作在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共筑一条承载着人类梦想的绿色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机遇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屠光绍认为“一带一路”给全球及国内地方建设都带来崭新的机遇。



浙江省会杭州

“丝路国际联盟”在浙江成立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从天时来讲，去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习近平主席在论坛上的开幕演讲鼓舞人心。应当看到，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丝路国际联盟”的推动者、倡议者国际金融论坛（IFF）本身的宗旨就与“一带一路”的理念一致，即通过非官方高层对话与合作来维护和改善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金融和平、包容、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合作提供更大的平台。从地利来看，浙江对外开放历史悠久，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成功举办，更提升了浙江在全球的影响力。在此，同样期待“丝路国际联盟”的成立能够为促进浙江与其他省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渠道。

“一带一路”战略所创造的重大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带来了重大机遇。这个机遇是面向全球的，为新型全球化注入了活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

共商、共建、共享精神，为新型全球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众所周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实质上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到底怎么办。全世界都陷入了全球化的困境，遭遇着全球化的逆风，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抉择。在此情况下，难免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比如全球化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若干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干脆往后退。在这样一个迷失方向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摆脱全球化的困境和更好地推动新型全球化指明了方向，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带一路”提出的“五通”为新的国际合作发展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激发巨大的市场需求。当前，全球面临增长失衡，同时又有着巨大的需求尤其是投资方面的需求，这种矛盾在基础设施领域尤为突出。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再平衡带来了重大机遇，注入了无限活力。

“一带一路”为中国面向全球打开了新局面。当前，中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面临新任务。在此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面向全球打开了新局面，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新格局。中国的发展与全球的发展是良性互动的，中国的发展历来对世界全球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全球的发展也一定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正为中国与全球发展的良性互动开创了新的格局。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进程。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巨大进展，对外开放的两个重要领域，一是贸易，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双升级。二是跨境产业资本流动，从引进外资到对外投资，成为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引擎。2016年，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吸引外资的国家，同时也是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这样的成绩与“一带一路”建设密不可分。

最后，“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全球化本身，也包括全球治理的改善，即全球化治理能力和水平与全球化发展程度的匹配存在问题。“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概念和精神大大提升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代表发展中国家改变过去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使全球化进程更加均衡、更为合理。

“一带一路”建设为地方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也为地方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对各地的经济发展极为重要，对外开放是推动各地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而对外开放也促进了国内改革。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拓展各省的发展空间。浙江作为东部地区省份，占有开放先机，中西部则具有后发优势，而后发优势的发挥同样也得靠开放。如今，各地都面临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及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建设也为地方转型升级、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是各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吸引外资就须创造具有国际化竞争优势的营商环境，才能为确保对外开放的可持续与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为各地创造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供重要契机。

以浙江为例，浙江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浙江有着极强的战略机遇意识和开放的行动能力，两者相互配合能够有效地释放“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效益。

第二，浙江具有领先的开放经济体系，能够对其参与“一

带一路”的贸易与投资形成有力支撑，并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市场中的资源配置和竞争能力。

第三，浙江的地理区位优势及其互联网产业优势相互促进，形成了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双支撑。

第四，绵延传承的浙商文化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精神相互交汇，将为中国文化与世界不同文明的融合提供生动的诠释。

中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做到“六个好”

第一，发现或者发掘好的投资项目。中投的投资不是政策性投资，其定位是做商业化、市场化的投资，因此发现好的投资项目至关重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出现了很多投资机会，但并不是所有的项目中投都会参与，中投必然依据自身定位，去寻找适合于自己的市场化、商业化的项目。

第二，发挥好中投优势。无论企业也好，投资机构也好，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只有把自身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取得好的投资机会和收益。

第三，利用好中国因素。中投海外投资的一大使命是支持重点产业和企业走出去。中投投资的项目能够跟中国的市场和产业升级做好对接，就需要利用好中国因素。虽然中投海外投资在不断地增加，但却越来越需要跟中国元素进行对接，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最大的市场，而且中国的产业比较齐全，如果中投通过海外投资能够带动更多的外资到中国来，这就是把中国的因素利用好，对于中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

第四，寻找好的合作伙伴。中投在境外有广泛的合作网络与合作伙伴，在国内也和不同领域和产业的投资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希望这种合作能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第五，参与好投后管理。中投不是做战略投资，而是共同投资，因此非常注重企业是否建立起良好的治理结构，在这方面中投愿意做出积极贡献，为投资的项目和企业带来价值上的提升。

第六，实现好投资目的。实现好投资目的不能仅看中投自己的投资收益有多高，也要看能否为投资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积极的效益。只有既实现了投资收益，又促进了投资目的地的发展，才能形成可持续的良性互动。■

“一带一路”与民间资本参与

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郭丰认为，中国需要出台更多奖励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



郭丰

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重要契机。产业走出去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金融资本需要对接产业资本，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

虽然，国家为此建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然而，“一带一路”的建设资金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创新发展途径，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原因如下：第一，中国虽然是倡议发起国，但仅仅靠一国的财政力量是很难推动有效运行的。第二，若把这个战略看作完全政府行为，会给倡议推进带来更多的阻力。第三，相比盈利性的项目，“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资回收期比较长，风险较大，而政府投资往往对盈利性的敏感度较低，这个时候需要民间资本的参与才能更好

地保证项目的盈利能力。政府更应该扮演连接各方力量的牵头者。对于民间资本而言，融入开发性金融，助力“一带一路”的建设，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占中国 GDP 的 60%，创造了 80% 的就业，而在浙江省，民营企业创造了 90% 的就业，实现了 80% 的出口、70% 的 GDP、60% 的税收。我国民营资本迅速发展，成为全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商务、贸易、物流、房地产。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民营企业只占到 2.1% 的境外直接投资（ODI），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不匹配的。在未来，基于政策支持和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的主要模式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国的国有资本，比如丝路基金和同性质的政府引导基金可以充当国内社会资本走出去的引导角色，与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运营管理能力较强的优秀民营企业签定协议，参与项目融资的组建。由于民间资本相对于国有央企是非常弱小的，很多企业在国内发展

我国民营资本迅速发展，成为全社会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商务、贸易、物流、房地产。

尚未成熟，如果贸然地走出去势必带来更大的风险。所以，应该首先由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运营管理能力较强的优秀民营企业先走出去。在此方面，浙江省有独特的优势，全国最大的 500 强民营企业里面，浙江省占到 150 家。

在具体操作层面，政府资金要和民营资本紧密合作。政府基金在发现优秀项目后可以在国内招募民间合伙人，引进



雅加达的“一带一路”品牌铁路工程正在建设中。该工程联通欧亚，服务中国主导的经济区，民间资本发挥了关键作用。

优秀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作为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补充机制，有利于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过程中解决融资问题。而民间资本如果发现海外项目，也可以向政府有关基金和组织发出邀请，设立项目公司，参与境外项目投资建设，并根据协议进行利益分配。针对“一带一路”的某些重点国家的产业和项目，可考虑组建一个或多个联盟，由相关的官方部门、民营企业、银行、股权基金和商会等组成，抱团出海。这些联盟可以共同参与战略网络和投资平台，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针对某个国家产业和项目的海外专项投资基金和投资机构进行组合。

另一方面，我认为“一带一路”要尽量地减少由中国主导这个形象，成为一个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利用香港地区的资源和经验，促成跨界、跨境的联盟，推动中国内地企业进一步走出去。这除了可以利用香港形象来淡化国家色彩以外，还有助于解决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对国际市场规则、跨国语言和文化差异了解不够带来的问题。

促进民间资本参与的政策建议

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需要持续给民间创造有吸引力的商机。通过改革服务和改善环境，比如可以发展股权和投资基金，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可以通过认购份额进行支持，开展股权和债券融资。我国也可以结合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积极促进以民间资本为主要参与者的人民币国际投融资资金以及政府引导资金，例如丝路国际联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政府须给予足够的补贴，将项目的回报率提升到有吸引力的水平，否则民间参与意愿比较低。民间资本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尤其对经验不足的中小企业而言。因此，政府需要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金融安全保障体制，抵御要素波动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类金融风险，维护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更加有效地推进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扫一扫微信 与对话嘉宾互动



关注IFF微信

- 搜索“IFFweixin”
- 扫一扫上方二维码
- 即有机会与嘉宾直接对话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IFF领袖对话会

世界大湾区建设： 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



南海跃起一条龙： 粤港澳大湾区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时联、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张嘉明认为，依托国际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东亚新的城市群和经济增长点。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经贸投资规则和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亟需培养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

国际经验证明，湾区经济一直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也是全球科技、创新、金融和产业集聚中心。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及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上第四个大湾区，它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国内外专家预计，到2030年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将超过现有的三大湾区，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湾区。

为此，国际金融论坛（IFF）以其成熟的运作框架为基础，以国际论坛为平台，2017年11月在广州举办大湾区建设论坛，暨IFF第14届全球年会。会议围绕“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的主题，探讨构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平台，以推动中国及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第26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第26届联大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国际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参与了此次研讨。广东省及广州市两级政府主要领导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落实“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和“一带一路”倡议

2015年3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中，“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明确提出。2016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习近平主席出席签署仪式。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在于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这对于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及“一国两制”国策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它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际金融论坛副主席辜胜阻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定位是构建世界级创新经济的湾区城市群。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发达的城市群，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核心城市，能够带动区域的分工合作和区域发展。”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完备的高端产业群，有健全的现代产业集群和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有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有利于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粤港澳大湾区有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网。在这个湾区里，高校世界500强的数量也比较大，并拥有一大批国际化创新人才。粤港澳大湾区是优质资源和要素栖息地，有开放多元的包容环境和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网，有高效的物流体系和便捷的生活环境。



广州珠江

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化港澳与内地融合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为抓手，以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得到全面落实。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强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的需要。与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对此表示高度认同。

“粤港澳大湾区有容海抱湾的区位优势，它还背靠国内广阔的经济腹地，是构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引擎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心脏。”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他的发言中，详细阐述了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意志，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他呼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紧紧纳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当中来。”

粤港澳大湾区： 到 2030 年前后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约 7000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5% 左右。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到 2030 年前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会增长 1800 万，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湾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数据显示，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产值约 9.31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 1.4 万亿。“未来 10 至 15 年，粤港澳将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邢自强还认为。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马建堂常务副院长也对这一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如下三大独特优势。首先，该湾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产业链条完整、科技创新要素丰富、人



从左至右：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中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国际金融论坛 (IFF) 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广东省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

才汇聚，对外开放程度高、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水平高。其次，在这一湾区内拥有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两大一线城市、三个自贸区，对内对外竞争优势明显。第三，这一大湾区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它包括的三个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其多元差异是世界上其他湾区都不具备的。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大湾区的规划及发展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新趋势：第一，更多的消费由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拉动；第二是投资的转型：越来越多的投资倾向于创新型和知识型投资；第三是投资的反弹开辟了我国出口的新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赶超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潜力。美国史带金融财团全球合伙人、史带战略控股集团总裁钮小鹏介绍了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大湾区的成功经验和挑战。他指出，服务业占比较高，优秀人才引进，法律以执法完备，明确的差异化等，是这两个湾区独具特色之处，值得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学习。但是，钮小鹏同时提醒：“高税率、政策、政治不稳定，高成本、重监管，以及不清晰的激励机制，是造成这两个湾区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将一些竞争优势拱手让给美国中西部和南方内陆地区的主要原因。”同样，在介绍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时，中国前驻乌克兰大使姚培生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不应该照搬旧金山、纽约、东京湾的发展模式，不应该成为吃喝玩乐消费者的天堂，而应该成

为凝聚创新者的都城。姚培生建议：“粤港澳发展要有超前的理念，至少应该超前 30 年到 50 年的理念来制定发展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应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形成良性互动。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利明从发展贸易口岸角度出发，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支点。他介绍说，在近代历史中，广州十三行是世界第三大对外通商口岸，广州也一直是全球繁华的世界级城市。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的崛起，改革开放后深圳的发展，以及广州港的快速建设，都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以特殊的历史文化及区位优势，承载着对外开放的使命。在国际贸易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能力卓越而突出，以这种内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的站位和支点，将其打造成服务于全球的中国通商口岸品牌是值得期待的。此外，余利明还特别强调，“香港、深圳、广州作为一个整体的枢纽港在全球和中国范围内地理跨度都不算大。同时，三个港口位于共享华南的腹地，在经济发展上都已经是完全的市场化运作，香港已经是全球运作非常成功的自由港。所以，把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超级枢纽港来看待，组合形成粤港澳大港区，既具有合理性又十分经济。”

粤港澳的大湾区将会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是 IFF 联合主席、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的观点。

他还认为，相信粤港澳大湾区将会引领中国进一步的创新发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也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并且其战略意义具有全球性，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级水平的大湾区，潜力不可限量。

“金融创新是大湾区建设的独特优势。在互联互通的机制下，大湾区比较容易形成金融创新的集成优势，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投融资和成长平台，帮助企业走出去，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持续迈进。”祝宪副行长说。

粤港澳大湾区将在三地优势互补中实现协调发展。梁锦松在解读大湾区发展的机会和方向时指出，“首先，大湾区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符合时代需要，符合地区客观发展形势。其次，世界已经从工业经济引领的时代转向知识经济或创新经济引领时代。为实现产业金融创新的有机联合，湾区或城市群的发展是必要的；其次，这也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的客观形势，及三地优势互补现实。”IFF 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王燕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九个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处在微笑曲线不同位置上，所以，这三个地区优势互补性强。另外，中国在全世界服务贸易排序的序列位置比较靠后，这对制造业造成一些阻碍，而港澳在服务业出口方面有巨大的比较优势，服务业贸易的发展方面，广州应加强与港澳地区的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挑战： 主要矛盾在于粤港澳间体制机制的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在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阻碍。”辜胜阻指出。他强调：“该湾区的一体化面临区域本位主义、同质竞争、体制障碍三个难题。粤港澳大湾区在与内地的合作中要解决运行机制、体制机制、文化环境三个落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制需要优势互补，分工协作；需要融合各个方面共同的需求；需要从优势互补转向优势整合、从各展所长到协同共进、从各有精彩到繁荣共造；需要产学研企的合作，打造湾区创新型人才。”祝宪也表示，大湾区的建设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比如，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大湾区需要体制机制的协调和创新。”

除了体制机制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和挑战，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夏乐认为，要将粤港澳建成一个大湾区，其实就意味着要对这三个不同地区长期存在的竞争的局面进行修理调整，这就存在着寻找平衡的问题。但是，夏乐提醒：“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来自于地区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所以在大湾区的

建设上，可能需要对以往的竞争局面进行修整，在保留一定竞争和开放的模式下，如何引入政府的干预指导，找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乐还认为，“大湾区还应该关注信息的流动。中国内地的科研、人才教育需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从外边吸收大量信息。但是，很遗憾，现在，无论是信息，还是人才的流动，依然是有阻碍的。”他提醒，“除此之外，还有两方面的挑战，它们分别来自于对于人才的吸引，以及贫困问题的缓解。一个城市想要留住人才，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如何降低房价、或者发展本地的租赁市场，是这个湾区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同时，能不能在湾区之内实现土地建设指标上的相互调剂，以及在湾区之外的地区，通过市场化的购买进行补贴，更好地留住湾区内的人才，值得政策性关注。与此同时，目前香港有大约近一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不能对收入分配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解决湾区的贫富差距问题，那么湾区的发展即使很快，却不能称之为成功。”以上问题也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同。梁锦松指出：“目前大湾区的建设实际上是分隔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市场、资金、人才方面的流动都没有完全打通。所以，要想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湾区经济体，必须要打破分隔，必须要一体化，当然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献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以创新驱动为主要抓手

1. 广东牵头、依托港澳，三地联动优势互补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应客观认识到三地发展的差异，这在本次与会专家当中达成广泛共识。在此基础上，粤港澳三地可以分别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带动，联动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巡视员陈炳才表示，大湾区的建设应该以广东为领头羊协同港澳，共同发展：“在过去的 15 年里，广东的经济总量增长了 8 至 9 倍，如果在大湾区的发展过程中，以广东为领头羊，其他地区协同发展，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大湾区的城市群，无论大中小城市都应该有适当的专业和分工，而不是把一些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主要中心城市。”陈炳才的观点很明确。

来自香港的专家学者则认为，香港因其在人才、金融等方面的影响力，可以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依托。梁锦松从香港的角度出发，指出香港对建设大湾区最重要的两个贡献，第一是培养和吸引全球的人才。首先，香港在制度上是很多国外人才喜欢的；其次，香港的生活方式是国际化、多元化

的，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都十分便利。因此，香港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国际人才聚集的中心。香港的第二个贡献就是金融，香港是功能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梁锦松认为，作为人才中心和金融中心，香港应该跟周边的地区，特别是深圳、广州等合作，发展生物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他强调，在三地的合作方面，为更好地推进大湾区的建设应关注如下三点：一是实现香港与内地不同的经济要素的突破性流通；二是实现粤港澳包括生物科技、大数据等各行业专家更好的合作；三是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建立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

大湾区还应该关注信息的流动。中国内地的科研、人才教育需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从外边吸收大量信息。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胡伟星指出，香港在大湾区的建设中能够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他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香港在大湾区的优势主要有三：一是金融业的特殊优势；二是专业服务业在各行各业都有竞争优势；三是国际交流、合作和联系方面有一些天然的纽带，与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系。除了“超级联系人”之外，香港还应该积极地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基于此，胡伟星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两个特别行政区、九个城市和广东省的业务部门切实进行政策沟通，达成政策上、项目上的落地；第二，人心相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为此，他还建议全面推进内地和港澳互利合作，完善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爱国精神，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幸福和荣光。

2. 强化顶层设计，创新合作方式，加快大湾区三地一体化协调共进

对此，于洪君的看法是，必须在完善的顶层设计下实现协调发展。他建议在政策举措方面，“首先，要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行动纲要；其次，企业文化事业单位、科研教学机构、大众传媒广泛深入加强交流、协作和对话；再次，粤港澳三个地方要建立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能够在建立完善三地适用的体制机制和各种标准方面加大探索、加大力度。”祝宪表示，城市群的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条件就是如何融合和分工。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一是要促进港澳和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融合，二是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顶层设计，促进合理分工协作，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还可以作为创新合作方式的试验田，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原巡视员陈宣庆就此发表了他的思考。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快创新的步伐：一是创新合作平台，以联动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原则，统筹大湾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产业平台建设，打造参与国际竞争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大产业合作平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体系建设。二是创新合作机制，完善跨界基础设施协调机制和跨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制，完善跨境口岸管理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合作，构建维护区域金融安全新机制，建立社会治理激励机制，完善流动人口监视和预警机制，建立低碳发展合作机制，三地共建大湾区低碳发展示范工程，加快形成大湾区绿色经济体系。三是创新

合作项目，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三网一中心”，积极建设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以深圳广州港为集装箱枢纽港，其他港口的枢纽航运中心，治理产业合作重大计划和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支持粤港澳共建金融圈。四是创新合作政策，促进要素流动，建立统一市场，设立高层次协调机制，完善协商对话机制，加强规划衔接，在中央政府的指导协调下，形成合力，加快迈入世界一流湾区和一流城市群行列。

与会专家认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始终遵循协调发展的理念。而协调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一体化建设。针对一体化建设，李佐军进一步阐述了如下十个方面的“一体化”：思想认识的一体化，体制机制的一体化，规则和政策的一体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市体系建设一体化，市场发展的一体化，环保标准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品牌服务的一体化。

3. 构建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环境友好四位一体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始终秉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带动地区发展。鸠山由纪夫指出，在创新创业方面大学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中国拥有各种各样的大学，粤港澳地区也有很多大学，广州拥有100多万在籍学生，这将对今后经济发展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在对比研究粤港科技创新水平的基础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指出，以研发投入强度的指标来衡量湾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发现，去年广东的研发投入的强度已经达到了2.56，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广东已经开始步入创新驱动阶段。

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研发强度比较低，只有 0.73，但香港拥有四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直接投融资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陈炳才巡视员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中心区和示范区。陈炳才指出，要成为示范区，“需要重点关注环境生态技术、社会治理、技术和产品方面的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基础教育和科研投入。”

金融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发挥金融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李东荣就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提出了三方面的观点和建议：第一，建立一个具有未来竞争力的国际湾区，应该配套建立一个高效运转有效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金融配置资源的枢纽功能发挥各种金融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可以为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高效适配的金融服务支撑。第二，要发挥金融服务体系在湾区建设中的作用，在建设过程中要重点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现状，加强金融合作，立足比较优势和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围绕空间和产业布局，优化金融布局，从而把握好金融服务的力度，实现湾区现代金融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第三，应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新时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互联网金融是数字化时代下各国各地区金融竞争和金融资源布局的新兴领域，而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地理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既要聚财，也要聚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庄恩岳建议，搞好世界大湾区建设要多引进现代金融人才，他强调，“特别是盘活资产的各种金融人才、能够变废为宝的人才，尤其是拥有哲学思维和技术思维的各种人才。”新加坡 Meinhardt 集团 CEO 提出，大湾区的良好结构，能够有效节约人力成本，提高湾区竞争力。对于人才的引进，也应该实现更多的开放，欢迎外国人，吸引全球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能再走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老路，“大湾区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从棕色增长转变为绿色增长。”韩升洙如是说。他进一步指出，韩国 2010 年建立了一个全球绿色增长机构，并演变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金融论坛也可以建立一个绿色增长中心，作为一个在中国领先的气候变化研究机构，可以涉及绿色金融、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依靠国际金融论坛的资源，绿色增长中心可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关于绿色增长的重量级研究机构。对此，研究绿色金融的专家、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杰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该重视绿色金融，建议可以先试点绿色资本自由

流动，或建立一个绿色资本市场，吸引境外的企业、“一带一路”的企业，或者政府来这里发行绿色债券，也可以吸引境外的资本投向湾区内的绿色建筑、绿色领域，“也许可以把湾区绿色资本市场打造成为在亚太区甚至全球极具吸引力的资本市场”，叶杰斐巡视员对此充满信心。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主任张建宇提出将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作为大湾区绿色增长中心的重要内容。绿色供应链就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将环境保护的要求深入到供应链管理中心，包括增效，节约、节能、节水、节电等要求，也包括像低碳、环保等整体要求。他介绍说：“中国是首先提倡在亚太地区建立绿色供应链网络。”促进整个地区产业链互联互通等绿色化目标国家，而现在全国绿色供应链做得最好的就是在当前的大湾区，也就是东莞的绿色供应链。在东莞市政府的带领下，推出的“东莞指数”不仅作为东莞制造业行业的评价依据，也成为了企业节能增效的具体措施。大湾区作为全球绿色供应链的中心，要做一个全球绿色组织发展的基地，也要形成绿色创新的温床和土壤。”

4. 把大湾区建设成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区域载体

陈炳才指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不附加任何政策条件和开放市场的条件，相关的贸易协定是平等的贸易协定。中国还会提供充分的技术、资金和设备，而且是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

作为持续深耕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专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围绕建设大湾区，促进“一带一路”稳健发展这个议题，提出如下三点看法。他认为，第一，“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共建“一带一路”，最关键的是加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基础设施连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个方面的联系。第二，在如何落实上述提到的五个方面的联系上，要有效利用大湾区这个载体。在全球其他几个港口城市，都有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好几个地方都具备了建设大湾区的条件。具体到粤港澳这个地区来看，跟其他地方相比，更占有区位优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走出了真正比较开放的一步，大湾区建设联系了“一带一路”，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三，在“一带一路”与建设大湾区这两件大事互相依托、互相支撑时，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一是联动的开放。这种开放是各方面的开放，包括开放金融体制、汇率管理方式，服务业及农业等；二是联动的协调及内外部部的协调；三是吸收顶尖人才，不仅吸引中国内地的人才，还要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这需要中国政府在吸引人才政策方面进一步优化。■

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副行长祝宪认为，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顶层设计，让广东、香港、澳门三大主力发挥各自的优势。

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但是，我们不能低估建设大湾区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粤港澳三地大融合

粤港澳建设大湾区的概念是基于建设条件已基本成熟而提出的。近三十年来，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从低收入向高收入地区迅速发展期间，赢得了现代世界工厂的美誉，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持续缩小，粤港澳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日益密切。回首这一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中，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始终离不开港澳的支持，尤其是香港在投融资方面为其提供的帮助。因此，如今所能达成的条件的成熟，与过去三十多年来粤港澳地区的经济整合是密切相关的。在未来，进一步实现融合是大势所趋，向世界级大湾区、世界级超大城市群迈进的潜力不可限量。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在硬件上具备着其他成功湾区的一些共同特点：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拥有配套的商品、金融和服务交易中心及投融资平台；作为制造业中心，有着充裕的人力资本，聚集着大量的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

各司其职，创建不同的“区域中心”

在大湾区建设过程充分考虑融合与分工也至关重要。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一方面要促进港澳与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融合，另一方面也应当形成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以促进分工协作，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

从融合角度来看，要考虑产业的梯度转移，要构建以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辅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进而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最终将大湾区打造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此外，还要考虑大湾区内部的城市资源共享与融合。



祝宪

从分工角度来看，目前广州、深圳、香港三地的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大湾区建设中如何战略性地看待三地之间的定位和分工相当关键。从实际出发，分工重点可放在航运港口交通、金融和科技创新这三个方面。在航运方面，香港是重要的国际中转港，需要广州和深圳合理地区分港口功能，实行差异化竞争。在金融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中国内地的南方金融中心，因此广州要差异化地发展特色金融，建设成为区域性的金融服务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具有比较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成熟的资本市场，深圳正在打造“中国硅谷”，广州计划建成国际创新枢纽，这当中也需要差异化的顶层设计，使科学分工基础上的有序竞争能够得以实现。与此同时，珠江三角地区的其他九个城市也要明确各自的战略定位，取长补短，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无序竞争，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增强整体竞争力。

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大湾区建设的独特优势。在大湾区建设中，深圳堪称创新高地，不断地催生新生态，进而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广东的城市具备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扎实的



香港 - 珠海 - 澳门大桥

制造业基础，而香港资本市场成熟、金融服务优势明显，因此在互联互通机制下，大湾区比较容易形成金融创新的集成优势，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更广泛的投融资平台，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当前，香港已成为全球离岸人民币的业务枢纽，其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也日益增多。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资本将拥有更多向外扩容的路径，香港能够借此更好地满足区内离岸人民币结算、融资和资金管理需要。未来应当进一步培育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扩大内地和港澳金融市场要素的双向开放和联通，打造引领泛珠三角、辐射东南亚、服务“一带一路”的金融枢纽。

共同的责任

大湾区建设虽然具有良好的潜在发展动力，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

一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大湾区建设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港澳和广东在制度、文化和企业运作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和凝聚共识来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强政策和相关规划的协调对接，将两种制度与体制的互补性所能创造的收益最大化，将其差异性所带来的成本最小化，或许是湾区融合面临的关键挑战。

二是大湾区的要素流动应当迈上新台阶。湾区整合必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取向的优化配置。例如，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通关制度能否改革，以使人流和物流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

三是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在各自的优势领域里发挥引领作用。大湾区内不同地区和不同实体应当清晰地认识自身的比较优势，突破地区和部门惯性思维的束缚，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通过加强沟通与协作，发挥互补和协同效应，力争实现合作共赢。

四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可预期性。大湾区相关的各级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改变传统的优惠政策和“一事一议”的旧有模式，与大湾区建设相关的政策应当具有前瞻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防止“朝令夕改”频繁发生，从而实现以市场化为主的资源配置，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

总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是一项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然而，仅仅具备这样的潜力和可能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好实践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才能有序推进。■

驾驭科技的浪潮， 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认为，转型后的中国经济将借助自由市场宏观调控双重优势，为快速转型和创新发展创造沃土。



马建堂

当前，全球贸易正逐渐回暖，经济整体复苏向好，困扰全球经济十年之久的通缩和需求弱化的格局有望逆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当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上行周期，2017和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3.7%和3.9%，均高于2016年的3.2%。世界经济为何有望走出深陷十年的困境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生命科技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市场化与产业化，创造出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及新服务。这类新经济在加速扩张的同时带动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动力。当前，中国正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处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供给侧结构的改革正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的面貌，也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

创新驱动战略培育壮大了新动能，支撑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质量提升。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风起云涌，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和全方位的市场化、产业化，带动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转型和升级。据国际权威

媒体报道，当前我国科技独角兽企业已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在科技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层出不穷，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对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就业稳定、质效提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支撑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供求格局，促进了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有效落实，特别是去产能、企业兼并重组等重大举措的实施，明显地改变了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供大于求的格局。供求格局一定程度上的修复不仅直接改善了供给侧的质量，而且改进了工业产品，尤其是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回升，使得企业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出现明显增长。与此同时，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优化了中国的营商环境，为新经济主体诞生创造了便利条件，今年前三个季度，新登记企业日均达1.6万多户，进一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以科技革命市场化和产业化为主要动因的经济增长周期，与我国经济优化发展期交汇重叠，为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增长新动力的培育、经济增长新格局的塑造带来了历史机遇。

率先发展的大湾区一直是全球经济版图中的璀璨明星，并展现出了自身的独特优势。纽约湾区依靠的是金融业大繁荣，旧金山湾区受益于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东京湾区则由金融业和航运业双轮驱动。上述三大湾区发展的共同特征和路径就是打破资源流动限制，形成基础设施一体化、区域分工协同化、要素流动自由化以及营商环境包容化的发展格局，均经历了由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创新经济的阶段性转变，经济活动范围不断拓展，最终实现了多级增长。粤港澳大湾区基础雄厚、潜力巨大，GDP总量与纽约湾区相当，为旧金山湾区的两倍，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东京湾区的三倍以上，世界三大港口机场旅客吞吐量高居各湾区之首，人才、体制、区位、政策、产业的综



旧金山大湾区

合优势日益凸显，历史正在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假以时日，大湾区定当凭借更开放的经济结构、更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更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更发达的国际网络，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强力引擎。这不仅能够带动中南、西南等泛珠地区的发展，而且会成为“一带一路”的金融、信息、科技和商贸枢纽，为中国走向国际分工的高端、推动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的积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带来了新机遇，新时代也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挖掘好、整合好、利用好三大独特优势。

区位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向北连通中国的中部城市群，向南联系东南亚地区，向东紧贴海峡西岸经济带，向西连接北部湾经济区，大湾区交通发达、产业链条完整、科技创新要素丰富、人才汇聚，并且对外开放程度高、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突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大湾区要积极推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加强基础设施的规划协调、促进合理的错位发展；要加强人才交流、资讯沟通，进而形成优势互补；要推进内外区域合作，全面提升辐射带动作用。

优势整合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两大一线城市和三个自贸区，对内对外竞争优势明显，在新时代要发挥新优势、敢于新作为、实现新跨越。要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来共建健康湾区、打造大湾区优质生活圈；要积极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形成有利于既有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新产业成长的生态环境；要推动金融有序发展，扩大港澳与内地双向流通，打造引领泛珠、服务“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的金融枢纽。

体制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三个布局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其多元差异是世上任何其他湾区都不具备的。如果工作做得好，这种差异性将会为湾区的发展带来文化多元性、互补性，会为湾区发展带来复合优势。广州、深圳、香港互补性特大城市群将为大湾区带来更多的经济辐射、资源共享和人才集聚，使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为大中华的经济跃升再添新动力。加快建设更富庶、更文明、更美丽的粤港澳大湾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南粤儿女和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使命，让我们共同期盼之、拥抱之、奋斗之。■

大湾区的发展 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美国史带金融财团全球合伙人钮小鹏认为，中国可以从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大湾区经济的发展中学习经验。大湾区的发展将有利于中美两国。

美国的湾区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在人才引进、创业激励以及配套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都值得深入学习和探讨。中美经贸合作能够为双方的湾区建设作出有益贡献，湾区建设合作也能够促进中美之间的经贸交流。

美国东岸的纽约湾区和西岸的旧金山湾区既具有同质性，也具有差异性。从同质性优势来看，其服务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同机构的数据显示均达到 80%-85% 以上。这两个地区本身都具有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大湾区建设对其服务业的提升更进一步支持了其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东西海岸两大湾区的差异性也相当显著。旧金山侧重于科技、农业和红酒产业；而纽约则侧重于媒体、国际贸易和生物科技。明确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使两大湾区各具特色。

美国湾区发展带来的经验和启示

美国在湾区建设方面有着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 营商环境并不是十分理想，美国权威机构的评估结果显示，纽约和加利福尼亚长期以来是全美营商环境排名靠后、税率较高的两个州。
- 美国票决民主体制下的两党博弈造成营商环境不稳定，政策缺乏连续性。
- 整体的生活成本较高。
- 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不断趋强，已经抑制了当地创新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势头。
- 与中西部和南方的州相比，东西两大湾区在激励机制推陈出新方面更为欠缺。上述不足导致这两大湾区在过去的四五年里将竞争优势拱手让于中西部和南方的内陆地区。

对此，有必要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中对以上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湾区建设中必须体现差异化优势，在引进不同类型的企业入驻和吸引投资方面究竟能够提供怎样的差异化政策和激励机制是相当重要的。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其东西两大湾区的建设既体现出了诸



纽约湾区的自由女神像

多优势，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中美两国体制和国情不同，对于如何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支点促进中美双方的经济互动和交流，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争取宏观政策的倾斜。十九大之后，我国金融领域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会陆续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应当努力争取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倾斜，成为先行先试的重要平台，以此吸引更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关注和投入。

其次，中国的各个省市在吸引外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明确能够感觉到，无论是各省市还是各类园区，其在“引进来”方面的投入要远远高于对“走出去”的重视程度。从美国湾区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走出去”能够更好地实现“引进来”，粤港澳大湾区在对外战略制定方面应当遵循双向并举的原则。

再次，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考虑将自身作为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利益汇集点。特朗普政府退出了 TPP，丧失了亚太地区的主动权。同时，美国战略界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持怀疑态度。然而事实上，许多美国企



钮小鹏

业都希望能够借助某种途径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鉴于此，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有效利用市场和资本手段，让美国的资金和企业投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这对于促进两国的商业利益融合具有积极意义。■



建设大湾区现代化经济体系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解读大湾区发展趋势，鼓励私人资本进入。



张燕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当顺应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要求。中国下一步将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由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而构成的产业体系。这一产业体系和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过去我们强调高速增长，未来则更注重高质量发展。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建立起由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四位一体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进该地区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通过质量、效率和动力的变革，来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要发展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湾区建设必须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政府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是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新材料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在大湾区建设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首先要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以研发投入强度为衡量指标，即一年内全社会研究与实验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以此来评估大湾区科创水平所处的阶段。

2016 年，广东研发投入的强度已经达到 2.56%，超过 OECD 的平均水平 2.4。从研发创新投入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了通过创新驱动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和条件。

然而，这个指标仅意味着流量达标，要达到研发创新投入存量的积累，广东地区或许还需要 10 年乃至 20 年时间的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研发强度相对较低，仅为 0.73。香港特区政府已明确提出要在 2022 年使香港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5，届时粤港澳大湾区投入到研发创新的资金总额每年将超过 2200 亿元。

当前，深圳的研发投入强度是 4.1，尽管香港研发创新的强度较低，但香港具备广东所欠缺的一些优势条件。一是拥有四所世界一流大学，而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都没有能够进入世界一百强的大学。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直接融资体系，建立现代化的直接融资体系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而言至关重要。广州和深圳的直接融资体系存在短板，而香港在为科技创新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现代直接融资工具这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三是国际化程度高，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完备的法治条件，能够与广东形成互补性的联合机制。

从全国范围来看，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相互竞争的还有其他几个区域。比如，2016 年长三角地区投入在创新领域的经费达到 4200 亿，超出粤港澳大湾区约一倍。其中，上海的研发强度达到 3.82，浙江的研发强度达到 2.43，江苏的研发强度达到 2.66，上海和江苏均高于广东。再比如京津冀地区，2016 年创新投入达 2440 亿，略高于粤港澳大湾区。其中，北京 2016 和 2015 年的研发强度分别为 5.96 和 6.01，其研发强度冠绝全国，聚集着中国最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最好的企业创新平台及最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更进一步强化了京津冀地区的创新优势和潜能。未来的关键就在于谁能够率先建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率先



北京，京津冀经济带。

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必将形成激烈的竞争态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将对标全球金融网络中心纽约湾区、全球创新网络中心旧金山湾区以及全球现代制造网络中心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三个都市圈，一是广州、佛山、肇庆都市圈，其任务对接港澳，明确下一步自身在大湾区内的定位；二是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圈，其任务是通过与港澳优势互补，形成自身差异化定位；三是珠海、中山、江门都市圈，其任务是通过与港澳加强合作，以发挥自身优势。上述几大都市圈的差异化定位决定着究竟如何在大湾区打造形成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网络中心、创新网络中心和现代服务网络中心。鉴于此，应当在大湾区建设中尽快明确几大都市圈未来的发展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须依托高标准的投资、营商和市场环境。过去 30 多年，广东在与港澳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社会这只和谐的手、开放这个压力的手捏合成为体系化的合作机制，以此推动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从过去 30 多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制造业领域的民营企业比重达到 61.2%，外商投资比重达到 11%，国企比重达到 27.8%。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制造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结构。然而并非所有行业都如此，比如金融行业，其国企成分所占比重为 90.7%；再如医疗健康产业，其国企成分达到 89.9%。实际上，在文化、教育、科研、零售批发等领域，国有企业的比重均在 60% 以上。因此，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言，在不同领域打造民企、国企和外资比重合理分配的体系，形成充分开放的市场、投资和营商环境，皆为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香港将成为 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前沿

香港前财政司长、南丰集团 CEO 梁锦松，认为香港对大湾区意义重大，需同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十九大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清晰的方向，而中央也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重点的建设目标，这是符合国际发展潮流、时代需要以及地区的客观发展形势的。

首先，建设大湾区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很多年前，我在巴黎参加 OECD 论坛时就已明确提出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是国家或者城市之间的竞争，而是都会之间的竞争，即城市群与城市群的竞争。在全球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几大湾区，比如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以及国内的杭州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是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的。

其次，建设大湾区符合时代的需要。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重要过程，也有人称之为创新经济，在创新经济中将具体产业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正需要建设湾区或者城市群这样的载体来支持其发展。

最后，建设大湾区符合粤港澳地区的客观形势。深圳最具创新的城市基因，东莞和深圳是世界上最好的制造业平台，澳门在一国两制下发挥了旅游和会展优势，香港则具有人才优势。如果将这些差异性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够实现互补发展。



梁锦松

如果将香港和珠三角连接起来，定会在人才交流和生物科技创新方面实现突破性的合作。

共同发展，形成更强动力

习近平主席 2017 年 7 月 1 日在香港提出，当前香港面临着三大机遇，一是粤港澳大湾区，二是“一带一路”，三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三者是有机互动的，香港可在大湾区建设上作出以下几个方面贡献。

其一，人才的聚集跟培养。创新经济中最重要的是人才，需要大量有创新能力和知识的人才。香港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具备领先优势，法制体系也相对健全。



其二，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大多数人才更愿意在自由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香港的税制简单且税率低，有着比较完善的教育和医疗体系，在制度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香港有着符合高端人才偏好的生活环境和方式。以旧金山为例，旧金山和硅谷是有机合体，在硅谷的谷歌有 40% 的员工并不住在硅谷，而是住在旧金山，就是因为喜欢旧金山的生活环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够为支持创新经济提供助力，香港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金融市场更好地支持创新经济。

其三，香港能够在生物科技和医疗方面做出贡献。香港有两所全球领先的医学院，有多位在世界范围内都名列前茅的科学家。但是，香港的市场很小，能够做临床实验的机会也很有限。如果将香港和珠三角连接起来，定会在人才交流和生物科技创新方面实现突破性的合作。

鉴于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加强包括人才、货物、资金、信息和服务等不同经济要素的流通。比如，建立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人才流动绿色通道。二是加强生物科技、大数据等不同行业领域的专家交流与合作。三是建立由发改委牵头甚至更高层级的协调机制，更好、更快地推进大湾区建设。■

让绿色增长中心 在大湾区生根发芽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认为，大湾区将会实现绿色、清洁的发展，成为世界上城乡结合发展的榜样。

探讨如何创建大湾区绿色增长中心，首先要了解“绿色增长”这一概念如何产生的。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罗马俱乐部 (Club of Rome) 发布的《增长的极限》报告就对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困扰、对石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以及环境的极限性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过去，我们提倡“发展是硬道理”，在没有指向性的盲目发展、快速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条件下，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导致经济发展无法带来充分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鉴于此，我们才提出要调整发展战略，并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能够促进人民幸福感有效提升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

众所周知，发展的问题涉及不同领域和诸多方面，而环境发展的问题则显得尤为突出，如今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我们要在所生活的地球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自然也是一个生态共同体。但是，为什么碳排放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呢？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合适的路径，只有建立能够整合兼顾各方诉求的利益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和生态共同体。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创新性地改变传统观念，只有通过技术、制度及体制机制创新才能解决当前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发展问题。

大湾区的绿色增长

当前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为实现绿色增长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世纪以来的技术变革使得我们能够突破以往的一些发展束缚，清洁能源的发展为全球环境的改善创造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也为产业增长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因此，如何抓住这一机遇、迎接这一挑战，如何占领这一制高点，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加速发展所需要



李人庆

破解的核心问题。作为先行一步实现经济发展的地区，广东如何抓住变革的历史机遇，从而推动新的产业变革、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如何引领中国的绿色增长和绿色革命，并创建成为中国绿色增长的中心、排头兵和引路人，成为模式的创造者、示范者和传播者？这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都是一种新的贡献。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发展结构正迎来新的周期性变革，存在着一个迭代差，使得中国能够通过弯道超车来绕开传统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在产业结构调整甚至产业革命方面都可以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的市场潜力和规模巨大，对于产业变革而言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和牵引力，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实现清洁和绿色的增长，首先需要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知识产权革命以及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保护，这需要政府对其进行投入。

在以色列，农民在减少病虫害和农药洒放方面取得了技术创新，通过黄蜂配种和花粉交接提高产量，同时通过公果



屋顶太阳能装置

蝇的免生育技术，使其无法通过与母果蝇交配而繁殖，进而抑制其增长，大幅降低了对环境的危害，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比较突出，跟整个经济发展环境的外部性以及环境保护的滞后性密切相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推动创新。建立一个平等的、全覆盖的、公平的环境制度，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责任。浙江已经将公共和卫生服务覆盖到农村地区，虽然目前覆盖程度有限，但对于解决农村的垃圾污染问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解决环境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大片的环境问题产生于农村，解决农村的污染问题需要公共财政和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按照十九大方针来破解既有的体制机制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

加强环境治理

加强环境治理需要发挥中国特色，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政府的主导能力和执行能力强，在解决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方面能够发挥整合作用。但是，解决环境问题更需要注重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在于能否建立利益共同体，仅靠行政手段是行不通的，需要依靠

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发展相关产业来解决包括污染治理、环保等问题。在德国，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政策的核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和相关就业，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新的产业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当前，很多地区在推动城乡互融，其中城市绿化和绿植产业对于农村地区发展是良好的机会，能够实现城乡之间的共享、共赢发展。只有在城乡之间建立这种利益共融共通的共同体，才有可能促进新的增长。

环境是人们的共同资产，环境保护需要建立新的评估体系和管理制度。在管理上，要严控源头污染，政府要从过程和结果这两个方面来加强考核管理，充分发挥政府在解决发展问题方面的整合能力和执行力。环境改善与产业调整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下一阶段工作的核心目标，是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点领域，如何将这种社会共识转化为有效行动进而建立新的发展机制是重中之重。创新性的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环境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才能实现绿色增长的目标。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和先行者，在绿色经济发展领域也应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中心。■

广州南沙： 努力打造“一带一路” 国际创新金融服务新枢纽

广州南沙开发区将和广东自贸区试点一起成为中国金融创新和改革开放的新中心。



广州南沙国际金融岛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广州城兴于贸易，盛于港口，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唯一从未关闭，长盛不衰的国际港口城市。当今，广州与北京、上海等知名城市，共同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南沙新区位于广州最南端，濒临南海，毗邻港澳，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正加快实施国家新区及自由贸易区等国家战略，着力打造广东省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及广州城市副中心，发展潜力巨大。

港口、贸易、金融总是相伴而生，互促繁荣。作为全球第六大港口——广州港的主力港区，南沙港区 2017 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1400 万 TEU，成为南中国规模最大的

单体港区。依托枢纽港口，南沙贸易新业态、创新金融业蓬勃发展。跨境电商占全国总量的六分之一，融资租赁产业迅速壮大，完成全国首单跨境美元船舶租赁资产交易和广东自贸区首单离岸飞机租赁业务，融资租赁合同余额超 1700 亿元，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飞机租赁集聚地。广州航运交易所成为华南规模最大的航运交易平台，珠江航运运价指数成为全球航运市场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跨境金融业务加快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额超 1900 亿元。被誉为金融界“F20”的国际金融论坛（IFF）会址永久落户，汇丰大学在南沙启动建设，设立全国首个能源金融示范园区。集聚各类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私募基金机构超 700 家、

注册资本超 2000 亿元。

接下来，南沙将紧紧围绕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创新金融服务新枢纽的目标，聚焦构建特色金融服务体系，重点发展科技金融、航运金融、跨境金融、财富管理、粤港澳金融合作等创新服务，打造国际领先的南沙金融服务品牌。

一、高标准规划建设国际金融岛。逐步导入 IFF 运营总部、各国常设金融机构驻广州总部、国际绿色增长基金小镇、国际金融学院学术智库区等重点平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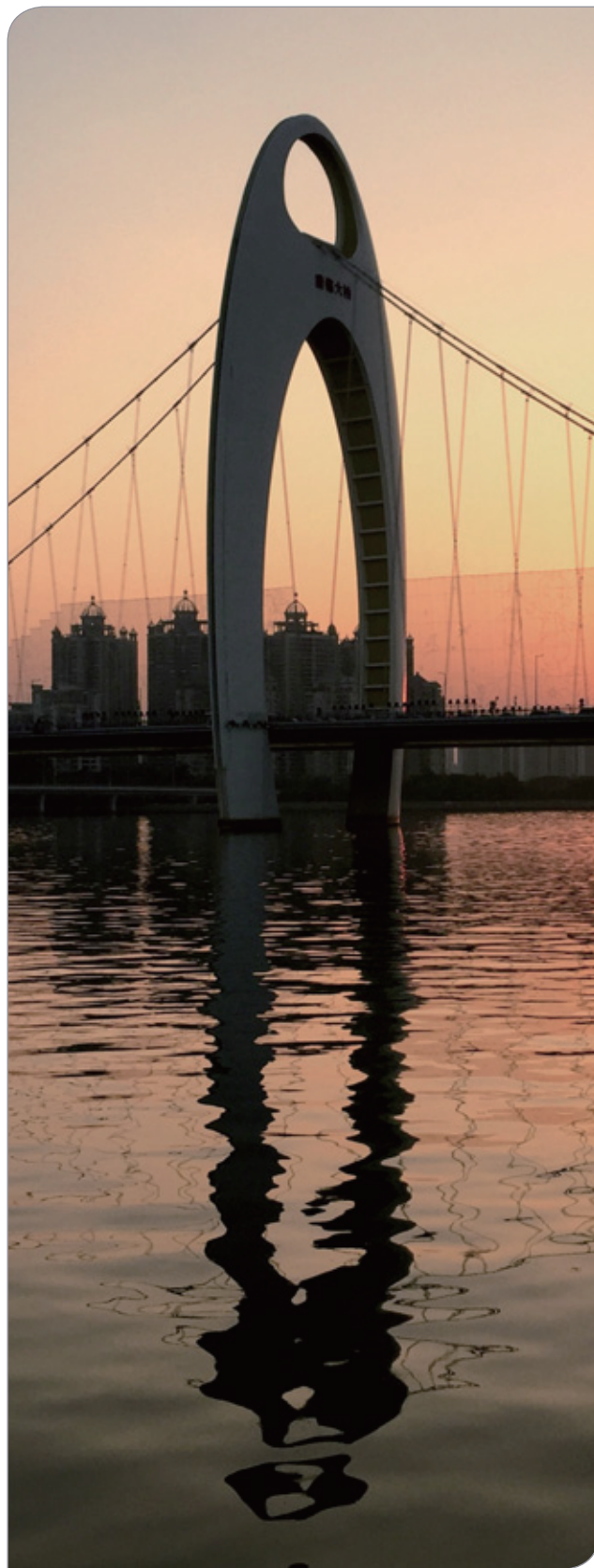
二、积极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金融创新。按照与港澳功能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在自贸区建立与粤港澳商贸、旅游、物流、信息等服务贸易自由化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着力粤港澳保险市场深度合作机制，建立与港澳保险产品互认、资金互通、市场互联等机制。着力探索粤港澳金融机构服务体系深度合作机制，加快推进粤港澳互设金融机构，增加港资合资证券公司数量。

三、构建创新型国际金融合作平台。根据南沙国际航运和投资贸易对金融服务的发展需求，打造全方位国际金融平台。建立金融新型组织机构的集聚平台，联动国内外金融机构，合作设立交易和服务平台。拓宽跨境投融资平台，创新境外机构境内银行结算账户体系，打通离岸在岸资金通道，完善方便快捷的跨境支付平台。创设品种丰富的金融资产跨境交易平台，创新和完善金融市场跨境融资结构，着力交易平台在投资者范围、资金流向、产品创新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

四、进一步推动产业金融融合发展。着力产业金融服务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便利高效服务。积极支持企业在跨境租赁、离岸租赁等跨境业务方面进行模式创新。探索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推动建设南沙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为区内企业提供“产业加速—创业投资—上市培育”全方位服务。

五、着力建设金融科技先行区。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务优势和广州、深圳的科技优势，围绕南沙对科技金融的发展需要，打造“南沙金科”品牌。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技术和科研辐射能力的金融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引入港澳、国际现代金融服务和融资模式，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私募基金、融资租赁等科技金融。促进金科产融合和产学研结合，引进权威机构在南沙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研究院，创设国际性的湾区金融科技论坛。

南沙是一片投资创业的热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湾区明珠，是一座众人期待的“未来之城”。南沙诚挚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到此共创合作共赢的辉煌事业。■



广州猎德大桥

千年商都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广州金融局局长邱亿通认为，几千年来，广州一直处于中国创新和外贸的前沿地带，是打造世界领先的金融创新中心的最佳之地。

广州是一座拥有 2200 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国际资本全球布局的重要节点。从公元 3 世纪 30 年代起，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元代时期世界上同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达 140 多个，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世界上唯一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金融与贸易素来相伴而生，国际金融中心大多位于重要的港口和交通中心，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纽约、香港，均是重要的港口和贸易城市。伴随着贸易的兴盛，广州的金融服务业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外国资本抢滩中国金融市场的桥头堡。1805 年，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谏当保安行在广州创立，到 19 世纪末，广州的瑞记、太古、宝顺、旗昌等 13 家洋行代理 47 家外国保险公司的业务，商业保险由广州发展至中国其他城市；1845 年，在广州和香港同时开业的英国丽如银行，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广州的十三行被称为“天子南库”，通过贸易联通全球，同时也向外输出资金和输入外资。1924 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同时创设中央银行。到了现代，创办于 1957 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成为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有“中国第一展”之美誉。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全球的商品和资金都在广州进行着源源不断的交易和结算。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支持下，广州金融坚持走改革创新之路，打造了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立得住的金融创新项目。例如，广州在全国首创建设第一条民间金融街——广州民间金融街，这是全国首个集“资金借贷、财富管理、支付结算、信息发布”为一体的民间金融集聚区；广州率先发布了民间融资“广州价格”，成为辐射珠三角，影响全国的民间融资价格风向标。广州在全国首创设立小额再



邱亿通

贷款公司——立根小额再贷款公司，可为广东省范围内小贷公司发放贷款，被誉为“小贷央行”，是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的创新突破。依托广州股权交易中心，在全国首创设立“中国青年大学生创业板”（简称青创板），是全国首个团中央和省政府以“省部共建”形式建设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全国 16 个省共 2407 个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上板融资。在全国首创建设“一区一金融功能区”的金融产业格局，以民间金融为特色的广州民间金融街（越秀区）、以总部金融为特色的广州国际金融城（天河区）、以科技金融为特色的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黄埔区）、以跨境金融为特色的南沙现代金融服务区（南沙区），以小微金融为特色的广州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增城区），以绿色金融为特色的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花都区），以产业金融为特色的白鹅潭产业金融服务创新区（荔湾区），以产业基金、风投创投为特色的万博基金小镇（番禺区）、广州温泉财富小镇（从化区）、广州洋湾创投小镇（海

珠区)等,有效带动了金融资源的加快集聚和均衡发展。在全国首创建设金融服务站,目前已建成社区金融服务站 580 家,覆盖了全市 38% 的社区;建成农村金融服务站 238 家,基本覆盖全市农村地区,打通了金融惠民便民的“最后一公里”。在全国率先实现市、区两级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全覆盖。在全国率先开展中小学金融理财知识教育试点。在全国率先设立普惠金融行业协会——广州市普惠金融协会。首创建设全国首个地方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该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第一家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覆盖了 P2P、地方交易场所、小额贷款、股权投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等 9 大业态的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等等。近年来,广州先后获得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南沙新区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和探索金融改革创新、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金融改革创新、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等 4 项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成为全国获得区域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最多的城市。

广州金融的领先成果

在改革创新的强力带动下,广州金融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在过去五年里增长了 133%,增速高居全国大城市第一位。2017 年预计实现金融业增加值超过 2000 亿元,成为全市第五大支柱产业。全市金融业总资产超过 7 万亿元,金融从业人员达 16 万人。全市法人金融机构达 53 家,持牌金融机构达 297 家,类金融机构超过 2 万家。全市上市企业达 152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464 家。2017 年广州首次进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体系,在第 22 期排名中广州从 37 位提升至 32 位,成为大中华地区唯一得分和排名双上升的城市。被誉为金融界“F20”的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落户广州并在广州成功举办了第 14 届全球年会,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纷纷报道广州金融业发展情况,广州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天然拥有开放和创新的基因。下一步,广州将发挥千年商都的深厚底蕴,紧紧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和目标进行创新,通过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有效降低金融风险、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在金融科技、跨境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粤港澳金融等领域先行先试,迈进全球金融创新中心行列。

开展金融创新的五大要素

一是开展金融科技创新。广州具有发展金融科技的优越条件,汇丰银行就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唯一一个金融科技创新

中心。下一步将出台专门的金融科技扶持政策和发展规划,在科技企业集中的区域如广州开发区等建设金融科技集聚区,完善金融科技服务体系,吸引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在广州设立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探索开展“监管沙箱”试验等。

二是开展供应链金融创新。广州已集聚了诸如富士康、LG、GE、广汽集团等核心大企业,同时,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为发展供应链金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未来供应链金融最好的服务主体将是商业银行和第三方平台,我们将推动广州的银行机构将供应链金融作为核心业务之一进行重点布局和资源投入,同时,大力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公司等第三方平台,设立供应链金融引导基金。

三是开展跨境金融创新。充分利用自贸区(港)的政策优势和广州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在跨境人民币双向贷款、跨境人民币发债、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在南沙自贸区内以“NRA+”为特殊记号开展本外币跨境业务创新,促进粤港澳三地离岸、在岸人民币资金互通。

四是开展绿色金融创新。绿色金融在中国拥有最大的发展市场,同时中国将最有可能率先制定绿色金融的整套标准。广州已经获国务院批准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并且是四个一线城市中唯一一个绿色金融试验区。依托绿色金融试验区,广州完全有条件在绿色金融上做到全国第一,进而成为全球第一。

下一步,广州将整合集聚各方资源,全力打造绿色金融创新高地,如将本土银行转型为绿色投资银行,与全球各大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合作,研究制订绿色金融创新政策,设立大型绿色金融发展基金,加快花都绿色金融集聚区建设,等等,争取率先在全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是开展“一带一路”金融创新。争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在南沙自贸区设立分支机构。设立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为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提供投融资服务。

引导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国企业在南沙开展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设立资金结算中心。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参与广州市各区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探索设立跨境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以私募方式开展面向港澳地区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证券产品发行和转让交易。

六是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广州期货交易所等重大项目尽快落地。充分利用国际金融论坛(IFF)、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等平台加强穗港澳金融业界交流。

强化穗港澳三地在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等金融新业态方面的合作,依托广州金融监测防控中心,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大数据的互联共享。穗港澳三地联手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可与纽约湾区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



丝路国际联盟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共商 · 共建 · 共享

Planning Together, Building Together, Benefiting Together

丝路国际联盟 (SRIA) 致力于建立面向全球的开放型国际网络, 通过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联合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和民间资本力量, 构建丝路民间合作与对话机制。

- 对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 开展全球市场化投融资服务
- 开启民间丝路外交和合作机制
- 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成果
- 开展多元化国际社会合作
- 整合联盟力量服务成员机构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
暨南沙国际金融岛

鱼跃明珠湾 星耀南沙城

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金融合作示范区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战略合作平台



世界级城市名片 / 一带一路核心节点 / 粤港澳大湾区示范窗口 / 中国金融创新服务典范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Since 2003

國際金融論壇（IFF）是由中國主導，總部設在北京的非營利、非官方獨立國際組織，2003年10月由中國、美國、歐盟等G20國家、新興經濟體，以及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相關國際組織領導人共同發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領域高級別常設對話交流和研究機構，被譽為全球金融領域的“F20（Finance 20）”。

聯合出版方

**CENTRAL
BANKING**